



在天使手中

◎ 美国畅销小说作家 詹姆斯·帕特森 著



詹姆斯·帕特森 著

陈永成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目录

Content

- [01](#)
- [01 \(2\)](#)
- [02 \(1\)](#)
- [02 \(2\)](#)
- [03 \(1\)](#)
- [03 \(2\)](#)
- [04 \(1\)](#)
- [04 \(2\)](#)
- [05 \(1\)](#)
- [05 \(2\)](#)
- [06 \(1\)](#)
- [06 \(2\)](#)
- [07 \(1\)](#)
- [07 \(2\)](#)
- [08 \(1\)](#)
- [08 \(2\)](#)
- [09 \(1\)](#)
- [09 \(2\)](#)
- [10 \(1\)](#)
- [10 \(2\)](#)
- [11 \(1\)](#)
- [11 \(2\)](#)
- [11 \(3\)](#)
- [11 \(4\)](#)
- [12 \(1\)](#)
- [12 \(2\)](#)
- [13 \(1\)](#)
- [13 \(2\)](#)
- [14 \(1\)](#)
- [14 \(2\)](#)

- 14 (3)
- 14 (4)
- 15 (1)
- 15 (2)
- 15 (3)
- 16 (1)
- 16 (2)
- 16 (3)

1922年3月5日，我出生在博洛尼亚。亲爱的杰那里埃罗，有多少事情包含在这几个单词中！我是多么欣喜你有如此简朴、如此纯洁的心灵，有如此新鲜而又向着世界景象开放的思想！我将不需要人为地打乱我叙述的秩序，也不怕从头开始。你是我的收信人，我唯一的收信人，我不需要别的人了。始终做那个我喜欢的那不勒斯男孩吧，活泼，直爽，灵魂与躯体皆强壮，带着第一次跨入校门的穷小子的那股严肃劲儿，时刻准备进入任何一本新书中，但是，假如作者用一种复杂而艰涩的文笔惹你厌烦，你也会哈哈大笑将书本扔掉。

如若我选择了无聊的文学大众作为听众，而他们博学多才的良师让他们为信奉时间编年顺序感到羞愧，那么，我会觉得自己还能那么自由地讲述我的生平，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就像它们发生的过程那样吗？为取悦那些先生，恐怕应该打破事件的自然连贯，蔑视日期，回溯地讲述，自命不凡地绞尽脑汁，把往昔、现今与将来混淆在一起。恐怕还应该使话语不再成为思想的简单外衣，恰到好处地体现出想要表达的概念的所有品质、所有优雅，而是成为一种无动机的词语游戏，即他们所谓的“言语”，独立于需表达的事物之外。

你，坐在一把小小的铁椅子上，待在卡普亚那门你们家公寓的半空小院子里，铁椅子白色的搪瓷皮在经历了冬天的恶劣天气后，像鱼鳞似的剥裂得更厉害了，高高的紫藤架给你挡住了五月份已经有些炙人的阳光，两步远处，你父亲正在他的帆布躺椅上瞌睡，你愿词语与事实相符，愿开头的几页就对你说起一开始即发生的事。我把我出生的那年、那个城市矗在你跟前，就像《诺尔玛》的大幕拉开后德洛伊教祭司的森林那样。你立即发现了博洛尼亚的街道、房屋和天空，这时，你母亲刚刚把午饭后的盘盏洗完擦干，把剩下的莫扎雷拉放到一块湿布里保鲜后，拿起她的洒水壶，想给罗勒和薄荷浇一遍水。

你将听说博洛尼亚的柱廊：市中心所有街道的两边全是连拱廊，在两条开放的长廊之间，只剩下一条细细的街面之带。购物，散步，闲逛，上午出门，下班回家，市民生活每时每刻都充盈着柱廊。在那儿，人们交谈当日新闻，人们诅咒政府决定的涨价，但首先该骂的是博洛尼亚队的守门员，是他的失误导致了球队在米兰城输给了国际米兰队，或者在都灵输给了尤文图斯队。你会发现，那排成一溜的柱子精彩绝伦：但是，就像真正美丽的、值得装点一个城市的任何东西一样，要知道，在这里，艺术上的关注是次要的，实际功能远远领先于装饰效果。当年，大学——这是欧洲的第一个大学，甚至建在巴黎的索尔邦学院之前——的迅速发展吸引了大量的学生一下子涌入中古城市的围墙之中，人们便千方百计地增加住宅，而又不损害市内交通。在那些年代，还没有城郊：城墙严格地确定了居住区的周边。柱廊便这样发明了。它作为突出物位于街面前，又相当结实，足以在整整一条街的长度上支撑起好几层增盖的住房，一开始就成功地吸收了居民人口的涨潮。市政法令规定了柱廊的最低高度：七博洛尼亚尺，即2.66米，这可以让一个骑马的人通过。

连拱廊不仅仅是为了遮风雨挡太阳，你不要停留在这样的想法上。同样，你也别以为它有另一个优越性，即行走在那里能免除街上的冒犯，尽管这一王牌在当时变得千百倍地珍贵，因为那些头发老长的年轻白痴骑着隆隆作响的摩托车，会蹭到你身上，而在早先，博学的阿库尔修在这里可以面对文文静静的青年，从容不迫地谈论教皇国和帝国的各种问题。

你还是来欣赏平民精神的伟大教益吧。每一栋房屋都以一个毫无隔断的门厅与它的邻屋相连，这样，富人的府第与穷人的陋室从外面根本看不出什么区别。所有房屋的柱子全都一样，粉红的颜色，又圆又结实，在生肉熟肉店的玻璃橱窗，就跟守护着贵胄庭院的两扇大门前一样，一个个圆拱（很少有用尖拱的）升向拱顶石。假如这是一

个幻觉，必须揭穿它的骗局，你得承认，再没有什么幻象，比缓和了财富间不平等的这三十五公里长的开放性走廊更辉煌的了。

柱廊的另一个好处：它把住宅的私有空间跟散步道的公共空间结合在了一起。不仅是平等化的手段，还是社会交流的手段，它构成了某种向所有人开放的房间，某种不属于任何人的长廊，一个通过、邂逅和交结友谊的地方。公民们在这里相聚更容易，在这里结识更自然，他们用不着彼此跑到对方家中，摁人家的门铃，跨越大门的关隘。当你需要拜访一个朋友时，他已经不再完全是一个朋友了，他是你觉得要打扰的“另一个人”，尽管他并没有让你等，而是立即向你伸开了双臂。在柱廊底下，“这些人”和“那些人”之间的区别消失了。每个人都准备着迎接所有人。每个人都把成为自身的焦虑扔到了相处一起的快乐中。私人生活的围墙倒了，个人主义的基础坍了。人们失掉了各自的特殊身份，成全了一种甜美的、热烈的伙伴感和团结感。

01 (2)

这种柱廊文明在博洛尼亚赢得了优势，从中世纪起便如此，而且只是在博洛尼亚，至于其他地方，私人房屋，从资产阶级的住宅，到贵族的宫殿，到处表现出阶级的对立，财富的歧视，自我炫耀的意愿，家族秘密的趣味，保险柜和密室的崇拜。比如在佛罗伦萨，每一座宫殿都构成孤零零的一堆。人们得以从四方来欣赏的建筑的辉煌，激起了主人家的威严感和富有感。在博洛尼亚，就丝毫没有这种东西，这里的公共建筑盖过了孤立的房屋，大众理想粉碎了占有、卖弄、家族的精神。从我的中学出来，这是一个中小布尔乔亚子弟就读的国立中学，从学校出来，我看到的并列的建筑有斯帕达宫（有一天，我发现了它平时被遮掩的豪华面目，便躲过了警察的监视，一直闯入它的内院，从一扇打开的窗户中，我看到一间客厅的天花板，装饰有仿大理石和壁画，一个穿玫瑰色衣裙的天使置身于布料的旋涡之中），酒吧杂货铺，我们经常在那里匆匆喝上一杯咖啡（亨里科用微量的烧酒来“修正”它），由一个来自亚平宁山脉的农妇开的乳品店（这是我最喜爱的地方），补鞋匠的棚摊，书店，卖木柴和煤炭的破屋。在这些如此不同、如此不平等的地方之间，从一根柱子到另一根柱子，拱廊连续伸展开它们相同模样的花彩。

当然，我不会弄错。我知道得很清楚，在巴罗克宫殿的拱顶下，玫瑰色的天堂信使是不会有在就餐者的盘子中，在一片圆圆的摩德纳熟红肠旁边，加上一块玉米饼的，至多，我们自己的天使，更为平民化和世俗化的天使——我父亲的月薪——可以使我们每月尝一回鲜，聊充盛宴。富人和穷人，这在博洛尼亚总是有的：但是，至少在好几个世纪中，他们把使他们接近的因素，看得比使他们分开的因素更重要。他们不是生活在柱廊的集体中吗？从这一传说中，我得到了哺育，而对这一人类博爱在城市中的体现，我给予了信仰。我相信，这是跟家庭以及封闭生活的小市民理想相对立的，不仅是我的故乡之

城，而且，出于年轻的热情，整个的意大利都被保护在那种理想之外；就这样，我积攒了许多失望，假如，走廊和柱子的这一装饰对我毫无坏心眼的敏感性的影响不那么强烈的话，我本来是能够避免那些失望的。

我常在夜里出门，比起白天五光十色的喧闹来，我更喜欢那些长廊在夜色中的荒凉景象，在神秘的黑暗中，它们一字儿排开，一模一样。比幽灵还更轻巧的猫，从一根柱子跳到另一根柱子，消失在远处的拱顶中；月亮在屋顶上滑行；一个晚归的行人拉起了大衣领子，从一个酒吧中出来，酒吧的铁帘门在他身后嘎啦啦地落下。一切复归于寂静中；从一扇高开的窗户中，悬下一根绳子，绳头上吊着一只桶，第二天一大早，乳品店的小伙计就会往桶里放一瓶鲜奶。我庆幸自己生在这样一个城市中，在这里，为人矜持、私密身份、个人幸福、家庭自我主义似乎都是陌生的概念；在这里，对邻人的提防，对他私生活的窥视，向他责问——在别处被认定是合法的——的习惯，不能作为社会关系的基础。我，我这个最“各色”的人，害群之马，不入册的贱民，在这里，这一无隔碍社会的乌托邦使我激动。在那个时代，我是不是已经猜测到，孤独、驱逐、迫害将是我的命运？我是不是在寻求，以这一无疆界团结的神话强化自己，而不怕人们扭过背去不睬我，不怕找不到任何人来帮我？

我不那么轻信，不那么冲动，我不会被一种威严建筑的幻影迷惑。我从心底里渴望我们全都相同，我们全都是柱廊的居民，而丝毫没猜想到，对我自己未来的担忧，会吸引我去注意一个现实中遥远的梦。在博洛尼亚，还留有什么中世纪精神？一丝微不足道的痕迹，一段平淡无奇的回忆，说穿了，一道做好了菜。博洛尼亚小牛肉片，对，它周游了世界，作为我们古老业绩的皱巴巴的旗帜。那是薄薄的一片牛腩肉，盖着一小层火腿肉，浸在融化了的奶酪汁中。我的同胞们继承了这一由平民与贵族同住一个走廊下所表达的古老社会文化的美德，至今继续把这三样东西放在一起烹调，一口吃下去，而在别的

地方，它们是分属于三道菜的：火腿是冷盘，肉片是大份足量的正菜，奶酪则是甜食。

我每次经过那里，从来都不会忘了把我的同学和好友亨里科带到康腾森餐馆去。他保留了盯姑娘的习惯，利用我们享受美食的空闲，写几首新的情诗。我选了凉廊下的一张桌子，点了著名的小牛肉片：既为了一边在心中重温柱廊的社会想象，一边任自己的目光游荡在一长溜的连拱廊上，更是为了嘲讽我们的堕落，我们这些人，把古老的融融之梦耗费在了滑稽的祖传烹调术中了。

02 (1)

这个婴儿是谁，他父母替他取名为皮埃尔·保罗？彼得和保罗！一个人竟可以在两个如此对立的圣人保护下合一地生活！彼得：他使罗马成为大祭司之城，并把耶稣的福音变为官方的宗教。一个顽固、狭隘的头脑，十二使徒之一，基督的私密朋友和信念传播者，专门记录他的教诲，担当建立教会的使命，遵守礼仪和等级，中庸之道的信徒，行为举止决不冒失，反对革新。而保罗，恰恰相反：焦虑，神秘，走极端，曾经不认基督并由此摆脱了任何字面上的忠诚，四方行走，恰好跟深居简出的彼得相反，周游世界说服人们皈依，暴躁，不合群，性格乖戾，甚至跟朋友也合不来，越来越孤立，尽管得到一小撮门徒的爱戴，执意殉道，越接近目的就越加倍努力。一旦死后，人民便忘记了他。在中世纪期，他几乎不为人知；从来没有一座教堂以他的名义而建；没有一炷香为他而燃。既没有雕塑也没有肖像再现他的形象。16世纪之前，几乎无人取他的名为名。是宗教改革为他打开了一个辉煌和权威的时代。在以其激情和精力鼓舞世界的路德面前，彼得的精神，保守的谨慎，祭祀的排场，就再也不够了。必须召回保罗精神投入斗争，召唤起他那跟那个德国僧侣的热情和疯狂一样的热情和疯狂。每当一种异端，即一种过度的信仰，威胁到教会的常规时，人们就想起了保罗，他高举一支熊熊燃烧的火炬，来往于陆地和海洋。风平浪静时是令人腻烦的幻觉者，狂风暴雨中却能知晓天命。而风浪平息后，彼得便重又登上他的宝座。他把三重冕戴在自己头上，在重新找回的权力的威严中，为向他欢呼的众人祝福。

保罗的鲁莽、孤独和悲惨。彼得的保障、辉煌和成功。我的自然趣味如此强烈，使我趋向于探索和游荡之人，而另一个则用他的效率和光辉来影响我。人民的欢呼声传向教会的创立者，传向手持铲头牧棒的牧者；真正的荣耀复归于乌托邦的流浪者，复归于衣衫褴褛的诗人。放学后，我急匆匆地赶回家，继续阅读他们的生平故事。

基督死去了，没来得及就某一点说出他的话，而这一点立即激起了门徒们的尖锐论战。未来的基督徒们是不是应该遵守恭敬的犹太人的各种实践，换句话说，耶稣的宗教是不是要摆脱犹太教？最初的皈依者全部是犹太人，全都严格遵守旧约的戒律：行割礼，严守规定地区分食用肉和禁用肉，不接触动物血。在古代城邦中，人们花费许多时间在公共浴池沐浴，在运动场锻炼。在那里，男人们赤裸裸地展露身体。割礼使犹太人当众现丑；由此，他们生出一种倾向，躲避公众生活，去营造一个孤立的小集团。他们担心碰上不洁的畜生，甚至避免去集市上采购。

最初的十二使徒，彼得也位列其中，想象不到人们可以成为基督徒而又不服从世俗的法律。保罗很快明白到，某些僧人的顾忌会影响基督教的未来。在他遥远的旅行途中，他开始布道，面对非犹太人、异教徒、外人；吁请他们进入上帝的王国，但一开始并不要求他们加入亚伯拉罕的家族。在叙利亚的安提阿，他遇到了一个叫提多的年轻人，跟他结下了友谊，使他皈依，并收他为门徒。

这些新鲜事震惊了耶路撒冷的使徒集团。保罗嗅出了危险的气息，急忙返回耶路撒冷。他发现基督的亲属和朋友沉浸在一种过于沉重的虔诚气氛中，有些像是他们的主曾那么激烈地反对过的气氛。彼得、雅各和约翰都拒绝接受提多，指责他始终是个无信仰的人。他们认识的世界，只限于构成巴勒斯坦的荒漠与果园的那些土地。保罗安排了一下，把使徒中最不顽固的、最不刺头的那一位找到一旁：他正是彼得。他为他展现了他刚刚走过的小亚细亚的广阔天地，还有他准备访问的众多国家：马其顿、希腊、西西里、意大利、西班牙。为什么要给刚刚皈依的教徒，给那不是以色列族的人强加上一副无法忍受的桎梏？他向他总结道：“我们可以彼此理解：对你，有割礼的福音，对我，有包皮的福音。”使徒们转而赞成这一折中。外乡人皈依的合法性得到了承认；作为交换，彼得从保罗那里得到保证，带提多去行割礼。

那时候，我还不太清楚“包皮”和“割礼”这两个词是什么意思；但是，彼得和保罗争论的事，属于身体的哪个部位，不用任何人说，我就已经自个儿明白了。想到教会的命运居然取决于那么可怜的一小块皮，我并没有笑，只是看了看我的性器官——那时候我有十一二岁了——惊叹之余不免有些恐慌，我竟然拥有能决定人类命运的某种东西。

提摩太的故事终于使我迷惑了。保罗是在第一次去加拉太传道的旅程中遇到他的：这只是一个十五岁的孩子，他的母亲和外祖母都听从保罗皈依了。几年后他返回路司得时，发现了一个成熟的年轻人，他满怀柔情地爱上了他，把他当做儿子。他说，从来没有一个如此称心如意的门徒来到过他身边。然而，有一个未行割礼的助手？身旁，他担心会有很大麻烦。刚刚由耶路撒冷的会晤缓和下来的争论，还会重新爆发。保罗想平息对手们的怀疑，消除他们的指责：他便亲自为提摩太行了割礼。当我读到这个如此残酷同时又如此神秘的故事时，我这个天主教徒小男孩的心中总也摆脱不了某种不安。假如说，保罗以他的行为成功地防止了一段丑闻，避免了对他的惩罚，那么我认为，他的敌人让他用自己的手毁损了他的朋友，是给他设下了一个更危险的陷阱。《使徒行传》中这个显得如此简单的句子“他自己为提摩太行了割礼”，把我掷入惊奇的深渊中。这场景发生在哪里？在一个房间里？在一棵橄榄树下？如何？两腿之间有没有流血？保罗是不是独自一人跟提摩太待在一起？他把年轻人的性器官握在手中时，感到了什么？这些问题老在我的脑子中翻腾，我感到自己提出这些问题来就是有罪。割礼是一件纯粹的原则性大事，一个有关教会正统的问题，这一点，似乎已经被所有涉及到它的作者认定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真理。唯有我，我眼前却浮动着一个形象：一个男人凑近一个少年郎，脱掉他的衣裤，为他动一个手术，手术的因素有阴茎、龟头、小刀。一个充满了魔法和恐怖的行为：或许，只应该从中看出一个外交行为，保罗对彼得的一个让步！

人们说起，人们写道，保罗是我唯一的主人。确实，我最初的梦把我带到了他的踪迹上，我童年的热忱贴合了他三次西游远行的种种磨难，他三次回归耶路撒冷的种种苦涩。满怀着热情和期望，我和他一起在叙利亚的安提阿上船，我沿着小亚细亚的海岸航行，我穿越加拉太的一座座城市。在皮西迪的安提阿，我在犹太会堂中传道，远不如在公共广场上那么成功，广场上，异教徒们还自愿听我讲呢。犹太人愤怒起来，把我驱逐出他们的领土。我的脚步在城市上空腾起滚滚尘烟。在以哥念，我的讲道掀起了一次骚乱：我不得不逃走，离开利考尼亚的京城。在路司得，我被狂热的人们抓住，拉出城外，挨了一通石头砸，被当做死人抛尸野外。当我在刑事法庭前说话时，雅典人聚集到我身边。哥林多犹太会堂的长老缚住我的双手，传我到阿哈伊亚行省的罗马人总督跟前。在耶路撒冷，第三次，犹太人把我从庙堂上拉下来，折磨我。我的获救还要靠统帅着罗马卫队的行政官，他把我关在了奴隶监狱中。我在塞萨雷戴了两年的镣铐，然后被转移到罗马，在那里，直到死为止，我从来没有再见过天日，伴随着脚镣手铐，关在漆黑的地牢。在我传道期间，有五次，犹太人给了我三十九下绳子，有三次，我挨了棍子；一次被石头砸；有三次，我在海岛之间遇海难；我抱定一块破船板，在海浪中漂荡了一整天又一整夜；有八次，我差点儿在过河时丧命。

02 (2)

疲倦、劳作、反复的熬夜、饥饿、干渴、长时间地饿饭、寒冷、赤裸、牢狱，我无意识地为我自己确定的典范生活就是如此，夜晚，当我躺在床上，我怀着比读儒勒·凡尔纳、大仲马、萨尔加里 或斯蒂文森的小说时还要多的激情，生吞活剥地读着他的历险故事。是的，我最喜爱的英雄就是他，这个面容懦弱的光脚男人，不知疲倦的行走者，不断地被那些他打算拯救的人追逐和仇视，这个成了嘲笑和迫害对象的魔幻的梦游人，到处被揭露成一个挑衅者，被迫在黑夜出逃，在荒野星空下露宿，没有名分，没有委托，没有权力，除了在朦胧的月光下倚在一块石头上写下书信之外，没有任何别的允准。

刚刚走出童年，我就求援于彼得。假如我听从吹捧我自然性情的声音，对我本能的倾向让步，那么我也许就完了。彼得给了我需要构筑的作品的意义，必要的卑躬屈节和耐心，以求把已着手的工作进行到底。我被人指责为行为仓促，爱变卦，无条理，没有人知道我是如何竭力控制着我的本性。我若是没有从彼得这一派学到的合理和谦虚，我还能成功地写出我的书来吗？若是不考虑到就合我的读者，我还能有公众吗？一部小说，一部电影，那就像一座教堂：必须小心翼翼地把各部分聚集到一起。诋毁任何持续努力所必不可少的种种美德，是多么诱人的事啊！秩序、规则、不屈不挠，那么快就显得一文不值！彼得把我拴在了我的书桌前：每天上午四个钟头面对着纸和笔。保罗把我推向外面，把我的聚精会神称为吝啬，把这不可动摇的时刻表称为自私自利：出门到街上去吧，他在我耳边喃喃道；去冒险吧，如果你想拯救生命，就把它丢失吧。我将最终成为一个书写者，还是成为一个教授呢？

这一斗争久久地撕裂着我。彼得在我床上铺开一件白衬衣，一件深色上装，在我的脖子上系上一条领带，把我打发到威尼斯或戛纳，在电影节评委面前为我的电影辩护。保罗匆匆脱下我的衣服，只给我

留下一条背心，一条足球短裤，命令我乘有轨电车到终点，在大众化住宅脚下的空地上，加入到小子们的队伍中去。欧弗拉特街的公寓，以它罗马式的豪华让你震惊了吧？我在彼得的指令下把它买下了。保罗则总是拒绝从金黄色铜栏杆的大理石楼梯上楼。他等着黄昏来临，好从仆人门那里溜出来，毫不耽搁地把我带往火车站，追踪那些暧昧的诱惑。我该听谁的，才能忠实于我自己呢？这一位希望我有责任心，关注我从事的事业。出于同样理由，另一位更盼望我把整个尊严扔到荨麻丛中。为服从彼得，我出版了我的书，我构建了作品，我寻求成功。而出于对保罗的爱，我遭到报刊的诽谤，被带上法庭，三十三次被传唤听审。然而，有一天，两人中有一个赢了。我会告诉你，是什么样奇特的情景，使胜利留在了西利西亚人那一边。

画家们常常描绘这两位使徒，每一个都在其生命的一段特定时刻。总是同一时刻。就仿佛保罗的种种历险可以简化为一次从马上坠落，而彼得只是因为十字架断了魂才值得称颂。把两位圣人做平行比较，这几乎已经成为一个规矩，但是，场面则有些相对立，因为彼得的酷刑标志着他传教的结束，而同样确切的是，保罗的灵启则标志着他传道的开始。人们把一个放在他传说的开端，而另一个则在结尾。卡拉瓦乔就是这样做的，他画了彼得和保罗的两幅画，就在罗马的人民广场小小的圣母马利亚教堂的墙上，面对着面。在左边，你看到保罗刚刚从他的马上摔下来；在右边是彼得，脑袋朝下地钉在十字架上。他恳求刽子手给予他这一恩惠，因为他实在太卑贱了，不敢奢求与耶稣一般。

至于我，保罗之死实在令我惊讶万分。为什么他从来没有让画家们感过兴趣？为什么他殉道的故事没有广为流传呢？他是被砍头的，好像是的，跟彼得死在同一年，跟他在同一时刻，一大批在尼禄的命令下惨遭酷刑的牺牲者之中。但是，这一位所蒙受的折磨激起了大众想象熊熊的火焰，而另一位受难地则根本掀不起任何好奇与怜悯的风波。

最初所有的圣徒，都以他们的死留下了一段光荣的回忆。司提反遭石块击毙，施洗者约翰被斩首，巴多罗买被剥皮，这些事再现在成百上千的壁画和油画中。对所有这些人，酷刑被看成是一种神化。雅努阿留斯，你的主保圣人，有火焰和利剑，洛朗有火刑架，布兰丁有狮子，乌尔苏拉和塞巴斯蒂安有箭矢。所有人都有，除了塔尔苏斯的传教士。我不理解这一例外。我似乎觉得，他的故事并没有结束，还缺一件什么东西。在经受了那么多的欺凌和屈辱之后，他应该比任何人都更有权力，得到一个精彩绝伦的结局。对他的生平，人们只会想起迷醉、神迹、传道、胜利：但是，最后的失败、弥留、嘲讽和斩刑木砧的侮辱呢？他在大地上充满丑闻的途径，值得留下另一种回忆，而不仅仅是一个幻觉者和一个狂者的形象。既没有血滴，也没有尸体的痕迹。救世主温和地召他回天上，没有准许他以一个鲜明的污点来打击世界。

在这一点上，我感到一种真正的不公平：渐渐地，我终于对自己说，为之做补救，是我的责任，保罗被悬而不白的故事，该由我来为它做必要的补充。上帝剥夺他生命的屈辱之死，我要替他来忍受。我不知道将在何时，又将如何。长期以来，我所冒的唯一危险，是法庭的传唤，是我的书和电影的查封。等到那一天，等到我不再满足于那些烦恼事，等到我开始不再拿我的工作冒险，而是拿我的血肉冒险时，我称为保罗之胜利的日子就来到了。他可以放心地寄希望于我：我已经准备好去忍受闻所未闻的残暴，为他的光环重镀金彩。我梦见，快活的刽子手把我杀死在一条公路边上，并糟蹋我的遗体，然后把它遗弃在灰尘蓬蓬的路坡上。

03 (1)

苏珊娜·科鲁西，我的母亲，苏珊娜是她曾外祖母的名字，一个波兰犹太女人，我的曾外祖父，一个拿破仑的士兵，在被占领的华沙遇识了她，征服了她，并把她带回他的家乡弗留利，就像带回了一件战利品。在我们老家，男人们总是粗暴地抢来他们的女人，叫她们屈从于他们掠夺性的意愿：成婚更多的是出于武器的威力，而非爱情的诱惑。军事行动，武装犯罪。在维斯瓦河河畔的历史性抢劫发生之后一个世纪，同样的命数落到了我父母的头上。

我父亲卡尔罗·阿尔贝多是阿尔戈巴斯多·P.达隆答伯爵的儿子，出身于拉文纳的一家名门望族。他很为自己的称号骄傲，年轻时喜欢面对着大海让人拍照，拳头叉在腰上，目光直视地平线，下巴挑战似的高扬起，短短的却很粗壮的小腿稳稳地踏在沙土上。他喜欢自吹自擂，这一点尤其必要，因为他必须掩饰一种尴尬的、无法满足一个年轻贵族野心的经济现实：一个宫殿破败不堪，最漂亮的一层已经租给了一个颜料商，而此人是靠做潜水艇漆的生意发财的；一个母亲和几个姐妹总是为某个当年移居到遥远城市的亲戚戴着孝，邻居们看到她们穿一身黑衣黑裙，就知道这一家有丧在身，她们一大早便赶往教堂，一副谦逊的举止，配上一种高傲的轻蔑，分明是瞧不起时尚的轻佻多变；最后，还有菲薄的饭餐，既不易消化，又单调，天天都是肉酱，多亏隔壁耶稣教修会好心的总管，还是低价买来的。他们在自己家里做西红柿酱，九月份的整整三十天期间，客厅变成了瓶装工厂。珍贵的大理石方砖地，往日贵胄府邸仅存的威严之一，每年都要沾满血红的果汁。

午餐和晚餐老是那么单薄，使父亲染上了打纸牌的习惯：既是出于一种合法欲望，顶住肚腹中始终如一的饥饿，也是为了不失地位和身份。一个P.达隆答家的人是不会随手大把扔钱的！你讥笑我小气。我则不喜欢疯狂而又无谓的支出，仅仅只为炫耀一番。在我父亲的挥

霍中，我更多地辨识出虚张声势的显摆，而非真正的慷慨。瞧瞧他的眼睛，在我寄给你的肖像画中：顽强，不安，总在窥伺着。两洞枪眼。他遗传给了我他皱纹紧密的面容，他凹陷的腮帮，他紧巴巴的颌骨，他高高的颧骨，他薄薄的嘴唇。或是时运不济，或是缺乏经验，他把他父亲的小小遗产全都在赌场中挥霍一空。对这个贵族之家的儿子，一个不可能干某种手艺活儿，却把名誉和身体看得很重的少爷，只有一条出路：入伍。于是他成了职业军人。一开始在利比亚，随后，1915年，当意大利参与战争时，在弗留利，离奥地利边境不远。身为少尉，他被分派到卡萨尔萨的军营，那个村子即是科鲁西家的故乡。

我母亲是一户富裕农民的第二个女儿。她父亲开了一家小小的烧酒作坊，战后破了产。家中的女人全都工作：有的当小学教师，例如我母亲和她的一个姐妹，有的当女店主，就像我的另一个姨妈，她在自己家附近开了一家文具店。我父亲一开始表达爱慕之情时，遭到了回绝。他们是在舞会中相遇的，就在村里教堂前的广场上。我母亲，身段苗条，性情活跃，又带有讽意，喜欢读小说，热爱她的职业，因为当教师可以保持独立，她写一些寓言和歌词，自己给它们配上当地的传统老调子。一个军官的吹牛和肩章，只能让一个这种素质的年轻姑娘嗤笑。遭到拒绝后，他又全副武装地返回：战争冲突结束后的不几天，人们看到他闯进了卡萨尔萨村。他几乎是强迫地娶了我母亲：说是强迫，不仅在于他行为方式的突然，更在于村里人、亲戚和朋友的压力。我母亲那时候三十岁。她屈从于不得不结婚的习惯，更屈从于那个人凶残的执意，他带着胜利的荣耀从维托里奥威尼托凯旋，把她绑在战车上，像是一份额外的战利品。

我父母从来就没有和睦相处过。从第一夜起，妈妈就对这军官的攻击感到恶心。

“加里波第不在乎这个！”他一边扣上他的腰带，一边叫嚷道。这句我觉得十分神秘的话话音未落，他就带上了门，离开了房子，他男

子汉的尊严受了伤害，他要以种种很容易收买的安慰，为自己的尊严挣回一些颜面，而在军营周围，那样的慰藉并不缺少。然后，他重新回到自己家，宣称要履行他当丈夫按期应尽的责任，就像那个牛头怪人要求享用他一年一度的新鲜血液。责骂与诅咒伴随着他的归家。玻璃窗在他的嗓门下震颤，嗓音中越来越透出傲慢和倔强，而且，在士兵的狂妄自大中，已经混杂了法西斯分子的优越感。我出生不到一年，他就已经是党内的人了，在走廊中厉声叫嚷墨索里尼将为他复仇。我赶紧逃到房子的另一头。我母亲在壁橱中存放了一件兔皮旧大衣。有多少次，我把我自己关在这灰尘蓬蓬的小房间中，用那脏兮兮的兔毛磨蹭我的脸，忍不住直想打喷嚏，一心只愿就这样死去才好。

我们经常搬家，东奔西颠，任凭军方打发。在我的想象中，总是我母亲抢先下手，一跑了事，以躲避家庭生活的捉弄。她叫我到她身边去，我就从我的房间跑出去，哭着扑到她怀里。我们匆匆地往硬纸箱里装一些衣服和属于我们的物件，因为搬家次数太多，纸箱子都有些糟了。我母亲不得不阻止我往里面放美丽家乡奶酪和食品柜里的蔬菜，而我则把这些东西当做紧急情况下的急救物资，因为我总是担忧，怕漂流到一个鲁滨逊的荒岛上，或者会像爱德蒙·邓蒂斯那样，落到伊夫堡的监牢中。在火车站的月台上，我根本不知道我父亲已经先于我们到达了他的新驻地，还战战兢兢地怕他会发现我们的逃跑呢。他会追踪而来，在火车进站之前追上我们吗？火车怎么还迟迟不到呢！我注意着来自乡野方向的任何声响（火车站常常只是田野当中的一个站台），只有当高高的横杆放下来拦住了来往的汽车时，我才放心地喘了口气。发明了蒸汽机的德尼·帕潘第一次看到热气从锅炉中喷出来时，恐怕也不会比我看到一缕缕白色的气团从机车头中冒出，宣告列车开动时，感到更多的快乐。获救了，我们获救了！

帕尔马，贝鲁诺，科内利阿诺，萨奇雷，克雷莫纳，斯冈迪亚诺，重又是博洛尼亚：假如这个或那个城市，相对于别的城市，有时特别令人想起一束浓香紫罗兰，有时又是滑雪场方向的一个终点站，

有时是一个把圣母画得惟妙惟肖的画家，有时又是著名的弦乐器商家族，那么说到我，我对它们的印象却只有突然的开拔，堆放在门厅中的箱子和包裹，寻找一截绳子把破裂的柳条筐再紧一紧，害怕在成功开溜之前被发现，火车站窗口前令人不耐烦的排队，车厢内轻松的喘息，然后，在旅行即将结束时，新的担心又来了，那么可怕，担心父亲揭穿我们的计划，准备报复我们的胆大妄为。每一次，确实，我们都发现他早已经等在他的位置上了：带着他的军官旅行箱，稳居在客厅中央，这是为他男子汉的荣誉而竖立的纪念碑，也是我们羸弱幻想的坟墓。

恰如你看到的那样，对我来说，他成为了：父亲。我在我心里不再把他称为别的。不再是：我的父亲，因为在他的威力和暴力面前，我母亲显得跟我一样易受伤害，孤立无援，无能为力，就仿佛我们平等地处在童年中，处在卑微中。但也不再是：我们的父亲，他对我们行使的权威完全丧失了情感。他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父亲，只有这一称谓，才能在其严厉的简明中，使他命令式的举止行为在我们心中引起恐惧，例如，当他倒在扶手椅中，伸过腿来叫我们脱靴子的时候。他是不是意识到，说到底，他只是一个碌碌无为者？也许：但在别的人身上会让性格温和下来，使人趋向于宽容的东西，在他身上却只会叫脾气更加暴躁，直至疯狂。他染上了一个怪癖，老是去磨蹭袖子上那缺少的第四根饰带的地方。

03 (2)

至于我母亲，她对我从来只是妈妈。这个自身蜷缩起来的词，带着它那在唇端重复的辅音螺旋似的温柔，向我展开着一个茧子、一个避难所、一个鸟巢的形象；在它可以被看做主有代词的阴性形式的第一个音节中，我投射了彻底归属我自己的欲望，那个完全属于我的人只能归我一个人。一开始很容易的使命，但随后，在我来到世上三年后，随着一个小弟弟的诞生，就时时要求我使用一种外交手段和一种取巧诀窍了。基多，这个名字在我看来跟任何一个有名的圣人都不搭界，只是跟基多·雷尼画的圣塞巴斯蒂安稍稍有些关系，我一看到博洛尼亚博物馆中的这幅绘画，就喜欢上了它。油画表现了一个几乎全身赤裸的年轻人，双手缚在背后，被绑在一棵大树上，上身前倾，脸朝天抬起。身体的美，模特儿的青春，背景的音乐，灰色的微妙，从此启迪起我种种很不相同的情感。一开始，是画家名字和我弟弟名字的一致，只是它使我难堪，把我捕获：就仿佛，通过把这一光荣殉道者的形象跟那个作为敌手进入到我生活中的人结合起来，我就可以用利箭反过来穿透他，用他强加给我的折磨来惩罚他。在我们搬家时，在我们兴奋地打包收拾时，每当妈妈要帮他收拾床底下散了一地的玩具，我就大声宣称我们已经晚了，来不及了。假如，到达目的地时，我们已经看到父亲那可怕的身影挺立在我们新家的门槛上，紧皱眉头，轻蔑地脚踢着我们混杂的行李，那到底是谁的错？

甚至在他诞生之前，基多就让我受苦了。当他们要给我治眼睛时，妈妈还怀着身孕呢。马兰戈大夫穿了一件海狸皮领子的大衣。他的山羊胡子亮亮的，齐齐的，就像是用自己的皮毛装饰了他衣服的那同一个畜生的一撮毛。一个带有复杂笔画的巨大的花押字母，占满了半张药方纸。他把一个小瓶子留在我父亲手中，拧了拧我的脸蛋，出了门。我躲到我的房间里，担心父亲会打开我的门，尽管我用床头柜和两把椅子反着放，像筑街垒一样顶在门上。我听到走廊上传来的脚

步声。他摇晃了几次门把手，随后，一记巨大的声响宣告了我的溃败。

我们现在来到了厨房中：我躺在饭桌上，拼命地舞动手脚，并非出于重获自由的欲望，而是逼迫他使劲；他俯身朝着我的脸，嘴唇翻起，露出牙齿，用一只手阻止我乱动。另一只手摸索着给我点眼药水。我的肌肉突然松弛下来，我停止了挣扎，一种安逸的情感钻进了我的心田。

一天两回，小小的戏剧重演一遍：房子里的追逐，走廊中的逃跑，我被逮，我被捕，我搏斗，我反抗，我投降。他嘴里有一粒金子的闪亮。他君王一般的权势的标志，外加上美和神秘，赋予了每一处细节都交代得清清楚楚的场景：他在背后关上厨房的门，他把我从地上提起来，摊开在桌子上，用漆布把我束住，用他的手指头翻开我的眼睛，往里头滴眼药。

为什么会发炎，为什么是眼睛？嫉妒，害怕失去独一份的母爱？我问自己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那些场景，我演牺牲者，他演刽子手，比起夜晚的任何一次亲吻，比起彼此的爱抚，都使我跟妈妈更亲近了。跟她一样，我忍受着父亲的暴政；跟她一样，他折磨着我的肉体。他们在夫妇房间的寂静中的夜间活动，我为自己想象出它的双重面貌，一种血淋淋的仪式，一种天堂般的升腾。受刑和祝福：治疗眼病中的两个阶段也是如此。翻开我眼皮的手指头粗暴无度，我感到一种剧烈的疼痛，就像闪电般的撕裂。然而，第一滴药水刚刚落到角膜上，荡漾开来，我就发出一丝幸福的叹息。轻松的惬意随着撕心的伤痛而来，屈辱的羞惭迎了解脱的战栗。

但是，为什么总是厨房呢？真的是父亲把我逼到那里的吗？只要马兰戈大夫那带黄色标签的深蓝色小药瓶从客厅的架子上一落到他手中，我就该逃走了。牺牲应该在别处。在房屋尽头，在妈妈行祭礼的那一间，父亲决不进入的那一间，除非借这一机会。女人才待的场所，专门留给家务之用，扫帚、粗麻布拖把、洗碗布、锅、漏勺；这

洞穴与神庙，使我完成了向女性的变形，父亲会赏赐给我跟给妈妈一样的神秘献祭，要知道，他在两次吵架之间往往会赏给妈妈一个脸。

每当我一个人待在家里时，我会惊奇地看到，在他们那道天鹅状门把手关紧的门后的房间里，有一整套从伦巴第人商廊买来的家具：里头没有一件我所期望的珍稀家具，我想象，即便一个大理石地面的祭坛本身，像教堂里的那些祭坛一样，也不该是一个配不上我父母见面的布景。

巨大的婚床，那种黑暗礼仪的舞台，还以另一个理由刺激着我：它那四个反映出松木大衣柜形象的铜球，在从帕尔马到克雷莫纳的路上丢失了一个。

自我认同为女人，出于对遭父亲暴力侮辱的女性的同情而渴望扮演一个女性角色，拒绝在我自身性别的粗鲁、粗野、优越感中认识自己：换言之，我在成年时表现出的某些“好”，可以在我童年时受启迪的氛围中寻得。但是，要我同意，从我成长的家庭环境，从我的教育，从我对我母亲的“固恋”来“解释”我的肉体趣味（由此，你，杰那里埃罗，如果你那么令我喜欢，那是因为另一条道路，“正常的”道路，始终对我禁止！哦，对你的那不勒斯之美的可恨的无知啊！），要我同意，从我的家庭史来“讨论”我的恋男倾向（同时，让我看到，所谓“治愈”的援助之手，是一根有毒的稻草），那是我从精神病医生那里接受的所有善意中，最令我恶心的一种。

一幅欧洲地图让他们学到的东西，要比他们的医疗教科书远远得多。他们会看到卡萨尔萨处于何地，这个已有一半被奥地利和南斯拉夫争夺着的弗留利，那么一个边境之地，已经不再完全属于意大利了；他们会再把目光转投到拉文纳，这个中部城市，尽管它已经从中世纪时意大利首都的行列中退出，却仍然保留着往日强盛的斑斑痕迹；他们会说，一个见证了一个弗留利母亲被一个拉文纳父亲侵犯的孩子，是不是不会倾向于偷偷地结盟边缘来攻击中心，随后，把这一直觉的同谋扩大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父亲并不仅仅占据着一个地理上的中心位置（对我来说，这意味着均衡、秩序、标准、习惯），针对处在“外围”的我母亲（权利被取消，靠边），另外，靠着他那一身由战争部供给的军装，带装饰的肩章，威风凛凛的军帽，三色的证件，随时准备喊出的口令，他还是罗马、权势和法令的化身。这两个理由，让我拒绝服从规定，而向着一切不同的、例外的、在阴影中的、边界上的东西自动开放。不可抹却的默契，朝着我的每一个活动地盘延伸。我用方言写下我的第一批诗歌：并非出于对民间文艺的任何眷恋，也不是对田园天堂的任何幻想促使我做了这一尝试，我仅仅是选择了跟官方语言作对的“反中心”的母系土语。在政治上，我是自由射手；在爱情上，我是非法的；在旅行中，我更被也门人烟稀少的孤独景色吸引，更愿意前往文明世界的边缘，而不向往伦敦或巴黎那样的大都市。在我对郊区的兴趣中，并没有什么东西显出我特别厌恶城市，我只是觉得在郊区的空间中，就像在我自己家中一样。有多少次，我不等晚餐结束，会突然离开我的朋友们，乘上一辆有轨电车，一直来到终点站。乡野中的一个环岛，就像往昔罗马众多圆形空地中的一个：一点点发黄了的草，两条长靠椅上涂满了淫秽的字画，一个水泥的挑棚虽已破残，却还能挡风避雨。再远处，天幕中，衬映出几幢造了一半的民房的架子。我什么都不寻找，我什么都不等待，我脚踢着一只罐头盒，沿着铁轨走。电车司机向我发出信号：我跳上空荡荡的车子，重新朝光明的方向进发，心平如镜，静如止水。

04 (1)

由于无休止地颠簸，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我始终感受着生活的一种暂时性：我唯一的固定点是卡萨尔萨，是弗留利，是我母亲老家的房子，我们，妈妈、基多和我，每年一到夏初都要回那里去。一个邻居驾着一辆马车在火车站等我们。壮实的骡子不停地用尾巴甩打着两肋，驱赶苍蝇。我们穿越连接乌迪内和波代诺内的国道。村庄从公路另一侧开始，沿着唯一的一条街建造，小街一直通向教堂，然后分岔为两支，就像一柄叉子。我们家的房子位于左边的低处，几乎就在村庄的入口：一共三层楼，大门是单扇的，正面墙上开了五个窗洞，绿色的护窗板，正中央的窗户上摆着天竺葵。朋友酒吧就开在街对面。正在柜台后洗酒杯的年轻小伙计，一时间停下了手中的活儿，过来帮我们卸行李。他叫罗贝托，是我的远房表兄。再说了，在卡萨尔萨，谁还不是跟其他所有人都沾一点儿亲呢？半打姓氏足够五十来家人用了。仅仅科鲁西家、莫拉苏蒂家、波托兰家、葛雷戈里家、康佩西斯家就已经填满了教区的登记册和墓地的墓碑。

对多数人来说，他们姓的也不是意大利人的姓，就如村庄的面貌，蒂罗尔人的影响仿佛给房屋正面粗粗地涂了一层厚灰泥，在护窗板上撒满了粗大的钉子，在小院子里雕琢玫瑰，把谷仓的屋顶拉长，给阳台上的木栏杆饰上花彩，在厨房的墙上挂上能咕咕叫的钟，用鸭绒被代替毯子。长期以来成了我们主子的奥地利，把它的高山风貌带给了这个四周为一望无际的平原的小镇。即便从教堂钟楼上望出去，目光所及也不会很远，无法辨认阿尔卑斯山脉最初的层峦。从果园后马上伸展开的田野，以它一片秀丽的林地，叫人怎么也联想不起一种意大利或地中海的景色：除了出产卡萨尔萨特有的灰葡萄的葡萄园，你就找不到任何你喜爱的植物。你只能把你的面包浸在外地进口的油里。这里没有你母亲在她平台的花坛里种植的罗勒和牛至，你只有可怜兮兮的欧芹汁来拌你的西红柿，而古人却是拿它来做殡葬徽号的：

在你家乡，肉店主只用它来做点缀，插在店铺前宰杀好的小牦牛的鼻孔中。一条条运河的岸畔，播种的都是玉米，却见不到一块小麦田。在一片总是绿茵茵的草木丛中，笔直地划出一条条道路，路两旁则是一排排橡树和金合欢树。你遇到一些叫做英格丽德或特卢德蕾丝的姑娘们，名为古纳尔、迪特尔、弗兰茨的小伙子，都是日耳曼族的名字。

外乡人经过这里时，停下来只为在村头那家餐馆匆匆吞吃几片圣丹尼尔火腿，一对鹌鹑，外加一方玉米饼。在他们眼里，教堂的外表笨重而无趣；内部则穷乏而平庸。威尼斯的天才，在哥特式的宫殿、尖形拱肋的柱廊、并不遥远的乌迪内粉红色石头的住宅中闪耀出了光芒，而到了我们这里却栽在了实用的常理底下，撞上了农民们粗俗的土里土气，他们更愿意给他们的犁加一个铧片，而不愿意为公共水池增添一个槽口。他们的首府不是精致和优雅的乌迪内，而是位于另一边的、距离同样远的、有又矮又粗的城堡的波代诺内，它的财源主要来自棉织品生产，还有牲畜交易市场，靠着居民的数量和收入而变得相当兴旺，战后短短几年中，就跻身于省会的行列，那一次隆重仪式可以作为唯一值得纪念的日子，永远留在一个缺乏新闻的城市的年鉴中。“他们找了一个人做省长，可算是有了一个历史人物，”妈妈笑着说，她还记得那个时代，她在她姐妹的催促下，去了一趟波代诺内，好给她带回信封、铅笔和其他种种的文具。

嘲讽中透露出一种深刻的藐视，在拉特朗协定 签订二十年之后，天主教和教皇的弗留利始终在继续哺育着人们对意大利国家的这种藐视。在我童年时，卡萨尔萨的神甫堂·保罗是村民们承认的唯一头头，既是宗教头领，又是行政头领。而在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 身上，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曾从庇护九世手中抢夺了首都的人的孙子。堂·保罗为年轻的新婚夫妇主婚，因为对新郎新娘，法律并不强求他们去政府登记；这样，他们就避免了受篡权者的连累。新生儿的名字和死者的名字，都登记在教区的录事簿中，而不是在市政府的公文册中。我就

是在这种论战的氛围中长大的，这其中，宗教信仰并不意味与权势勾结，也不算为特权辩护，反倒意味着向中央集权主义国家政府的抵抗，以及对受威胁的少数派的保护。比如说，弗留利的教职人员总是尽可能地到处使用方言，那是一种偶然吗？办公机构的人员和一部分小学教师使用意大利语；而教士们，则应该有勇气和义务，反对一种在我们看来流露出外来意志的语言的传播，这有点像今天的情形，谁要获得一种职业，谁就得掌握英语。当我一开始投入到共产党人的活动中时，这个语言的问题引起了我很大忧虑，把我扔到了不可解决的矛盾中。我，一个左派人士，我怎能向我的朋友们证明一种民族方言的重要性，证明它可以作为民主进步与民主文化的工具呢？他们对我说，在穿教袍的人中寻找你语文学的同盟军，这是多么怪的想法！

我年轻时，真是带着唯一的爱和唯一的冲动，相信教会和福音书；无疑，假如有一种伪善和虔信的气氛笼罩着家庭，就不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我在我身边只看到活跃的和漂亮的女人，首先是妈妈，她的批评精神恰恰跟唉声叹气的恭敬背道而驰，而正是那种恭敬，使你的童年天性在圣葛雷高里小学受到压抑。妈妈心中有一种自然宗教：她在棚屋里揪下的玉米穗穗，她在厨房窗下压得吱扭吱扭直响的水泵，牛群踏在街上沉重的脚步，照在蜡亮蜡亮的屋顶上的太阳光，打在石板地上噼里啪啦直响的骤雨，这一切，都在对她说说着老天的言语。星期天，她带我们去望弥撒，听堂·保罗用弗留利语布道：村里人没有一个会缺席这一聚会，它的政治意义跟宗教目的同样显然。竖立在钟楼顶上的风信鸡宣告我们这片土地上的自由，并不比牧者用他羔羊们的方言宣讲的福音更崇高。

在天主教教义中，只有一点让我们，让妈妈和我气馁：对上帝的膜拜。我们怎么能接受，在永恒的王國中，有一个按照家庭中横行霸道的专制者形象制造出来的主？任何的君主在我们看来都是暴君，我们日常所见的例子太多了。因此，妈妈反复向我灌输一种修订和改正

过了的宗教，任何的王权都不能把它的辉煌，任何的父都不能把他的统治强加给我们。

新婚后，她去拉文纳旅行了一趟。她的大姑子小姑子，一成不变地穿着又僵硬又暗淡的孝服，带她参观了早先东方帝国大都会的大教堂和陵墓。她走进了神秘的中殿底下，阳光经过大理石方砖的过滤，在带云母片的花岗岩柱子之间，在小小的方形马赛克上点燃了一束五颜六色的焰火。她站在狄奥多拉 面前，沉默无言，女皇华丽的服饰令她惊愕万分。她跪在加拉·普拉西蒂亚 蓝色陵墓中的石棺前，在曾被马克西米连 高高举起的金圣盘前做了一个致谢的动作，跟好多鸽子一起喝了生命之泉飞溅的泉水——但是，始终，在祭坛上方拱顶的深处，她感到有一道目光在盯着她，一个施展圣事威严之豪华的万能之主基督那开放的、不动的、令人畏惧的目光。她不寒而栗，逃了出来，重新来到自由的空气中。阿里乌教徒 圣洗堂把她吓坏了：一阵剧烈的咳嗽和喷嚏，使她在教堂广场前的一把长椅上直不起腰来，把陪她而来的两位女眷惊呆了，她们不能像她那样，把一个已经有些讨厌的独裁丈夫的形象，跟在教堂后殿墙上隐约闪光的上帝联系在一起。

04 (2)

她新婚旅行后带回来的基督，不是在一群开屏的孔雀中坐在宝座上的无情审判官，也不是头戴金银珠宝的光环、手持雷电的救世主，而是拿撒勒人耶稣，在他死的那一天，穷困潦倒，被所有人遗弃，跟他出生在厩栏的干草上时一样默默无闻。她并没有意识到，拜占庭神学之所以惹她讨厌，只是因为拉文纳是卡尔罗·阿尔贝多的城市，她早已从她内心的宗教中，把可能让她联想起一个宣告拥有丈夫头衔、军官官衔的男人的一切都排除出去了；她从她接受的天主教教育中，只保留了哺育她母性直觉的东西，她忘了摩西的耶和华，仿佛他是一件无用的道具，消失在云山雾海中，她把自己的崇拜对象限制在伯利恒毫无保护的新生儿，在埃及的逃亡者，在荒漠中的孤旅者，在客西马尼园⑦的被遗弃者，在犹太人的囚徒，在各各他的钉上十字架者，在濒死时忍受着恐惧和干渴的人。直到不久来临的那一天，她自己有了一个儿子，可以把她的孤独之宝专门留给一个无刺无棘的造物：确实，就像所有的意大利母亲那样，但是，在她身上，带有更多的热情和眷恋，那都是先知的禀性赋予给她的。我就是这个儿子，她在无意中把他跟基督同化了，自己扮演了圣母马利亚的角色。

谁将说到福音典范对我世俗命运的影响？我根本用不着巴望罗马的那些重大审判，也不需要期待法利赛人溅在我头上的污言秽语，也不必等待卑贱地死在一个比骷髅地更惨的地方，就能成为本世纪第一个承担起这一神圣牺牲使命的人。从我最早的幼年期起，妈妈就把它给我留了起来。她相信她颇有预言性的直觉，在我幸福的青春期中也不剥夺这一点。直到冒出来最初的那些丑闻，证实了她的担心，我们之间有的，只是同谋般的低语，深深压抑的叹息，舒服的彼此抚摩，秘密的备考。从来没有一个儿子投身到世界上后，得到过更多的疼爱，更多的慰藉。当没有人指责我时，她在我无毛的脸上擦去未来迫害看不见的汗水。

要知道我的长子权对谁最珍贵，就该去问基多。可怜的人，他很快就感到，他得到的爱远不如我多，他受到的照顾和关心明显少多了。“我的二儿子，一个壮小子！”这种赞叹，家常便饭似的在女邻居面前重复，迫使他以男子汉的游戏锻炼自己，并当真习惯于此，其实，他并不比我更壮实。我母亲赏赐给他这种赞扬，只是为了把她的怜悯专门留给我这个被任意判定为更懦弱的人。

我弟弟看到我的额头上缭绕着神赐的瑞气，想把它吸一点点过去。有一天，我在干涸的河滩上跟村里的小孩子争吵，他在一旁那么起劲地为我辩护，以至于到后来，他们所有的侵犯全转向了我的保卫者身上。他们捡起卵石就朝他劈面扔去：他差点儿就被击毙了。他鼻梁上裂了一条口子，脸上满是瘀斑，衣服撕成了破条，狼狈逃窜。我母亲赶紧照料他，派人去叫医生，给他洗伤口，缝补衣服。但是，这段插曲并没有给他的脑袋戴上任何一轮殉道者的光环；母爱之心的圣幕并没有在他面前打开。我们对基督的兄弟们都知道些什么呢？然而，他们肯定也在受苦，见识弥留，忍受死亡：历史不屑于揭穿他们的隐姓埋名。差点儿遭受圣司提反命运的我弟弟，就像耶路撒冷正直的使徒一样，一直是天堂卫士中的一个哑角。他成了一个运动员，一个猎手，总是快快乐乐的，一副好脾气；出于谨慎，委屈地扮演着我的垄断留给他的属臣角色；向我母亲隐瞒他那低级的担忧和创伤，因为，性格上的一种不同，迫使他在嘴唇上凝固了注定默默无闻的“好小伙子”的永恒微笑。

他短暂的生命结束于一次英勇的行动，早我三十年拥抱了死神。他是如何迎着牺牲，明明白白地走向生命的终结，甚至可能还是不耐烦地自寻结果的，我到时候会告诉你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不让我这样想，为祖国献身的愿望在他心中并非主要动机；他默默无闻地寻求牺牲，是为了向他母亲证明，在他胸中跳跃的是怎样的一颗心，一颗谁也猜不透的心。但是，羔羊的位置被占据了。他赢得了恸哭声，被

洗干净，裹入尸布，装殓入棺，像一个简单的凡人。他的鬼魂到今天应该还在地下游荡，寻找着一个熟人，却被永远拒绝。

而我，我只要流下一滴鲜血，就足以让全家激动得底朝天。那是哪一年的事了？一个雨蒙蒙的下午，我窘迫万分地回到家中，骑自行车时摔了一跤，磕破了膝盖。我的姨妈们都被动员起来了。一个匆匆跑到药店去，一个忙着烧开水，而第三个从大衣柜里找出干净的布来擦脸盆。我一动不动地横躺在床上。妈妈坐在我床前的一把凳子上，用温热的湿毛巾敷我的脑门。我开始迷迷糊糊地睡去，不是由于痛苦的重压，而是由于衣裙的簌簌声和女性的叹息声，我的一个姨妈，就是曾经从波代诺内带回了一系列为祈祷书而配的宗教画的开文具店的那一个，从箱子里掏出一张基督上十字架的彩色石印画，看着我们全都彼此紧握着手，大声念叨着：“这是痛苦的圣母！”讥讽的欢呼，描绘出了我们家女人的性格。昂丽切塔，我母亲三个姐妹中唯一一个结了婚的，自己举起了她的小孩，我的表弟。妈妈的脸色红润起来。她松开了我的手，站起身，打发走了姨妈们，自己来包扎我的膝盖，动作干脆利落，像是护士。

她姐妹的恶作剧刚刚把她拉回到了大地。幸亏，幽默妨碍了我们，对我母亲是一点点，对我却是彻头彻尾，把事情看得太认真，即便情况比从自行车上摔下来伤了髌骨还更严重、更悲观时，我们变成了圣母哀痛的真正人物时，都不会太认真。我的姨妈们本来已经离开了我的房间，出门时还拿手当扇子扇着风，这会儿又重新出现了，一个个变形成了圣女，成了我的十字架之路的忠诚随从。三十三站苦路：三十三恰恰是我将要接受法庭审判的数目。跟基督的年纪相同。从我不安分的童年起，耶稣受难剧的演员们就在我身边站好了位置。我的生活可以写成是一种对耶稣生平的模仿。但是，我弗留利祖辈遗传的农民常理将保护我免除神秘的自命不凡。在我被人杀害之后跑在罗马街上，用红色的字母把猪猡猪猡猪猡的咒骂涂溅在墙壁上的耶稣会

修士，大声地叫骂骗子或疯子可能会觉得过分幸福。我开始哈哈大笑起来，重又想起了我姨妈的彩色石印画，还有她略显做作的讥讽。

05 (1)

离我弟弟遭石雨袭击处不远的河流，垂直地划破了弗留利：它的名字塔里亚门托兴许就来源于此。1797年3月16日，波拿巴在这里赢得了一次战役，打败了奥地利人，库斯托扎和卡波雷托的世代仇敌。我父亲把那次胜利记在3月5日，好跟我的生日吻合。他把波拿巴认做一个意大利将军，就如他把尼斯、科西嘉、一部分的尤利安山，以及卡林西亚的某些山峰，都归于维克托·伊曼纽尔的王权一样。

卡萨尔萨位于波代诺内侧旁，陆路只相距一两公里远。人们已经把房子建得很靠河边，无法再往河边靠了。你想象下一段宽得出奇的河床，满是鹅卵石和灰色的沙土，一年里倒有十一个月干涸露底；中央的一条水流，又窄又深；无数支流被砾石滩、荆棘丛和绿色的橡树林一一分开。既没有陡坡，也没有堤坝标志出河的边界。你走过满地碎石的坑坑洼洼的道路，来到这里。从来没有汽车光临，也很少有散步者。透过树林的枝叶，我们远远地看见横架在河上的大桥的铁墩子和铁桥面。我跟我的表兄弟们，跟罗贝托，跟村里的其他男孩，整下午整下午地勘探着我们的王国。在被大水冲来的树干底下匍匐，跳入冰冷的水中，接着，使劲舞动胳膊，狗刨似的游动，在被太阳晒得暖乎乎的沙土上打滚，在柳荫底下睡觉，登上一个陌生的小岛；寻衅打架，不过那是一种乱糟糟的混战风格，丝毫不能跟拿破仑的战略天才相比，尽管父亲关于他的说法有些歪曲史实：那些消遣，甚至包括我要提到的那一件，在我的心中，没有一样比得上对夜晚最初一抹阴影的等待，从教堂钟楼传来的晚祷钟的音符，在我头顶上悠扬飘忽，最终消失在昏暗的空中。

那时光，我感到了什么？两种宗教分享了我的心。一种，我已经留在了我身后的卡萨尔萨；它通过晚祷之钟悠扬的叮当声波，回响在我的记忆中；它对我说着基督教美德和义务的旋律话语。（假如你能原谅我这些陈旧的概念和说法，跟我在我的课本中学到的那些一样，

尤其是在为课堂而写的一部最著名小说的选段中，题为《心》，建设性格言集。）

女人的宗教（我把堂·保罗神甫归在女人一类里），保留给女人，局限在女性化的地点中：房子、教堂、水泉。那水泉，我从心灵深处把它读作“水泉”，而从不读成“洗衣池”，而且，在我看来，洗衣女们嗡嗡作响的活动，是无法跟一个阳性名词兼容的。对我来说，另一个家族风俗的中心是牲口栏，小姑娘们每天晚上到了挤奶时分都要去那里。我跟奥蕾丽娅很谈得来，她梳着黑黑的辫子，辫梢上扎着红头绳，身子一动，辫子就在肩膀上跳舞。她来我的窗前（我房间的窗朝向玉米地和甜菜地）叫我，然后带我一起去农庄。我拿上一只空桶，我们沿着村里的那条街，一边走一边踢着一粒小石子：就像跳房子游戏那样。家庭主妇们待在自家门口，用围裙擦着手。白葡萄酒烩兔肉煨在烧木柴的炉子上，面炸茄盒在油锅里翻滚，越橘酱在大盆中热腾腾地冒着汽，淡紫色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诱人的香味。我把这缕家常的熏香深深吸入鼻中，它跟弥撒时的乳香一样，令我肃然起敬。

每个星期天，一长队来忏悔的女人走到教堂圣器室，堂·保罗坐在黑暗的听忏悔间里，竖起耳朵，听取她们列数的罪孽。妈妈走在我的姨妈们前面；她们的嘀嘀咕咕，紧接在她的窃窃私语之后。当地的所有教堂，在同一时刻，全都沉浸在同一片喃喃的嘈杂之声中，从一个钟楼到另一个钟楼，整个威尼托区在信仰中团结一体。特伦托会议没有白白地在波代诺内一百公里之内召开：反宗教改革运动继续贯彻在我们的乡村。我母亲和她姐妹们的虔诚是诙谐的、带微笑的：但毕竟还是虔诚。她们做日课时穿黑色衣裙，不露胳膊，每餐饭前做祷告，星期五守斋。神甫们在玛丽-泰蕾莎的这些旧属地中，保留了他们的全部控制：尤其因为当地的爱国主义把神甫们看做它的支持者，他们才得到了更多的尊敬和服从。这样的一种气氛本来会令我窒息。但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这个神权的和虔诚的弗留利，并没有成功地取代一个世俗的弗留利，比野蛮的大侵略本身还更偏僻的弗留利，威尼

托人的弗留利，异端，放纵，赤裸，感性，肆无忌惮，不知羞耻。还没有倒塌之前的乡野天堂，而我们，塔里亚门托河畔的男孩子，让它阳光下的伤风败俗消散在我们江河般的大胆中。

我保留着那一时期的一张照片：我们中，有十来个笨手笨脚的瘦杆杆，只有我一人又矮又壮，大伙儿全都懒洋洋的，待在河滩上，穿着游泳短裤（有些人只是裆间系着一块布）。每个人都嫉妒地保卫着初生男子气的秘密，唯一的羞耻（更不如说是厌烦和狂躁，而不是羞耻），坚信自己跟年长的伙伴相比还是童男子。我是在多大的时候第一次做爱的？是在什么情况下？跟谁？所有启蒙小说中的例行问题，启迪了作者整页整页的文字。对我而言，这是荒唐的问题。假如人们问我记不记得我第一眼见到的蓝天，第一口吃到的苹果馅饼，我能够回答吗？我做爱，而毫不意识到是在“做爱”：当然更不用说，我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爱的边缘者，是在一座充满着障碍和危险的黑森林中冒险。我出于兴趣和饥渴做爱，就跟我肚子饿了要吃饭一样自然。对我来说，没有第一次的忧虑和辉煌，没有震惊，也没有要在床前刻下一个十字那样的纪念意义。只有压迫着摩西后代的罪孽，把跟一个朋友一起对快感的发现，变成了可纪念的事件。我靠着储存的健康又强壮的快乐（著名的“印欧基质”）而得以免除的罪孽，在天主教的外衣下，毫不受损地留在卡萨尔萨。我的根生长在这土壤中，在这异教的腐殖质中，我精力旺盛地从中飞出，像一支茎杆那样天真而又正直。

当一个伙伴回应了我的微笑时，我便跟他一起消失在了一个树丛后，或是钻进了一团密密麻麻的荆棘丛。担心遭到过于笨拙者和无经验者的审判。确实，我们对这不完全占有没有什么可吹嘘的，我们手段的暂时薄弱只能让我们局限于此。我们最好还是在一旁自己穷对付吧。但是，要放弃我们的行动，把我们“隐藏”起来，在我们之间是决然做不到的。晚上，当我坐在家中的餐桌前时，我并没有“说谎”的感觉，因为在晚餐期间，对我们的某些下午开花的游戏，我始终就缄口

不言；同样，我可以在我的床上，十分平静地接受妈妈的晚安吻别，而没有丝毫在河边柳树丛中犯下“错误”的感觉迫使我躲避她的目光。

我白天中最美好的时光，我已经对你说过了，是在回村前的片刻。我美美地躺在温暖的沙滩上，心满意足，一直等到晚祷的钟声给我一个出发的信号。浑身的慵懒，加上傍晚的幽思，多么惬意啊，这时，我还没有品味出我那两个世界之间的和谐吗！远处，各家各户集中在教堂周围，炊烟袅袅，祷告声喃喃（在此借用爱德蒙多·德·阿米契斯的话）；这里，生硬的动作，赤裸的皮肤，身上发出的盐和麝香的气味，幸福的物质感受。从钟楼上落下的透明音符，为我们的丛林之队带来了卡萨尔萨的祝福：当天上晶莹的信息，随着微明的黄昏，降落到我沉重的四肢上时，谁还能够怀疑，世上的一切并非全都是美的和善的？

这种天真的折中主义，是我少年时代的财宝。兴许，我很快就不不得不做出决定的隐约感觉，也增加了我的至福。再过几个季节，我就不可能有选择了：或者屈服于我母系的宗教，但要丢失我的天性；或者显示出我行我素的勇气，但要怀着一种背教者的糟糕意识。在天主教信仰中成长，从自己青春幻觉中摆脱出来的人，有谁能逃避这一两难抉择呢？把教会的道德和我个人的需要调和在一起的梦想，随着童年的其他幻想一起轰然倒塌。我毫不犹豫地选定了我的道路，但是，我渴望成为的，那么多傻瓜夸耀我已经成为了的那种自由人，总是带着基督教教育的羁绊。当一个人直到二十岁还坚持星期天去望弥撒，他就不可能穿着希腊人轻飘飘的长袍，游历世界。在我的诗歌中，我编织了跟一个乔托的同时代人同样多的对基督的赞美：假如一个葛兰西的弟子如此地关心耶稣，那么，当你看到你母亲，几乎一个字也不认识的人，在她的炉灶上方并排挂着一张斯大林的画像和一幅圣母的肖像，你还会觉得惊奇吗？没有一部电影能比关于福音的电影更紧地揪住我的心。在我的私生活中，我再怎么扔掉假面具，再怎么显出英勇顽强的样子都没用，我感到，在我的胸膛中跳跃着一颗犹太的心。

05 (2)

在我居留罗马的大约三十年期间，我是不是有一天忘记了为失去的弗留利叹息？神妙的伊甸园，它在天堂的鲜花丛中迎接了维吉尔的山毛榉。摊开手脚睡在河滩上，我是大地的儿子，却又没停止过属于亚当的世系。一种纯粹的悔恨之乐，从此后就再也没被允许品尝；我无谓地寻找，却找不到我最初激动中的那份天真。传到我耳畔的音乐，再也不是提提尔的芦笛，也不再是天使们的竖琴了。圣彼得大教堂的巨钟紧接着我们村的排钟敲响；它把我驱逐出基督教和国家；它曲解我所有的行为。想必我带着背叛者的傲慢违反了宗教戒律，怀着变节者的狂热听从了我血肉的冲动，本着活跃分子的宗派性保卫着我的事业，而我，我生来却是为了温柔，为了平和的。

（你看一看今天发生的事吧。基督教教育不再压在年轻人的头上了。弗洛伊德代替了耶稣。“胜利！”白痴们高呼，却没有意识到，实际上什么都没改变。一个精神分析学家会对我说：“跟你的小伙伴好好玩吧，在你这年纪，没什么可说的。直到十六岁，十七岁，你能所做的一切不会导致什么后果的。尽情地利用赐予你的准许吧。因为，随后，当然……”随后，必须成为一个男人。超越这一少年阶段，去发展你自己，去走向成年。一个阶段就是一个阶段！任何人在此逗留得比法定时间更长久，就是犯了未成熟的罪；就将被分配社会义务和社会责任的法庭判定为未成熟。我在问自己，杰那里埃罗，你那一代人赢得的是什么，你们从维也纳得到教益，而不是朝着拿撒勒跪拜。有罪，总是有罪！就像我们在三十年前那样，现在轮到你们犯错误了，尽管这错误不叫罪孽，而叫偏差，退化，固滞于一个过渡阶段。快快停止解释你那可怕的结婚计划，不要向我争辩什么你是独立于神甫行动的。你没有受到堂·米歇尔的影响吗？好吧。对别的压力，你让步了，更阴险更狡诈一千倍，因为，“阶段”的理论只是空中楼阁而已，你可以轻轻松松地吞并它，当你看着电视中紧急救援女士向你炫耀她

的夫妇广告公司时，当你在理发店翻阅杂志中的医药卫生栏目时，当你在酒吧台上喝空最后一滴带泡沫的奶油咖啡，瞟一眼《晨报》关于年轻人“问题”的社论时。还不算你那个共产党员的兄弟的演说，在阿尔法·罗梅欧公司当工头的那一个。)

姑娘们不跟我们一起塔里亚门托河。心照不宣的习惯，在悲剧差点儿发生后，它已经成为一条绝对的规矩。小奥蕾丽娅想陪我们一起去。“你会游泳吗？”罗贝托问她。她耸了耸肩作为回答，我捏紧拳头，走向罗贝托。他逃出了我的打击范围，捡起几块碎石。争吵突然停止，我们像什么事都没有似的来到了河边。奥蕾丽娅穿一条带花的布裙子，她脱下来，小心叠好，放在一块鹅卵石上面。单件式泳衣，用纽襻在肩上扣住，紧巴巴地包住她那两个刚刚有些隆起的幼小乳房，但她的胸几乎跟男孩子一样平。她举起胳膊，想整一整发髻。我记得我当时大吃一惊，因为我看到她腋窝里长满了密密的黑毛，比她的头发还黑，是漆黑的，被汗水沾成一绺一绺的。

罗贝托和其他孩子已经下到齐腰深的水中，招呼我们下水。奥蕾丽娅在那里晒大腿，闭着眼睛，脸冲着太阳。“也许她真的不会游泳，”我心想，懊恼自己没能跟小伙伴们在一起，白白浪费了白天里最好的时光。假如我现在站起来，我就成了人们一心想摆脱掉打发去玩的孩子了。我的自豪感命令我留下来，坐在奥蕾丽娅的身边。“你没有告诉过我，这里有那么多苍蝇！”她大呼小叫起来，突然站起身来。我抓起她的手，又往上游走了百十来步，来到一个更陡峭的地方。“我们来比赛吧，”我对奥蕾丽娅说。在河边涉水的罗贝托看到我们跳入深深的水中一定会惊骇万分。

她猜想到了她的能力吗？她是不是成了某种不舒服的牺牲品？游到一半时，我回头望去，想看看我到底领先她多远。她在一个漩涡中挣扎，沉下去，又艰难地浮出水面，几乎窒息。水流把她卷走了。当我到达对岸时，她已经消失在一个漩涡中了。她一条辫子上的红布带像一个瓶塞那样漂浮着，随后也不见了。我的同伴们已经一边沿着河

奔跑，一边呼叫我的名字。我跃入河流中，抓住奥蕾丽娅的头发，把她拖到岸上。幸亏还算及时：她昏迷过去了，眼睛紧闭，浑身冰冷，在我的怀里一动不动，说是还活着，还不如说已经死了一半。

我们把她放倒在沙滩上。一些人掰开她的嘴，另一些人摇着她的胳膊和腿。而我，我已经没有力气了，坐在她身后那块她脑袋枕靠着石头上，只是一个劲儿地抚摩她的头发。她显得多美啊！他们为什么不让她安安静静地待一会儿呢？苍白而又魔幻，像是一朵荷花，我更喜欢她这个样子。有一阵子，我还以为她死了。我开始神经质地战栗起来，不是因为悲伤（尽管在我所有的女伴中，奥蕾丽娅是最合我口味的一个），而是出于某种莫名的亢奋，如果翻译成文字（假如我可以把我的内心思想归纳起来的话），它就是这样一段荒诞的惊呼：“你死了，我爱你！你从来没有比现在更令我愉悦！你就这样死去吧，好让我永远地爱你！”

她吐了很多水，只受到一点惊吓。但是我，我已经不再是我了。塔里亚门托河的溺水女，不断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夜晚，我打开我的窗户，朝着沉睡的田野呼喊她的名字。只有遍洒在果园和甜菜地上的月光，以它的寂静回答着我。或者，远处传来一声狗吠，作为我叹息的回声。我恋爱了，疯狂地恋爱了，像人们能在十四岁时能爱的那样，爱上了一个人，而在此前，我跟她的接触仅仅局限在好伙伴的关系上。但是，这种爱跟我在小说中读到的情景根本不是一回事：我不仅没去接近奥蕾丽娅，反而总想着躲开她。早先，我毫不别扭地陪她去农庄，让街上的人看到我们在一起走，尽管那只是去挤牛奶，帮她拿一下奶桶，而现在，当她来到我窗前，发出约定的信号时，我却尽量避免答应她。她远远没有掉价，像她兴许认为的那样，反而，她简直升上了天。自从我发现了她毫无生气的重影后，这个长辫子飞舞不停的活蹦乱跳的小姑娘，就再也不能引起我的兴趣了。我觉得她太活跃了，太多血质了，太生气勃勃了：太女人味了。只有另一个奥蕾丽娅，苍白而死沉沉的，躺在那里就像一个陵墓中女王的奥蕾丽娅，才

能激活我的想象力。躺卧着，她却征服了我；躺卧着，我却愿意继续亲近她：她变了面容，完全由别的物质而不是由血肉所构成。

就算她真的死了，警告也不会因此而更为清晰。对我来说，她如果不是使我第一次隐约看到命运的机会，那又是什么呢？“拒绝女人，却欣赏女性雕像！”当我拧着她水淋淋的发辫时，这就是停留在她紧闭的嘴唇上的秘密。只要这个夏天持续着，晚上我就在我房间中哭泣。为什么流下这些只有月亮才能作证的眼泪？没有一次我不在想，我再也不要再在窗前发疯，把我的怨诉跟夜风混在一起，而应该冲出屋子，到村庄中去找奥蕾丽娅。这可怜的姑娘，不知不觉中，她教会了我分辨出我的真正目标。我只能爱她坟墓中的面容，她大理石的躯体。再后来，我还能喜欢的女人，就只剩下一些著名的演员，还有以其显贵的荣耀令我无法企及的歌剧女明星。意识到妨碍我接触她们的障碍，就是我与她们最牢固的联系。奥蕾丽娅那死人般的永恒之美，把我跟她拴在了一起。我会时时闭上眼睛，以求重见溺水女孩的形象，河边的场景，在我丧葬性的幻觉中，变成了一种葬礼仪式。“别了！”我冲她喊道，仿佛我在为她守灵，她不是昏迷在河岸上，而是躺在了棺材里。“永别了！”我嚎啕得更凶了，丝毫没有猜想到，我已经把我自己的一部分，代替奥蕾丽娅送进了坟墓。

1936年：回到博洛尼亚，一直到1943年。从十四岁到二十一岁：决定性的时代。在加尔瓦尼中学的学业结束：学校名称来自博洛尼亚一个著名的医生和物理学家，他的护佑使我的父亲欣喜若狂。他不拿好眼看他儿子，因为这小子着迷于文学，而老子，本来一心指望他在自然科学方面发展趣味。对他来说，文化应该是“积极的”。而且，在职业军官看来，到一所校门上镌写着镀金字母“路易吉·加尔瓦尼”的学校里上学，就是对“精力”的一种恒常邀请。他听说过著名的青蛙实验：有一天，这位学者的解剖刀刚刚碰到一只新杀死的雨蛙的内股神经，可怜的动物立即剧烈地抽搐起来。“你激动吧，你激动吧！”上尉对他的两个男孩子重复道。这场文字游戏简述了他的政治信念，还有他喜爱的那一类教学方法。作为坚定的法西斯分子，他并不把脑力劳动跟某一种肌肉活动截然分开。文化不应该仅仅只是“积极的”，还应该是“刺激性的”、“有伸缩性的”、“令人振奋的”。某些晚上，当他看到我还在读教科书时，他甚至还管我叫——这是他给我疼爱的唯一证明——“青蛙”，“小青蛙”，对这个外号，他期望产生一种刺激性效果，就仿佛每当我钻研一门功课时，博洛尼亚的历史性两栖类动物就将把它几伏特的动物电能，送入我蜷伏在印刷体文字前的身体中。

为把我的文学趣味引入正道，他突发奇想，替我报名参加了由米兰一个大出版商举办的一次竞赛。瓦伦蒂诺·蓬皮亚尼不久后就出版了一些作家，如莫拉维亚和维托利尼的作品。当时——你将会明白，比方说，在30年代，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何等程度上玷污了最不驯顺的心灵——他组织了名为“钢铁之书”的竞赛，征求一本“为小男孩而写，而且由一个十到十三岁的小男孩来写”的小说。“你们肯定知道那精美的《钢铁之书》文丛：为少年人而出版的现代的、诱人的、金属般的书籍。”（这“金属般的”，我猜想，应该是对加尔瓦尼的青蛙的回忆，不过可能不太合适。）随后（我给你再复制一个刊登在一本

也是由蓬皮亚尼印制的文学年历上的原广告）就是那十二部不是并非纸做的而是金属的（令人失望的是，这种著名的不易磨损的材料，竟没有拯救一本书于遗忘）作品的书单。“我们打算在这一系列中再加上第十三本，是由一个小男孩自己写的。请你们想一想，看到你们的作品放在所有书店的橱窗中，在你们这小小年纪就能像大人一样赢得某种百分比的作者版税，这对你们将是一种何等的满足啊！”

这一金融诱饵看来很不合上尉的趣味，他考虑到自家的经济拮据，平时也总想巩固一下原本靠军装和武器还难以保障的不太稳固的财源。但是，他在下一页读到的内容，却叫他心花怒放。出版商发出了一个震撼人心的“致家长的号召”。“今天的青少年，讲究实际，追求实惠，跟三十年前为十分知名的作家所写的历险小说带来成功的青少年大为不同了。甚至那些长期来被认为是此类题材中的杰作，具备丰富的传奇性和科学预见性的书，现在也只能归类于简单的历史性猎奇之列，因为在我们今天，潜水艇穿梭于各大海洋，飞机嗡嗡地翱翔在各大洲的天空。我们难道还要停留在那样一个时代，一部小说就足以刺激你们的儿子离家出走，把拉合尔土邦主的女儿从火刑堆上救走吗？”

当然，我开始摆脱儒勒·凡尔纳和欧杰尼奥·萨尔加里（然而，同时又觉得卢齐奥·堂布拉的做法有些过分，他是“金属”小说的十二位作者之一，在他那部极为现代的、对青少年来说极具活力的、名叫《我的三个火枪手》的作品中，他竟然把阿多斯、波尔多斯、阿拉米斯和达尔大尼央替换为……四条狗：无疑，始终为了纪念“动物之电”）；而且，在真的把我在卡萨尔萨的小女伴从水中救起之后，我没有丝毫欲望在想象中飞越蓝天，去拯救一个印度公主。但是，蓬皮亚尼年历上的奇妙允诺，已经不怎么能诱惑我这样的一个人了，我通过在旧书商那里的搜索，刚刚独自发现了《麦克白》、狄更斯、果戈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些书跟潜水艇水手和飞行员的理想，跟召唤着我们青春抱负的基础活力论离得是那么遥远，更何况，我是在一个带有神魔名

称的走廊下买到它们的，那条长廊先是围绕着博洛尼亚的马焦雷广场，然后又沿着圣佩特罗尼奥大教堂的左侧延伸。

人们把那些带柱子的走廊叫做“死神柱廊”，因为它所支撑的建筑，今天改做了博物馆和办公室，以前却是医院。我不知道这一来历；我照着字面的意思来理解这一地名学上的任性。在我看来，待在它们摊架后面的商人，便是世外的鬼魂使者，尽管他们肥胖的身子使博洛尼亚的烹调出了大名。我不对我自己说：“让我们去买一本书，”而是说：“塔纳托斯 有什么新书能提供给我吗？”阅读，把自己同化为小说和戏剧中的人物，对我来说，就是向法西斯分子大肆鼓吹的这一“生活”转过背去，而进入到一种死去的神话中，面对着死神的炫耀，我那几乎日常的受难之路在邀请我进入其中。

当巴多里奥将军 把意大利国旗插到埃尔阿兹拉河和朱巴河的岸上时，我在其弯弯的河曲中锻炼体魄的河流却叫做科基特、忘川、弗雷谢通、斯提克斯。当我待在静静的房间中，远离收音机的电波，打开那一本新书时，埃塞俄比亚吵吵嚷嚷的胜利对我又有什么关系？那本书，我是从衣服兜底掏了半天才掏出来一枚奥波尔来，在连拱廊的吝啬鬼卡隆 手中买下的。我父亲的雄辩言辞也好，瓦伦蒂诺·蓬皮亚尼的慷慨提供也好，都无法刺激我把我的羽笔浸到书中人物那鲜红的、促人强壮的、真正男子气的血泊中。我不会给“钢铁小说”的卷帙增加第十三本不锈钢的杰作。就算我试图在狗性的文学中扬名，我也不会让卢齐奥·堂布拉的四个火枪手开口，只会让看守地狱大门的三头犬刻耳柏洛斯 说话。随后，轮到由我决定写作和发表的时候，我知道，我会开始下到普路同 的昏暗王国中去。

瓦伦蒂诺·蓬皮亚尼年历的插页中，充满了谜语、笑话、文学小游戏、针对名人的滑稽故事。我还记得，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假如你成了隐身人，你会做什么？”一个先锋派作家回答道：“我要去邓南遮 家里，偷偷地趴在他的耳边说：悔过吧，你。”这是双重意义上的讽刺与挖苦，同时构成一个勇敢的举动：一切取决于人们把这一未完之句补

全的方式。当绝大多数读者（尤其是女读者）依然被独眼的行吟诗人⑦的里拉琴征服，会说：“悔过你曾诱惑了那么多的女人，在缪斯的祭坛上烧了那么多的牺牲，”（美妙的赞扬跟原则上的诅咒交织在一起，）少数真正了解他的人会明白：“悔过你曾写了那么糟的诗”，而政治上最大胆的人说：“曾成了墨索里尼的朋友。”这些就是作为反对派的花招，只为让人们听到一种被警察的纠缠压制住了的声音。

博洛尼亚曾是一个历史事件的舞台，它留在了法西斯主义的年鉴中，而我也因为我父亲所扮演的暧昧角色，被牵涉在里头。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意大利艺术界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以他那狂躁易怒的性格和飘飘长发的形象，体现着对领袖的反抗。除了某些像他那样的知识分子和一小部分共产党人之外，整个国家都对领袖俯首称臣。王朝、议会、参议院只是作为点缀门面的傀儡机构保留了下来。法西斯党严密控制了银行、工业和工会。最后的自由堡垒《晚邮报》，在阿尔贝蒂尼离开之后也举手投降了。只有斯卡拉歌剧院还在享受着某种治外法权。只要领导权还在托斯卡尼尼手中，在所有学校和所有公共建筑上都挂满了独裁者画像，就决然进不了米兰这家大剧院的门。在此期间，皮埃特罗·马斯卡尼，官方的谄媚者，为了挽回他从《乡村骑士》以来所有作品的彻底失败，写了《行会之歌》和《劳动颂》。奥托里诺·雷斯皮吉（博洛尼亚的另一光荣！），普契尼死后的意大利第一号作曲家，在一些直接献给暴君的交响诗中，竭力恭维了罗马的山岭、水泉和松林。

五月的一个星期天，托斯卡尼尼来到了博洛尼亚。他下榻于布伦旅馆，玛格丽特王后喜欢的豪华老旅馆，一些没落贵族常住在那里，带着他们自己的家具；后来，这旅馆毁于轰炸。当天晚上，音乐大师就得在市立剧院指挥一场音乐会，以纪念朱塞佩·马尔图奇，这位长期担任音乐学院院长的音乐家。出于纯粹偶然的原因，这个星期天正好是五月集市开幕的日子：这一集市在我们的城市中非常重要，专为猪的产品而设（博洛尼亚的莫塔代尔大香肠，摩德纳的粉猪爪，伊莫拉的熟肠）。《卡尔利诺》在它的第一版上，以一帮穿褐色衬衣的少年的形象宣布，出席定于晚上九点半开始的音乐盛会的，将有本地老乡莱昂德罗·阿尔皮纳蒂，国务秘书，还有音乐迷们骄傲的最高主体，墨索里尼的女婿本人，加莱阿佐·齐亚诺。文章的作者并没有暗示，那些政界要人赶到艾米利亚区的首府来，更多地是为了参加在集市帐篷下摆开的丰盛的猪肉之宴，还是来出席谦逊的已故音乐大师的降B大调小提琴与乐队协奏曲。作为谨慎的奉承者，记者最后向当地的所有法西斯分子发出一个号召（我父亲会说，“激动吧”）：对阁下大人的欢迎应该跟阿尔巴尼、阿尔加迪、比比恩纳家族、卡拉齐家族、多梅尼基诺、塞里奥（他不敢说：莫塔代尔大香肠；姓氏的字母排列顺序证明，他刚刚在粉红纸页的词典中温习了他的知识）的故乡相称。“我们所有的旗帜将迎风飘扬，横幅颤抖着像是四四方方的战旗。”

可惜啊，要使军旗手的这一庆典赢得完全成功，就必须让风儿吹起，带来某种气流；但是，无论是从亚平宁山脉下来的北风，还是生于亚德里亚海、从波河河谷钻进来的西风，都不愿趁此机会抛头露面。一阵沉闷的春暖笼罩了城市。没有一丝风波掀动高挂的旌旗，一排排旗杆全都垂头丧气。唯一的一阵风是我父亲刮起来的，他踩着午祷的钟声，风风火火地赶回家里。只听得房门一阵丁零咣啷，他一句

话也不对我们说，就把自己关在了房间里。我们看到他重新露面时，已经是一身军礼服，满脸充血，气急败坏。

“复仇，复仇！”他喃喃道。

他喝了一杯鸡蛋利口酒，对我们解释了这突然激动的原因。利帕里尼教授这位著名的人文主义学者，小学教材的作者，博洛尼亚市长，赶到了布伦旅馆，给大师带去致意，并请他在两位大人物进入剧院的时候，指挥演奏法西斯颂歌《青春》。“您疯了，”托斯卡尼尼反驳道，“即便是国王们，也从来没有这么大的派头啊，他们可是常常出席我的音乐会的。我，我只指挥严肃的音乐。”在一次如此巨大的冒犯之后，我父亲补充说，瓜达尼省长召集了警察和军队的所有头头。难道还猜不出会有一次动乱吗？我们只得吃了一顿他不在场的午饭；他的职责把他召唤到了省府；公共秩序乱了。

接下来的那半天，便是紧张的谈判。两位大人阁下将坐专列从罗马来，只能在七点钟时到达。他们将直接去圣路加山岭，先用猪肉大餐填一下肚子，然后再在音乐的庆典中打开他们的听觉之门。好好先生托斯卡尼尼建议求助于市立军乐团，他们可以在剧院门口的台阶上，露天演奏法西斯颂歌。这一妥协的提议，被当做一种补充性的嘲笑（它兴许就是）。联邦秘书基内利恼羞成怒，问他还要等什么，是不是该往这蠢猪的脑袋上揍一棍子。终于，晚宴开始了。当九点钟敲响时，入宴者往手表上膘一眼（只有齐亚诺除外，他戴的是怀表）后，就赶紧往嘴里送双份的雅科波（这是中世纪时佩波利伯爵家一个厨师的名字）猪头肉冻，谁也不想漏掉一两，必须警告国务秘书和新闻宣传部长，他们将在剧院蒙受一次史无前例的侮辱。

墨索里尼的女婿哈哈大笑起来。“上帝保佑！”他欢呼道，因为痛饮了冒泡的朗布卢斯科酒，嗓音略略有些发粗。“我们可要当苦差了！”一个跟已故的马尔图奇同样外省味十足的艺术家的作品，不足以刺激一只不辨音律的耳朵的好奇，对此，你还有什么好吃惊的吗？同时，还必须记住，这位实在没什么名气的作曲家的功绩，以及他今天

被人纪念的主要原因，是在博洛尼亚指挥了《特里斯坦》，这是意大利人对该曲目的首次演奏。尽管大人阁下对欧忒耳珀的魅力充耳不闻，他恐怕应该知道，拜罗伊特小矮子 和谐的音符，给他岳丈在阿尔卑斯山另一侧的伟大朋友和典范，带去了多么特殊的乐趣啊。当阿尔皮纳蒂示意省长，让他先行独自下山回城，别再拿一个老疯子的妄想为难他们时，齐亚诺很高兴找到了一个取消决定的借口，给他的皮带又松了一格孔，又给自己上了一份肉冻。坐在他右边的国务秘书，则小心翼翼地抓住木头夹子，朝装酸黄瓜的大口瓶扎进去，然后往他威严的邻座的盘子中，放下一根奇形怪状的、浮肿的葫芦科瓜果。

但是，在山下，闷热的城里，好气氛一下子被糟蹋了。所有那些准备，所?那些忙乱全都化为无用！基内利对部长们的放肆甚为生气，到处找碴儿发泄怒气。被排斥在宴会外的年轻军警们，早就以第四速度匆匆吞下了他们天天都吃的博洛尼亚糟糕口味的夹肉馅饼。在联邦秘书的鼓动下，他们集中到了剧院门口。当年曾经抵抗过罗马军队的父辈留给城市的古老自豪感，最后一次从唾沫四溅的嘴里喊出。他们甘心做任人戏弄的土火鸡吗？我父亲加入到他们当中。他被齐亚诺的回答激怒，他无法宽恕自己竟然饿了一顿午饭匆匆赶来救援法西斯的荣誉，而它天然的重臣却恬不知耻地轻易牺牲了它，只管在那里埋头狼吞虎咽。

托斯卡尼尼坐着他的汽车来到了。一只脚刚落地，他就看到自己被一群虎视眈眈的人团团围住了。

“您是不是准备好了演奏《青春》？”

“不，”大师再一次明确答复。

他们开始推他，搯他；一记拳头落到他的背上；他的毡帽落了地，疯狂脚把帽子碾了个粉碎。在国际新闻界引起轰动和愤怒的是，他劈面挨了一个巴掌。一个证人发誓说，他看到P上尉扬着手。另一些人，则相反，祝贺在场的军人平息了骚动。一个佩戴三条饰带（我得到的唯一细节）的军官为避免事态扩大，帮托斯卡尼尼又上了

汽车。大部分示威者，以基内利为首，一直游行到旅馆。联邦秘书向大师提议，请他立即离开博洛尼亚，声称公共当局再也无法保证他的安全。托斯卡尼尼在一队冲锋枪手的护送下，当夜出发去了米兰。不久之后，他就离别了他的戏剧和祖国，移居到了美国。

这一故事毫不损害集市的兴旺，一年一度，它的帐篷都会重新支起在摊位上。托斯卡尼尼，无须多言，在猪猡事件中又增添了他的一份荣誉。至于齐亚诺和阿尔皮纳蒂是不是避免了消化不良，史书并没有记载。艾米利亚精美猪肉制品的唯一确实的牺牲者，是可怜的马尔图奇，他的作品那天晚上没有演奏，此后也没有任何机会做纪念性演出。

我们战前的伟大权威和伟大小丑：阿契雷·斯塔拉切，国家法西斯党的书记。他要求男人们收紧腹肚，挺起胸膛，而女人，生育的机器，则应该是丰乳肥臀。在战胜埃塞俄比亚之后，我们应该呼喊：“帝国的开创者领袖万岁！”报刊接收到一系列极其繁琐细致的指示。不能写：“他们握手言和”，而要写：“以罗马方式致意”。不能写：“市长放下了第一块基石”，而要写：“狠狠挥下了第一镐”，因为动词“放下”并不表示一个相当有力的动作。要避免说，一个大人物“安坐”到了一个新的职位上：这样说，产生的效果会更糟糕，使人以为一个头头一开始当真坐了下来。“法西斯”盛大节庆的日子，掌旗官从城市各处走向体育场时，严禁把小旗子卷起来夹在胳膊底下，也不允许裹在报纸中。命令各达官贵人游行时跑步前进，仪式开幕时要有体操表演，比方说，并住双脚在刺刀上跳跃，或者纵身跃过燃烧的火圈。

空军元帅意大洛·巴尔博拥有一座四面环水的圆堡，借给那些“大西洋人”（征服海洋的飞行员）二十四小时。这些英雄中的每一个都有权升起吊桥，跟他选中的女人一起，在备有必要食物和烹调用具的城堡中度过一整天又一整夜。

罗贝托·隆基，卓尔不群的历史学家和艺术批评家，也是我上大学时听过课的教授，教导我们要认清法西斯主义，不仅要在闹剧一般的滑稽和可笑中分辨它，而且要在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象不到之处认出它来。这一教诲是那么珍贵，而就在同一时期，人们被一条口号所激励：“把你们的金子贡献给祖国”，男人们交出领带夹，女人们拿出耳环，夫妇们则奉献他们的戒指。而贝内德托·克罗齐本人，意大利的良知和意识，自由的王子，走出了他的那不勒斯宫殿，交出了他参议院议员的纪念章。

隆基——帽檐搭在眼睛上，鼻子像是鹰钩，丝围巾裹着细细的脖子，激烈和嘲讽的字词令人心寒——在藏波尼街的老房子外边训

练我们，根本不拿课程表当一回事。我们从两座高楼，阿西内利楼和加利桑达楼底下走过，沿着从中世纪起就一直没变样的珠宝商小街走（而不选择里佐利街，以前又叫科西嘉人街，满街都是银行和豪华商店的那一条），一直走到马焦雷广场。在那里，做一次教学停留，背着最高行政官的宫殿，面对圣佩特罗尼奥教堂，大教堂那高大而又威严的正面，竖立在广场的另一端。我的朋友亨里科，已经长出了小胡子，跟凉廊里的卖花女郎调情。而我，我则把教授的话一字不落地全部装进耳朵。

法西斯主义？意大利历史的一个老话题，他用干脆利落的句子肯定道。避免把它跟墨索里尼的制度相混淆。博洛尼亚，以它长达数世纪的反对罗马帝国的斗争，早在法西斯主义一词出现之前就在反法西斯主义了。教皇们的野心受到了城市的抵制。城镇嫉妒它的自主，教会贪婪地扩张。那次战争的后果，我们都看在眼里。

“从12世纪起，神圣教廷就贪婪地下令建造一座献给圣彼得的大教堂，而公民们针锋相对地提出建造这一方形教堂的计划：教堂要奉献给我们的主保圣人、艾米利亚的第一任主教佩特罗尼奥。根据规划图，它应该覆盖比罗马圣彼得大教堂本身还更广的面积。中殿占了极大比例，是全欧洲最高的。但是，在它的其他部分中，你说得对，皮埃尔·保罗，则是未完成的杰作。城市经历了二百年的独立后，到了16世纪，教皇特使红衣主教们把城市带回梵蒂冈的治下。为了阻止泥瓦匠们完成教堂的建造，他们让人沿着工地建起了一个宫殿，只有两层楼高，却延长得不成比例：这样一来，教堂的侧翼就不可能再建了。你们自己总结一下吧，然后告诉我，白痴们所吹嘘的这一建筑不能在你们面前更早地竖起来，而且它的中殿不带耳堂，是不是我们失败的见证。”

我们的良师就这样说着。所用的词语对我来说特别有启示性，尤其是因为，对一次如此的失败负有责任的宫殿就建在死神柱廊上。亨里科丝毫没有意识到图书买卖和教皇专制主义之间的这一意外结合在

我心中唤醒的骚动，一只手捻着他的小胡子，另一只手在报春花丛中乱拨弄，劝说着年轻姑娘推着她的小车跟在我们这一小队人后面走，沿着连拱廊一直走上圣佩特罗尼奥教堂的圆室。或者还不如说，一直走到圆室尽头，因为，作为他证据的最后一个关键，罗贝托·隆基为我们显示了，半圆形后殿本身是怎么在规划中得到了保留。从我们歇脚的加尔瓦尼广场，从那个无所不在的物理学家雕像底下望去，可以看见一堵笔直的墙，一下子把这残损的建筑围封起来。玛提亚斯趁着这次歇脚，三步并作两步溜进了最近的卡佩利书店，在书架上小心翼翼地翻寻起来。后来，他居然赢得了这家书店的大伙计，一个叫奥泰罗·马塞蒂的人的同情，后者跑去找圣多明我广场上的一个老书商，让他下决心出版我们最初的几部诗集。

我们一共四个诗人，每天都要聚会，漫无目的地在连拱廊下游逛，有时候一逛就逛到凌晨，能碰上早起送牛奶的小伙子把奶瓶放到系在窗下一根绳子上的木桶里：亨里科，那时迷恋着马焦雷广场上的卖花小姑娘，把兴趣放到植物学的隐喻上，而后来，当他醉心于一个服饰用品女老板的女儿时，就把他的诗歌按照绣花和贴边的式样来剪裁，最后，在一种更成熟的爱好影响下，他终于成为帕斯科利合格的继承者；玛提亚斯，你看到过他躲在灰尘蓬蓬的书架之间，寻找着珍本图书和宝贵文献，以它们卡尔杜齐式的食粮来哺育他绝对博学的缪斯女神；最后是达尼艾尔和我，唯一打算从事美术工作的人（达尼艾尔甚至还练习绘画），当罗贝托·隆基认为我们这两个人还准备听他最后的即兴讲课时，班里的其他人都已作鸟兽散了。

在漫步中，他为我们指出，他辛辣幽默地称为罗马之鹰的不同胜利是什么东西：比如说，科西嘉人大街上房子的宽阔橱窗，大约在上一世纪末，代替了木头的挡雨披檐和艺匠们可拆卸的摊架。复兴运动时期的资产阶级结束了柱廊共同体。中古时代市中心的开膛，笔直大道的开掘，官方大楼的增生，广场上雕塑的竖立，带悬垂式阳台的笨重墙面（这是一种装饰，它跟那种连拱廊文明根本无法兼容：阳台只

是房主们对街道的一种轻蔑让步，他们决定在门锁的保护下闭门不出），挑檐、玫瑰花窗和装饰线脚的滥用，野心勃勃的趣味彻底糟糕透顶：这就是翁贝托时代的遗产和中央集权制度的直接后果，远在墨索里尼的钢筋混凝土建筑、凯旋门、体育场、储蓄银行、邮政局和农业研究所之前。

“你们听到了吗？”隆基突然问我们，他的食指指向一扇打开的窗户，从那里传来一架收音机清脆而平静的声音。我跟达尼艾尔交换了一个惊讶的眼色。在这个宁静的春天下午传到我们耳朵里的，不是威尼斯广场上洪亮雄辩的嗓门：而是一个文化节目播音员的严峻沙哑的声音。在皮兰德娄⑦的逝世纪念日，他简明清晰、毫不夸张地表达着对作家的纪念。教授不是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满意？他为什么以愤怒的动作，把他的帽子扣得更紧，就仿佛要堵住耳朵？

“装腔作势！拙劣的伪造！”他好几次叫嚷起来，根本不顾我们惊诧的目光。“真正的瘟疫！”片言只语中，他向我们展现了自己的思想。尽管意大利的裁缝将只有一件事可做，即缝制褐色衬衫，但他们不会成功地用一件统一的斗篷覆盖意大利，就像从马里奥山的播音室里播出的这一单调声音，流传到台伯河两岸。但愿博洛尼亚从来没有把生命给予古里尔莫·马尔科尼！他为罗马提供了一种方法，不可抵御地把全民统一的矫揉造作的典范强加给我们。八十年的学校义务教育、兵役制度、立法选举和税收平等，全都在电波中搁了浅，而一次几分钟的节目，关于任何一个主题，却能借助电波一下子来到所有听众耳边，无论他们在哪里听，是在西西里岛帕罗港的悬崖上，或是在多罗米特小木屋的啤酒馆桌子前。一代，或者可说是两代人，他们可能忘了他们的语言、他们的习俗、他们的特性，来适应那种官僚主义的、使人愚蠢的话语，那些现成的观点，那些平淡无奇的片段。

“昨天，他们赞扬了托斯卡纳人乔托在帕多瓦圆形剧场的壁画，”教授补充说。这时候，我们明白了，他为什么会发那么大的火，他的话语当然不是当地方言的某种杂糅（你记下了他使用的虚拟语态未

完成过去时，跟他那有些老化的高音之泵十分相称），而是最精确、最精练的意大利语，是对阿格里琴托的诺贝尔奖得主 阿谀奉承的无名氏使用的那种意大利语。多年来，隆基致力于重新光大被官方艺术批评所遮掩的14世纪的博洛尼亚绘画（“粗野的、冲动的、大众的”）。官方批评只注意托斯卡纳画派，不自觉地拜倒在佛罗伦萨（那时候的罗马）牺牲了艾米利亚诸城市后所获得的政治优势面前。

07 (2)

始终是中央权力对地方表达小中心的斗争。担心只有那些在无线电中被谈到的入选画家才能属于文化领域，这不是证明了一种预言家式的天赋吗？至于我，我这个有个人理由（你可记得，我最初的那些诗是用方言写的）抵抗大都市语言霸权的人，到时候，没有了我的老教授在远方的支持，我还会不会如你所知的那样激动地揭露媒体的摧毁性力量？“奇迹！”意大利民主制度的头头们叫喊道，这时候，从半岛的这一端到那端，电视台正在平静地实现这种道德上的和智力上的统一，而无论是在复兴运动战役中流洒的鲜血，还是抵抗战士们的英雄主义，从来都没能巩固这种统一。那时候，除了我，没有任何一个人站起来，叱责外省生活的被破坏，精神的迟钝，家庭对工作岗位的依赖，还有小城市和乡镇中夜生活的退化或彻底终止，一到黄昏，街道就变得一片空荡荡。

文化在传播，赢得了直到那时还始终被挡在图书、音乐或美术之外的社会阶层。但是，其结果早就在隆基的预料中了。在邮政日历中，乔托、契马布埃、杜乔（他很崇敬这些人，并教我们喜爱他们）代替了瑞士的瀑布和哺乳动物。至于维塔莱·达·博洛尼亚、西蒙娜·代·克罗切费西、利坡·第·达尔马肖，他们将永远停留在阴暗中，成为博洛尼亚历史大扫除的牺牲品。在市立博物馆中，维塔莱的圣乔治猛地把一柄锐利的枪矛刺入倒地的恶龙嘴里：它唯一的辉煌，是从没有参观者的美术馆的墙檐上摘下来，挂到客厅的壁炉上方，用来在小屏幕上播出一刻钟。

达尼艾尔要写一篇关于伟大时代中使用的博洛尼亚建筑材料的论文。这对我们是个机会，可以更深度地进入我们城市的灵魂中，因为一开始我们为这工作所困惑。我陪同我的朋友做调查；正是在我们的散步中，我发展了我对柱廊在公共建筑中的优越性的思索。另一个精彩的主题，我们当地的一个现象，珍贵的大理石也好，市民化的方石也

好，在我们这儿都得不到偏爱。吃香的倒是更卑贱、更简单、更动人的材料。首先，是砖头，它无处不在，甚至包括教堂的正墙。住宅、宫殿、柱廊、围墙、纪念性城门、民事与宗教建筑：到处都使用砖头，贫穷的、熟悉的、友好的砖头。只有雷诺河谷的奇怪特产可以与之竞争。我们一身短衫轻装，以抵挡六月下午的酷热，在附近的山岭上，参观了著名的“小海湾”，出产某种跟黏土一般柔顺的石化凝土的自然采石场。透石膏，呈黄褐色，装饰了加利桑达楼（两座高楼中倾斜的那一座）的底座，黏土坯，多细孔，刚开采出来时柔软如黄油，很容易雕刻，呈珠光色，如鲑鱼肉一般。

也许我的心思全部集中在了这些地质学的精确性上，只注重了它们的细节，而没有发现达尼艾尔正前倾着身子，俯在野草丛中捡着土样，我没有注意到，在他赤裸的胸膛上，太阳光是如何把他初生的、浅黄的体毛照得金亮，一种蜜色，从他西西里人后代的黑头发来看，我根本想象不出会是这样。是什么力量迫使我转过头去不看？我那弗留利之夏的天真烂漫和直截了当逃到哪里去了？那一天，我生平第一次发现，我已经变了；我，不然，就是我们周围的世界变了。塔里亚门托河岸已经属于一个消失了的世界。很机械地，我把已准备脱掉的翻领运动衫又塞进了皮带中。担心暴露自己吗？害怕我自己吗？这一突如其来的尴尬是因何产生的？那可是早先从未经历过的，跟我在卡萨尔萨体验到的自然本性竟有那么鲜明的反差！十分巧妙地把我的尴尬隐藏在我对矿物学的热情底下之后，我又开始跟在浑然不觉的达尼艾尔身边，更起劲地清查大地表皮那反复无常的巴洛克风格。另外，他已经习惯了听我跟伙伴们开女人们的玩笑，而这在我们那个年龄也是家常便饭，难道他还会对我有丝毫的猜疑吗？

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对颜色作登录。熟黏土、粗陶土、透石膏、黏土坯：整个城市消融在玫瑰色、红色、珠灰色、羊毛色、火红色的色调中。暖色调，平民式的温暖，把博洛尼亚跟一些不那么有乡野气的城市区分开来。肌肉一般的颜色，柔和的质地，几乎不再是矿

物。冷色与白色的贵族化诱惑，在这里是陌生的，或几乎陌生的。除了我原先的中学附近的那座教堂，在我看来，人们认为它建得太不理想，因为它是习惯的样式，粗糙的墙面，裸露的砖头，表面涂着石灰。四根强有力的柱子，大理石的，离地面一米处被截断，证明了一种彻底未遂的企图，即用一种罗马式的外套，覆盖这一毫不招摇的砖石砌体。还有更糟的呢：圣佩特罗尼奥教堂，城市自治与自由的象征，墙面最初用了白色和玫瑰色大理石的装饰。也是玫瑰色，是的：假如人们想把那种对罗马亦步亦趋的模仿推向极端，那么，这就算是一种折中，没什么值得夸耀的。这一工程很早就搁置下来，最后还是决定用砖头，用这卑微的红色材料，它在火热的内心中烧熟，在陶瓷匠、手艺人的土窑中烧熟。当我们，达尼艾尔和我，为了人民自由的胜利而痛饮一瓶桑乔威塞酒时，我们至少把这一工程的早早下马，断定是教皇的惨败。

但是后来呢？你会问我。我的命运又如何了？在我叙述的一开头，我完成了对博洛尼亚的怀恋式赞美，夸耀了一种移植到意大利各地的以罗马为典范的生活方式。这一曲哀歌站得住脚吗？与其哀叹柱廊与砖头的双重落败，我不是更应该从悔过开始做起吗？我到底是什么人，有什么权利抱怨，说方石就应该战胜透石膏和黏土坯，说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已经把连拱廊文明打发进了历史的回忆中？我自己成了什么，难道还不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甚至是一个大资产阶级，因为我有了钱？我不是最终安居到了罗马吗？

更有甚之，在欧弗拉特街那栋雅致的房子里，有一个在花园保护下的庭园小楼：跟封闭式别墅的文明挂上了钩。我在一首给我赢得了声誉的诗中，抨击了庇护十二世，但给瓦伦蒂诺·蓬皮亚尼（自从他放弃出版“金属”小说以来，他成了一个大出版商）带来的，却是杂志被取缔。但这是一首几乎在圣彼得大教堂的阴影下写成的诗，它的大穹顶堵挡了我的视野。你同样还会问我，是什么促使我没有选择一个贫困的郊区，就像我把我的事物安置在其中的那些郊区，而是选择了万

国博览会 的郊镇豪华住宅区。为了把它建成帝国风格，墨索里尼下令在卡拉拉的山区开发新的采石场。甚至连大理石都接受了我的担保。

亲爱的杰那里埃罗，现在还不到我解释的时刻。到时候，你将知道我选择的理由，知道我如何发现了我的误解，我苦涩地悔恨，命运之舟没有把我捎到更远的南方，一直到波佐利或一直到库梅斯，而是把我扔在了奥斯蒂亚。但你已能猜到，我为什么常常不待在家中，在罗马，我为什么忍受不得被关闭在住宅的四壁之内。每天晚上，我都必须出门，必须消失在人群中，时时刻刻在火车站前的广场和花园中熙来攘往的人群中。人们太多地指责我这一点！没有明白狩猎的快乐于我只是次要的。在那里，那些失业者、移民、士兵、男妓、无家无业的年轻人，一直等待到黎明，他们跳下把他们从加拉布里亚和西西里一路带来的火车，到首都来寻找一份差事，或者从郊区而来，来追逐一种消遣。背靠着水池边上的树干，离开树荫向过路人讨一支香烟。小子们、兄弟们的团体，它赎买我离开城市和背叛青年时代理想的罪过：我，小有名气的作家，变成富人的电影家，报纸上印着我的照片，以跟一份民事卷宗同样的精确性，描绘我的身体特征。我变成了“某人”，拥有一个客厅，可以“接待”我的拜访者，他们通过门口的对讲机大声自报姓名。我剩下的唯一办法：利用黑暗偷偷逃走，以彼得的衬衣，换保罗的T恤，以私人公寓，换公共场所，溜得离家尽可能地远，来到火车站附近，溜达，贴墙，停靠，趁着夜色尽量增加着邂逅的友谊。早早缔结，早早了断。神不知鬼不觉地归去，没有确切的面貌，也无规定的性格，正是在那时候，我开始获得重生。

阿梅代·德·撒瓦，奥斯塔公爵，埃塞俄比亚总督，迎头痛击英军的进攻。双重打击，北面来自厄立特里亚，东面来自索马里。我父亲随增援部队出发。意大利军队被坎宁安将军赶出了亚的斯亚贝巴，固守在安巴阿拉吉高原。5月21日，公爵投降了，先给墨索里尼发去了以下这份电报：“战争并未结束；在这片被意大利人的鲜血浇灌的土地上，我们很快就将回来。”几个月后，他作为战俘死在内罗毕。我父亲跟其他俘虏一起，被关押在肯尼亚，一直到停战。带给拉文纳贵族这位落魄后代的，是铁丝网后四年难熬的日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作为胜利者荣归，而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只带回了变形虫、疟疾以及一种无法医治的对人类的憎恶。

当他上船前往非洲时，我刚刚十九岁。太晚了。太晚了，他没有在我不知不觉中，把令行禁止的观念灌输到我心中。我一下子停步于到那时为此一直十分熟悉的事情当中，成了神秘制动的牺牲品。例如，我不高兴星期四跟朋友们一起去游泳池游泳，便会找到一些借口取消它。法西斯制度捐赠给博洛尼亚一座奥林匹克馆。露天游泳池，带阶梯看台的圆形运动场，我们把毛巾摊在那里，躺在上面晒太阳。从这一观察所，我追踪跳水队员们的变化。直到一个最近的日子里，我还可以在那里待上整整一下午，看他们嬉戏。我的眼睛游荡在水面上，尝试着通过一段赤裸的肩膀，去补齐游泳者浸在水中的身体。公共淋浴处给了我们机会嘻嘻哈哈地大笑，彼此给对方的脊背上抹肥皂。我最喜欢的消遣，是在盥洗室中，在某个我知道他追女人的伙伴（最好他还宣称，作为一个优秀的法西斯分子，他蔑视“同性恋者”）身边选好一个位置，在他身上刺激起一种骚动，这在他紧巴巴的内裤底下看得很清楚，不过，令他有些别扭的这一骚动似乎并不让他难过。这就是当时的我，而现在，反倒是我自己对这些游戏有所怀疑，男女沐浴者的混杂使我觉得很是尴尬。

我一如既往地迷恋足球赛；但现在我有一条新理由。过去，我对这星期天的比赛不求别的，只求奔跑、出汗、跟青年人一起搏斗的幸福，穿着短衣短裤，在阳光明媚的草坪上嬉戏。自从那种内在的变化后，没有人能猜出，我去体育场是为了什么。潜在的欲念是那么强烈，足以把一个球队的小伙子团结在一起，它吸引我去冒险，哪怕被对手铲倒在地，负着伤回家。内疚感越是在我心中增大，我在球场上的动作也就变得越粗野。人们从没见过还有中锋比我更为勇敢地参与防守，也没见过守门员如此敏捷地在对方射门队员腿下扑球。以这些连续的挑战，我到底在寻找什么？难道不是作为惩罚的糟糕一击，不仅惩罚我极端的鲁莽，而且惩罚那种隐晦的、其阴影将笼罩我一辈子的错误？我得不到这种舒缓。比赛一结束，我就把球衣夹在胳膊下，也不洗淋浴，也不回更衣室，便赶紧开溜。

“清教徒加运动员”：这就是我赢得的名声，而且被确实印证。从此，我喜爱的消遣：独自在山上远足。简单的吻合？安巴阿拉基的投降后第十天，我一大早坐火车，去了多罗米特山区卡多雷的皮埃威。暖暖和和地裹在羊毛绒衣中，铁头登山杖握在戴手套的掌心，我开始独自一人攀登大叉峰：三个半小时的攀行，人们是这样对我说的。而我只用了两个小时。我的钉鞋踩在石头上，发出喀喀的响声，一路回响在永久积雪的寂静的沟壑中。纯净的空气，完成一项壮举的情感，冰川上一望无际的碎石和冰碛的壮丽景象，以一种雄壮而又快乐的保障，充满了我的胸腔。一只老鹰展开翅膀在我头顶上翱翔。但是，当我登上顶峰，决定好好休息一下，品味一下我的功绩的回报时，我却不得不一下子跳起来，接着马上跑下山去。顶峰之神用威胁的眼光盯住我的脊背，命令我赶紧滚蛋。“但愿你不洁的存在不要玷污这一始终如初的孤独！”

同样的恐惧，在往日，在我父亲休假回卡萨尔萨的某一天。无人陪伴的我出去到绿波荡漾的塔里亚门托河里洗澡，我平静地游在荒芜的两岸之间。突然，我觉得，凶恶而又哑默的深渊之神抓住了我的双

脚，要把我拖向河底。我因为一桩我自己并不知晓的罪孽，受到了审判和惩罚。

这时候，我又该向谁去抱怨呢，难道不是向这如铅一般沉重地压在山上的、像一只大睁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的太阳吗？只要我没有下完坡，它就一直盯着我的后脖子。闪闪发光的山峰在我周围形成了一个圆圈。早上我感觉到其暖人热量的星体，现在朝着万里无云的蓝天投射出它杀人的光芒。在整整一片冰坡上，没有一棵树，无处躲藏。猛禽不停顿地盘旋在头顶。到达村庄后，我必须一连喝上三杯橘子潘趣酒来压惊，尽情地嘲笑一番我的忧虑。

我有一些姑娘做朋友，同时跟不少姑娘。内丽娜，一个打字员，尽管有炭黑色的名字，却飘散着一头浓密的金发。我骑自行车带她到处走，我们骑上玛格丽塔公园的小径。战争把动物园里的珍禽异兽清除一空。栅栏后，只剩下两三只庭院的禽类，可怜兮兮地待在过于宽敞的鸵鸟或瘤牛笼子里。内丽娜求我陪她回家，城市另一端。经常有一个她为他打过论文的大学生认出她来，并招呼她。我下车步行，她跳到人行道上，跟那陌生人一起走上几步，小伙子总是艳羡地看我一眼后，才挥手告别。他并不知道，我要把我的乘客在稍远处放下，在她家门口。她将大步爬上楼梯，生怕误了家中的晚餐。

至于我的大学同学，我更愿意带他们去公园门口人工湖的小岛。我们坐在小木屋的平台上，在来来往往的散步者中间，喝上一杯饮料。这里，根本不可能有单独见面，那些十五六岁的侍女，真是手脚麻利，被她们匆匆放在大理石桌面上的玻璃杯，总是叮当叮当地响个不停，更不用说那些拿面包屑喂鸭子的孩子们吵闹得没有个完。绝大部分时间里，我所邀请的玖丽娅、贝皮娜、阿斯特丽德或弗萝拉这不同的几位中，没有一个独自跟我来。亨里科，玛提亚斯，达尼艾尔也分别带着他们当时的女朋友，参加我们的聚会。

根本用不着撒谎，我敢说，他们也一样，那些湖边憩息的最舒服时刻，是在他们的女伴走了后，等她们纷纷被各自的家务活召唤走

后，那时候，我们就留下来，彼此评头论足地品味她们妩媚的外表，没完没了地讨论她们隐秘的魅力。有多少次，在我这个年龄的年轻人中，甚至在亨里科，我们小团体最热心的这位组织者心中，我可以证明，背着女人谈女人的欢乐，代替了征服女人的必要努力！词语上激动，行动上懒惰。他们随口答应，彼此颁发一份唐璜的证书。但是，我难道能得到允许，只因为我准备过一篇关于卡拉瓦乔的文凭论文（中途放弃了），就让人家把我看做一个画家吗？

我们各自回家后，醉意蒙眬地倒在床上，回味着关于我们那些美人儿的牙齿、头发、腰身以及看不见的妙处的放荡话语，不过在回家之前，我们还要就一份将发表我们诗篇的杂志的计划，来一番梦想。我记得有一天晚上，一个小男孩子骑在自行车上兜售《卡尔利诺》的特刊，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向最后的顾客尖声喊道：“轴心国向莫斯科宣战了！德国和芬兰军队侵入了苏维埃领土！”这则新闻尤其以它对斯堪的那维亚小小共和国的提及令我震惊。头一年的报刊还大大宣扬了一番曼纳林元帅的抵抗，还有他的战士们的英雄主义，他们像精灵一样在雪橇上飞滑。他们把俄国人的坦克翻了一个个儿，让它们被烧得成了焦炭的车架在雪野中冒着浓烟。

在我当时所有的女朋友中，乔瓦娜·B给我留下了最温柔的回忆。她生于一个犹太大出版商家庭，是她使我了解到种族法令，教会了我仇视反犹主义。尽管跟在德国的迫害不是同一措施（意大利的犹太人从来没有受到身体上的威胁，也没有任何一个灭绝营设立在半岛上），墨索里尼的政策还是导致了一系列繁缛的行政手续和令人发指的法律禁令。

我常常冲着乔瓦娜指责她父母的别墅，还有他们豪华的日常生活，而且总是不无恶意，因为她属于一个跟我不同的阶层，而这对我来说，又构成了最好的保障，使我们之间的交往局限于一种无足轻重的伙伴关系中。有一天，她靠近我，闷闷不乐地皱着眉头。

“你生我的气啦？”

“别说傻话，皮埃尔·保罗！今天早上，在我的网球俱乐部，他们对我宣布，没有任何一个场地可以让我进。”

“就这些？”

“而且，从此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场地还可以让我进！你明白：我再也不能去打球了。再也不能了！”

“资产阶级的运动，我亲爱的，”我回答说，耸了耸肩膀，“你想一生一世都遵循你那社会等级的习俗吗？”

她任我作茧自缚，随后，静静地说：

“我不能打球了，因为他们把我的卡收回了，他们收了我的卡，因为我是犹太人。”

新法令的实施：体育场、游泳池、剧院、电影院、火车站、博物馆、邮政局，甚至还有医院，全都禁止亚伯拉罕的后代入内。我的脸一直红到了耳朵，赶紧含糊不清地连连致歉。她对我的愚蠢并不记恨，满足于给我上了一堂双重意义的课。我最要好女朋友的父母的财产，成了阻止她出门的漂亮理由！

我们徒步行走，专拣荒凉的小街漫步。禁入公共场所的戒令扩展到了有轨电车。至于我，我可不愿意依然把我的女伴带在自行车上到处溜达，我喜欢跟她聊阿尔图尔·兰波和翁贝尔托·萨巴，但她厚玻璃的眼镜，剪得齐后脖的短发，平坦的胸脯，还有她不屑于涂红的嘴唇，对我诱惑者的名声来说，不会是一种召唤。她问我是不是有一辆自行车，可以缩短一直到玛格丽塔公园的漫长路程。我吝啬地给了她否定的回答，实在不打算让同伴们看到我神气活现地跟一个近视眼姑娘待在一起，怕他们笑话我。

“你难道不知道我实在太穷了吗？”我这样说，想得罪她。

我觉得她不漂亮，甚至有些丑，但我可能是看错了她。如果说，我的真正目的是跟一起出去的姑娘享受愉悦，那么，乔瓦娜的上等智力，足以使她比曾跟一起我坐在湖畔平台上的那些长头发娃娃迷人一百倍。

我们一同发现了弗洛伊德、纪德、叔本华、洛特雷阿蒙，算是对我们迫不得已的对意大利经典作家烦人的阅读和注解的弥补。在大学里，我感到厌烦，不幸被开除学籍的她也同样，我们讨厌被上级命令简化为了民族遗产的官方文化。我们的作家，从彼特拉克到邓南遮，常常变得浮夸，学究，脱离生活，仿照拉丁模式，我现在还这样想，

尽管反法西斯主义斗争的必要性使我们不免有些矫枉过正，例如对薄伽丘的指摘，或是对切利尼、对米开朗琪罗的低估。在文学论战中，我们两个人都因个人原因而投入十倍的热情。所谓的个人原因，对她来说，是犹太血统，它把她逐出了意大利社会，所以她更严肃地评价社会的缺点。对我来说，则是与同伴们格格不入的情感。我的批评精神，敏锐地针对任何社会建制，把国家政要和著名作家都打发到同样的怀疑中。这种边缘者的团结一致，巩固了我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在乔瓦娜的不知不觉中，因为我总是避免把作为她朋友的我的秘密告诉她。

我们一起聊天，在一家装饰有奥地利湖光山色风景画的乳品商店后厅，或者在一家咖啡馆的仿皮漆布座上。跟其他的姑娘不同，她喝饮料的时候，从来不在玻璃杯上留下口红印。温馨而又简单的谈话，所有的条件都得到满足——我们两家的社会差异，乔瓦娜几乎为零的性吸引力——使我感到十分惬意。她没有丝毫的娇气，不想取悦他人，使我免除了调情中种种乏味的花样。然而，必须相信，即便是一个你跟她谈论拉夫卡迪奥的无动机行为和列奥纳多的秃鹫的女大学生，也会对一个普通的女打字员表现出嫉妒，尽管你只是带她到动物园，去看原先关羊驼的笼子中的母鸡。我们那种位于伟大诗人和深沉哲学家的运星照耀下的友谊，从那一天起，就开始走下坡了，因为，那一天，她撞见我耀武扬威地骑着自行车，把金头发的内丽娜带在我的双膝之间。

09 (1)

说到我对女性同伴的渴望，谁能猜出真正的原因，就算谁精明。通过证明我的男性能力而达到自我认可的无意识欲望？欺骗他人的诡计？“正常化”的真诚希望？对暴露真面目后引起后果的害怕？无论如何，应该说，时代令人赞叹地助了我一臂之力。今天，随着社会习俗的改变，我可能就会毫不迟疑地提供其他的证明，而不单单是从心里默默背诵偷偷从巴黎传来的保尔·艾吕雅 爱情诗中的这最后几行。

嘴唇分开

词儿出发

去历险

我对乔瓦娜喃喃念道，而她的嘴唇嘬得圆圆的，含着一根吸管，好让她四分之一升圣培露矿泉水留上更长的时间。

没花多少钱，同时又不必冒险使自己闯得个晕头转向，我就轻而易举地献上了殷勤。一个姑娘很少在家里接待一个小伙子，而且绝不会在父母能够监视的白天时间之外。一道严厉的障碍把两种性别分隔开。除了握一下手，贴一下脸，禁止交换任何其他表示亲热的符号。乔瓦娜出生的家庭，还把古老的订婚仪式看得非常重要，她根本就不允许我拥抱她。无疑，她已经猜到，跟我在一起，就不会有什么激烈的进攻。那些后来爱上了我，并知道我为什么不能以相同方式报答她们的女人，确实很稀罕我，因为我不会让她们疲倦。最后，一个男人无私的友谊是不会说变就变的，就像荣誉法则对任何年轻或不太年轻的意大利人所要求的，他的追求既恳切，又纠缠不休！

还是回到二十岁时吧，我独自守着我的秘密，总担心我的女朋友之一会对我们的文学交流感到厌倦，转而追求别的献礼。而谈论电影女演员就没有这类危险。从我们家公寓，大众化的诺萨戴拉街50号的窗口，我侧身一探，就可以读到街对面雷克斯影院门旁墙上的海报，那家门票便宜的小电影院，每隔三天就上映一部新电影。

在这浮华名字的三个字母后面，还可以隐约辨认出早先那个名称的斜体大写字母，尽管已从灰泥上刮掉，但还没有完全抹却：“红磨坊”这个法语名称倒是跟此地的寒酸更为相称。战前好几年，在阿契雷·斯塔拉切一个新的奇思怪想下，名称的代替就决定了。党的书记亲自列出了需要摒弃的外国名称的单子。报纸上禁止再写“帕诺拉玛”、“开司米”、“弗拉什”、“帕尔顿”、“西弗扑来”等外国词。“斯坦达尔”商店被改成了“斯坦达”。行动还扩展到了地名（库尔梅耶改为科尔梅奥尔，奥斯特河谷的圣文森特成了圣文钦佐）和人名：以其埃及式的魅力给自己的造型带来异国刺激性的大众女演员婉姐·俄塞里斯，拉丁化地衰退为芳姐·俄西里德。要说我的朋友们把自己称做玛提亚斯（而不是玛提亚）和达尼艾尔（而不是达尼艾勒），那都是有原因的：有一天，当“伦敦”香烟来到烟草局，意大利化成了“翡冷翠”时，年轻人终于表达了最后的反抗。

直到30年代末，好莱坞明星(报刊上要写成“星星”)像君王一样成了主宰。开始时是莉莉安·基什⑦，她在观众心中唤醒了性虐待式的乐趣，来看对一个温柔而又无辜的牺牲者的迫害和折磨，随后是玛丽·璧克馥⑧，有良心的年轻姑娘的既现代（因为它预示了女性主义的解放运动）又古老（人们在其中重新找到小红帽的神话）的典范，斗争到底，战胜对手。我跟亨里科、达尼艾尔和玛提亚斯，我们曾没完没了地讨论，想知道哪种类型的女人最值得我们欢喜。在我们眼中(内心的谨慎建议我，也让人家听听我的观点)，这个问题要更为重要，远远更重要于问我们，在但丁和贝阿特丽丝的两次相遇之间，到底过去了多少年，想当年，在加尔瓦尼中学读书时，我们的意大利语教师总是吹毛求疵地拿这一类课堂练习来为难我们。后来，在赞波尼街上，提拉波斯科教授上的关于彼特拉克的大学课程，对我们又有什么重要的？劳拉的美丽，她那如黄金一般的秀发，以及她天使般的微笑，对我们又有什么重要的？我们不耐烦地等着时间来到，在雷克斯影院准时降临的黑暗中，在十来个燃烧着的香烟头的微光中，欣赏这个或那个新

女明星，玛提亚斯和亨里科差点儿动起手来，为了她们，玛琳·黛德丽和葛丽泰·嘉宝。

截然分明的两大阵营，每一方都大肆攻击和贬低对方的信念，这一对立始终刺激着意大利的外省生活。在中世纪，你不是教皇派，就是皇帝派。在佛罗伦萨，你必须在黑衣党和白衣党之间做出抉择，就如同在维罗纳，你不属于蒙太古家族，便属于凯普莱特家族。在今天，梅尔古提奥家的人为足球、自行车或歌剧而残杀。巴尔塔蒂和科毕之间的对抗在许多家庭中制造了不和。卡拉斯的崇拜者把苔巴尔迪的追星族推下威尼斯的一条运河中。菲亚特小型500和600车在大众阶层中赢得的垄断（菲亚特的众多恶行之一），使摩托车这一活泼泼的源泉在乡村枯竭，而当年，这股车流倒是热热闹闹地奔腾在公路上，尽管酷爱朗布莱塔牌？人拼命鼓吹，他们的引擎比胡蜂牌不平衡的旁侧发动机更加优越，还赌咒说，要叫他们把这机械噪音太大的胡蜂咽下嗓子眼去。

玛提亚斯和达尼艾尔火一般热烈地支持嘉宝，亨里科则支持黛德丽。1938年2月，当嘉宝访问意大利时，争吵爆发了。她是跟乐队指挥列奥坡德·斯托科夫斯基一起来访的。他们没有在那不勒斯逗留（但是，在那时候，有哪一个旅行者会不犯这样的错误呢？），而是在拉韦罗租了钦布罗内别墅，离瓦格纳当年住过的宫殿只有几步之遥，六十年前，瓦格纳就住在附近写下了《帕西发尔》。“《帕西发尔》，希特勒在拜罗伊特时从中获得极大乐趣！”亨里科高声嚷道。为了拉我入伙，他请乔瓦娜作证，证明那个瑞典女人趣味糟糕：她不是对记者们声明，“克林索尔的花园”，以它的玫瑰花圃，就像瓦尔哈拉一样芳香四溢，尽管那里没有鲜花仙女？为提防这些记者的鲁莽，三条“德国”牧羊犬和两个冲锋枪手日夜守卫在她住所的门口。

作为交换，玛提亚斯报告了一大堆有趣的新闻。首先是她的行李，本来只有一个凹凸不平的小手提箱，从中却掏出了各式各样的东西，简直是个百宝箱，据女仆说，有一套睡衣，一件游泳衣，一双蓝

色的帆布鞋，好几副墨镜，两打瓶装果酱。另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晚上，在上楼去卧室之前，她要把餐厅中的盐和油扫荡一空。达尼艾尔剪下一张照片，是在帕埃斯图姆用长焦镜头拍的：女明星坐在一条农庄板凳上，给一头母水牛挤奶。这个北欧农家女儿的简单与质朴。她，莱妮·里芬施塔尔的一个模特儿？她，在她的踪迹中留下了纳粹色情主义的臭味？再看看另一位吧，他对我们说（对那位从柏林移民过去的帕拉蒙电影女明星，带着一种明显的不公正）：黑色的丝袜，毛皮大衣，烟嘴，一个日耳曼女鬼的全套装备。

这一个的吊袜带，那一个的火枪手帽子：我的选择不取决于她们的行头。我选定了玛莱娜，由于亨里科的关系。不是出于算计，而是出于直觉。我对自己说，当然是悄悄地说，并不像我在这里写得那样干脆：“临摹其经历为大学生们津津乐道的人的趣味，将巩固你试图通过让人看到你跟内丽娜在一起而赢得的声誉。”玛提亚斯从事了古董商职业。达尼艾尔献身于绘画。亨里科，更为资产阶级化地，选择了医学：其中微妙的差别，我一下子就明白了，焦虑不安的我担心唤醒怀疑。我还猜到，疯狂地摆出蓝天使的步子，将为我提供一个男子气的证明，这样做，比起我承认更喜欢沙哑的嗓子，更喜欢线条坚毅的下巴和克丽丝蒂娜王后的男子化动作来，要更有说服力。她不是亲吻了她年轻的宫中女伴的嘴了吗？

09 (2)

还有，在这两个对手之间，角色分配的方式并不那么清晰。在安娜·卡列尼娜的斗篷下，在玛丽娅·瓦莱夫斯卡的撑边女帽下，在玛格丽特·戈蒂埃的镶花边软帽下，嘉宝找到了她所有的女性魅力。黛德丽则相反，她越来越经常地表现为性反错：欣赏这位雌雄同体的维纳斯，身穿大礼服，头戴大礼帽，栖息在酒吧高凳上，这已经开始变得有些连累他人了。自从路易丝·布罗克斯在帕布斯特的《卢卢》中跟爱丽丝·罗伯兹脸贴脸地跳舞之后，无论是阿玛宗女战士，还是女同性恋者，电影都宽容她们了。总是女子同性恋的例子，但是，我却担心，如果我给这样的一些电影一种过于热烈的赞许，或许会暴露我的本性。在《西尔维亚·斯卡莱特》的前半部分中，凯瑟琳·赫伯恩使我狂喜。当她剪去头发，披上一件戴马夹的男人衣服，并用一个蝴蝶领结把衬衣扣得紧紧时，我的微笑就凝固了。

我们就一切、就任何东西胡乱瞎争一气的癖好，并不妨碍我们像中了魔似的忍受形象的诗意。我们的争论停止于雷克斯影院的门口，只是回到了人行道上才继续下去。在电影院里头，我就什么都不再想了，不想政治，不想德国，也不想叫自己变得谨慎。为了增加影片魔法，我们事先避免去看贴在影院门口的海报。在暖气过热的小厅的阴影中，香烟的烟雾就像礼拜堂中的熏香一样，缭绕在银幕前，而我们，怀着一颗颤抖的心，期待着电影的开始。一直要等到米高梅公司的狮子终于怒吼起来，或者兰克公司的竞技者手中的木槌最后把锣敲响，才能发现，今天晚上成为我们偶像的那位女演员叫什么名字。是嘉宝还是黛德丽，是赫伯恩还是哈维兰，是梅丽安·霍普金斯还是卡罗尔·伦巴德，是多萝西·拉穆尔还是贝姐·戴维斯，是琼·阿瑟还是琼·哈洛，是诺尔玛·希勒还是琼·克劳馥：命定的和不真实的造物，在我看来，她们的诱惑根本就不是凭靠一种化妆与照明的特技，一个在电影拍摄棚中制作的产品，而是神秘与美本身在闪光。一旦她们转变为演

员，活动在一个无法抓住的和光荣的世界之中，那些有血有肉的女人在我心中激起的任何陌远感，都变成了狂热的赞赏。我将会整夜整夜地待在扶手椅上，沉湎于那些散发出光芒的容貌，她们令我喜悦的基本王牌，就是她们属于一个神秘的星球，置身于一个我根本无法达及的地方。

因为战争以及法西斯主义的文化自给策略切断了美国之路，我们便不得不满足于欣赏意大利的明星们。《呼啸山庄》中的梅尔·奥勃朗和《蝴蝶梦》中的琼·芳登是出现在雷克斯银幕上最后的外国女人。在根据好莱坞电影复制的一些影片中，伊萨·米兰达、阿丽达·瓦利、玛丽娅·德尼、薇拉·卡尔米替代了她们的地位，努力模仿她们。然而我们觉得，她们总是还差那么一点劲！能对那些临时明星行使我们的批评权，真是我们这代人的一个机会。当她们摘下宽檐的毡帽，我们就玩着打赌，猜烫发师在她们闪着可疑光泽的髻发上倒的脱色剂是什么牌子的。一个机会，但同时也是一种幻灭。对于独立于美学退步之外的我，我再也不带着以往那种十足的幸福感去看这些影片，因为它们的女主人公不再被一片汪洋大海跟博洛尼亚分隔，当我走出电影院时，我很可能在大街上遇到她们。

1942年，随着《沉沦》，晴天响起了一声霹雳。一个叫卢基诺·维斯康蒂的陌生人动撼了我们的思想习惯。一连两天，我们成功地观看了影片，第三天它却被查禁了。一个神甫在市政首领们和家庭保护委员会成员的护卫下，耀武扬威地从堂区驻地出来，来为被玷污的银幕洒圣水。想一想！一个失业者、一个往日的妓女和一个小饭铺老板之间的那种肮脏经历，给但丁和拉斐尔的祖国脸上抹了黑。每一个形象都引起丑闻。再没有任何对悲惨世界的伪装，再没有任何礼节上的面纱，会像那时候那样，为了在摩洛哥的荒漠中跟随外籍军团，让玛莱娜穿着高跟鞋从一辆罗尔斯高级轿车中走下来。在《沉沦》中，波河流域的一个被通奸的情人们弄得彻底垮台的巴丽拉，成了讨厌的丈夫的活棺材。作为对日常平庸生活的颂歌，《沉沦》第一次展现了穷困

中的意大利：修车铺、低价小旅舍、木头长椅的三等车厢、加油站、星期六晚上在教室讲台上举办的唱歌比赛。克拉拉·卡拉梅，迄今为止还一直主演上流社会的角色，吊在家中白色电话上煲电话粥的多情女子，她在贝弗利希尔斯的别墅为人们提供了范本，而现在却穿着粗布褂子，洗着流浪汉和酒鬼们的玻璃杯，而透过肮脏的方格子窗户，雨水落在三角洲泥泞的河岸上。

意大利帝国的这一迷茫形象，我们只能鼓掌欢迎。但是，要付的代价则很昂贵。维斯康蒂迫使我们有一种积极的、论战的举动。黑暗的咒语和麻痹的醉意结束了。我们中没有一人敢怀恋官方电影中的大理石柱子、豹皮、绣球花丛。社会文献而不是童话故事，手指上的冻疮绝非布切拉蒂戒指，洗涤剂代替了小瓶的光韵牌香水，这些东西给了法西斯主义修辞学狠狠的一击。我们的热情因一种苦涩的失望而减弱：从诺萨戴拉街的小放映厅里，再也散发不出神秘的气息了。没有了奉献的神庙，雷克斯开始跟隔壁的鞋铺、乳品店有些相像了，我来到乳品店，把一枚里拉放在柜台上，换它一块奶油蛋糕吃。我猜想，在第二次梵蒂冈会议之后，第一批听到用意大利语唱弥撒的信徒，遭到了相似的打击：随着无法明白的拉丁语和外国词的消失，吸引他们去教堂的魔力也烟消云散了。理性上赢了，魔法上输了。

不到二十年后，我将拍摄我的第一部电影。谁比我更多地吸收了维斯康蒂的经验？我不是向世界显示了罗马郊区的麻风病了吗？经济飞跃发展的必胜主义的意大利，我不是揭露了它另一面的穷困了吗？饥寒交迫者、被剥削者在我身上看到了他们的电影家。斗争的电影反对逃避的电影，人们知道了我站在什么立场上。所以，我能毫无羞耻地向你承认，我看完《沉沦》后走出电影院时的第一个反应是：一种深深的不舒服，一想到，我所喜欢的银幕上的女人像是一些遥远而又魔幻的造物，将从她们的奥林匹亚山上下来（因为我明白，维斯康蒂推动了一个不可逆转的运动），跟我一起喝酒，就像克拉拉·卡拉梅跟她的顾客喝酒，我就感到厌恶和忧虑。女演员的这种肉体化过程

——照我朋友们的说法，是新电影的政变——在我看来像是一种直接针对我的进攻。看到女主人公在一个乏人的星期日晚上，面对着一盘面条睡着了，可能使我的公民责任感得到满足。在赛西尔·B.德米尔的《克莱奥佩特拉》中，缭绕在克劳黛·考尔白庄严古板的脸上的，是安息香的奇怪气味，而在此后的电影中，继之而来的，则是一种热气腾腾的布依托尼 调味汁的卫生气息。这不妨碍我的伙伴们发出的召集的叫声——“要女人，不再要偶像！”引起我一种极大的不悦。

10 (1)

“哦！没什么可说的！假如我的天竺葵长得同样好的话！”当人们问起妈妈她二儿子的情况时，她除了这句话，就再也讲不出别的什么细节来了。她从卡萨尔萨带过来一大盆她最喜欢的花，却怎么也难以保护它们度过严寒的冬天，因为这里的冬天很冷，水管子里的水都会冻住。“基多？那是一种大自然的力量！”她以偏爱一个孩子的母亲们的那种盲目，重复着这一口头禅：我就是她偏爱的对象，她把满腔的柔情毫无保留地献给了我一人。

出于一种始终如一的好脾气，我弟弟毫无怨言地接受了幼弟的次要角色，总是默然，听从召唤。饭菜中又少了一片火腿肉？他自己的那一片，于是他跑下三楼，到熟肉店去买。我的一个姨妈在博洛尼亚逗留之后要回卡萨尔萨了？他乖乖地扛起她的行李，一直送到火车站。上二年级时，他还在读蒙达多利一个月连载两次的海盗小说，当然他也在开始偷偷地读兰波和洛尔卡的诗歌。我发现了他暗中的好奇心，在他的长枕头底下撞见了《彩图集》，以及我自己的那本《茨冈人的八音节诗》，那是从我的书桌上拿走的。

基多十分健美、强壮，一年四季活跃在体育场上，心甘情愿地让我垄断了全部的母爱。众多的迹象都不足以让我们互相提防。

折磨着他内心的嫉妒，第一次表现为扎在我自行车两个轮胎上的两枚钉子。此前，我曾在饭桌上声明，要跟内丽娜一起去散步。家中楼梯下的小间用做了自行车库。就在我寻找手套——一双带兔毛的人造革连指手套——的当口，我看见基多露骨地从工具箱里抄起一把锤子，打开了过道的门。他下楼，又上楼，把自己关在卧室里，默不作声，严阵以待。五分钟后，当我闯进他的房间时，我首先发现了锤子，搁在小柜子上。

“你为什么要那样做？”我冲他喊道，他那固执的表情，比作案的物证更使我确信，我面前待着的，就是那个有罪的人。

他什么也不说，只是呆立在房间中央，等待着对他的惩罚。直拳击中肩膀，勾拳命中下巴。我被他的无动于衷激怒了，上前一冲，一头就撞在他的胸口上。他晃了晃身子，后退一步，我扑到他身上，想掐住他，把他在地上结果了，但是，他的忍耐终于使我泄了劲。我最终推了他一把，把他撂倒在床上，我也跟着坐到了他身旁。

“白痴！你要是看上了我的单车，你尽管随时开口，问我借就是了。这可比把它的车胎弄瘪聪明多了！”

他摇了摇头。我被他的缄默惹恼，就在差点儿又要发作的当儿，我的脑子里闪过一丝怀疑。

“我真蠢！”我大声嚷嚷起来，俯身朝向他，想把他搂在怀中。我全明白了！是……因为内丽娜，不是吗？我早该猜到了！

尽管我答应把我在女打字员身边的位置让给他，尽管我还说，如果他认为他太年轻，不愿意搭理他，我会替他说好话的，种种允诺仍不能把他哄好。他逃避我的目光，一脸漠然地盯着天花板瞧。

“好吧，”我说，有些理屈词穷，“为了证明我不抱怨你，我向你起誓，我什么都不会对妈妈说的，你就收场吧。”

“哦，我才不在乎她知不知道呢，”他结结巴巴地说，撑起了身子。

“她知道什么？”我有些发窘地问道，根本就没有想到，通过声明不向妈妈告他的状，我已经把他的企图化为乌有，他再也无法摆脱一个热心助人却没有个性色彩的好小伙子的俗定形象。

他以一种惊恐的目光看着我，然后，一下子又倒在枕头上，把脸埋在里头，放声大哭起来。

我继续着对他的误解，甚至在后来，离钉子事件有好一段时间了，他向我们宣布，他的朋友艾尔梅斯·帕里尼幸运地出发去了乌克兰前线。当时，我们刚刚在饭桌上嚼完了带淤泥味的鲤鱼的鱼刺。

“闭嘴，讨厌鬼！”我母亲说，“你还不知道吗，俄罗斯的冬天是那么可怕，你要想不冻死，就得钻到死马肚子里去睡觉？”

“不要听信善良女子们的这些故事，基多乔！（这就是家庭饭桌上的笑话，不带恶意的玩笑。）事实是，一个意大利人，如果选择了跟德国人并肩作战，那他就是在为墨索里尼效劳。”

“艾尔梅斯是我的朋友。我不允许你……”他嘟嘟囔囔地说，更多地出于维护伙伴之情，而非对我评价的抗议。

他的神经似乎已受了刺激。为避免正面冒犯他，我满足于敲打桌上的漆布，好奇地想知道，一个洛尔加的崇拜者会如何评价佛朗哥的朋友们的帝国主义战争。他把我们大家巡视了一遍，然后开口回答我。

“如果你认为他有过错，那么你就错了。你们不知道他决定出发的动机。”

“可能是一种崇高的献身！跳上一节满是叛徒和奸贼的车厢！”我叫嚷起来，不愿再听我弟弟赞扬一个志愿入伍的人，我也好，他的母亲也好，我们可是从来没有给他上过反法西斯主义的课。

“他想以他的死来净化自己？祖国，”基多喃喃道，低下了脑袋。

惊诧万分的我跟妈妈交换了一个眼色，她示意我适可而止。基多眼睛死盯着酸奶瓶，又说了起来，颤抖的嗓音中，光明正大的挑战跟一种童稚的腼腆融为一体：

“艾尔梅斯不会再回来了，永远不会了。他是抱定牺牲精神入伍的。他将死在俄罗斯。他是出发去见死神的。他对我说过。他的死将拯救我们全体。这就像不服从将军的命令，偷偷离开军营，去炸毁敌军堡垒的火眼。”

这种跟萨尔加里小说的比喻，在我们看来实在是太天真了，我们全都哈哈大笑起来，同时也许是为了缓和一下过于紧张的气氛。

“赶紧吃你们的苹果，我们在饭桌上待的时间太久了，”我母亲说，她对饭后还留在脏盘子前的习惯深恶痛绝，这种厌恶已经遗传给了我。

基多平时吃水果时习惯整个儿地啃着咬，这会儿却异常小心地削起了苹果皮。果皮连绵不断地从刀口拖下，呈螺旋形。他竭力保持平静，但他的手背叛了他。任何东西都剥夺不了我的内疚，我不该以那种愚蠢的哄笑对待他那颤巍巍的信任。是不是值得每天都跟乔瓦娜讨论在死神柱廊下买下的《日常生活的神病理学》和《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童年回忆》？与其批评我弟弟的政治幼稚，我还不如问自己，一个一直乖巧听话，但突然表现出莽撞性格的十六岁男孩追求的是什么目标（或许连他自己都不知道）。首先，这是一个家庭叛逆行为，其次，第二症状更明显，是到哈尔科夫平原的冰天雪地中做赎罪远征的梦想，是在零下四十多度的严寒中献身和牺牲的幻想。

他为打开母爱的心灵之门而尝试的不同钥匙，全都断在了他的手指中。他的求援声，甚至没有一句被人听到。无论是流氓兮兮的小徒弟，还是英雄主义的候选人，人们全不拿他当一回事。他始终停留为“这乖乖宝，这可爱的基多乔”，妈妈总觉得，每当她往他衣袋里塞上几个铜钱，让他去杂货铺买几块宝塔糖，她就已经很对得起他了。一种强烈的饥渴，渴望得到爱和他自身价值的承认，使他在我们眼中被吞噬了：我们从各自的方便起见，坚持把他猜想为具有宁静的心灵和强壮的体魄的童子军。

由于担心他因艾尔梅斯入伍而产生的激动会将他径直引向法西斯主义，也怕他受学校的不良影响，我就尽可能把他带在身边。隆基教授委托我做一项工作，对博洛尼亚的历史性建筑“从罗曼式风格到哥特式风格的过渡”进行研究。在教堂内，基多更感兴趣的事，是细细打量前来祈祷的女中学生，或者觊觎她们头戴圆锥形帽子的小妹妹，而不是跟着我，抬头观察穹顶。我特别喜欢那四个小小的罗曼式教堂，它们一个镶嵌在另一个之中，构成了圣司提反教堂的复合群：全都矮矮的，玫瑰色的，简朴的，寂寞的，围绕着一个带有砖头柱子的修道院。没有别的，只有弯弯的曲线，圆圆的拱门，弓形的柱顶盘。令人心安的氛围，一种宁静涌入我的心田。

10 (2)

“瞧，基多。眼前的这个耶稣受难小礼拜堂，本身就建筑在一个圆形的平面上。你现在就站在它的圆心上，你的头顶正上方有一个半球形的穹顶，在你周围，到处都伸展出玫瑰色的柱子，它们都由半圆的拱腹相连接。这是博洛尼亚最古老的祭台间，是后来建筑的楷模，无论是民用建筑还是宗教建筑。你到城里去走一走吧：你就将发现，建筑家们是如何小心地避免任何阻挡视线的东西，中断的线条，切断的横梁，尖脊，曲拐。半圆形的连拱廊始终得到他们的偏爱。没有任何直角，至少直到法西斯主义风格出炉为止还没有，而法西斯主义却愚蠢地模仿了希腊庙宇的方形列柱廊。”

“没错，”他说，很高兴给我带来了他的个人贡献，“体育场是按半圆形连拱廊的式样建筑的。游泳池也是，我现在可算想起来了！”

但他忍住了一个哈欠，使劲地伸了一个懒腰，把我们为时一刻钟的室内考察的辛苦驱走，然后出门回到了街上。他说，熏香的气味令他恶心。回家的路上，他一边走，一边踢着空罐头玩，把妈妈劝他爱惜鞋子的话全然忘在脑后。也许他在艺术史方面表现出了更多的才华，使我在研究中不好再长期地跟他合作：因为我所从事的发现，远远地把我带向了风格研究之外。

在圣司提反教堂，在其他的罗曼式教堂，我感到信心十足。那些低矮的、圆圆的、熟悉的穹顶，就像母亲的一条温柔的胳膊，把她的孩子搂住，保护在自己怀中。它跟我在又高又严峻的哥特式中殿那咄咄逼人的阴暗中感到的，是一种截然相反的印象。我很想知道，那么适应人和人的安全需要的半圆拱腹，为什么就让位给了新的建筑形式呢？我不无惊讶地得知了社会斗争在一种风格到另一种风格的过渡中扮演的角色。在当时刚刚创建的托钵僧修会，即多明我修会和方济各修会的影响下，哥特式建筑风格于13世纪进入了博洛尼亚。他们是一些没有钱，没有行李，脚穿拖鞋，身穿棕色粗呢教袍的僧侣，是农民

和手工艺匠的儿子。他们跟在俗的神职人员、出身贵族的高级教士和主教作斗争。那些大人物拼命维护自己的特权，同时也维护建筑上的传统，即罗曼式风格。

怎么办？采取什么立场？你将站在哪一方？你不可能同时心里向左转，而趣味上又回到过去。你必须积极支持哥特式。革命就这样造就了多少的受骗者！为了社会进步这一必然学科，人们牺牲了幻想的神圣秩序。对于我，这是第一次机会，远在我跟共产党人的争执之前，思考历史的讽喻，它一手给予你的，又从另一只手要回去，它从来不会显得足够的慷慨大方，让你的幸福真正圆满。

哥特式风格拉长了教堂中的大柱子，把屋架抬高到一个令人眩晕的高度，在侧道中增厚了神秘性，创造了那些孕育焦虑感和犯罪感的巨大空间。在半圆的拱腹上，在被称为摇篮——对童年摇篮的隐喻和回忆——的穹顶上，继之以尖拱肋，人们同样很有道理地把它叫做断拱肋。跟母亲的亲密关系中断了，合二为一的幸福被抢劫了。这儿子，被突然从完整的团圆之梦中拉开，脱出了他的窠臼，放逐到了世界上，不得不揉着眼睛离开洞穴。在高端穹顶威严的昏暗中，他依稀看到父亲那隐藏的可怖的脸。尖拱肋到底是什么，难道不是父亲高高扬起的眉毛吗？在圣佩特罗尼奥教堂，你不由自主地颤抖，你没有受到欢迎，却受到了审判。雄伟的中殿以它那黑暗的壮丽把你压垮。在这威武的厅堂底下，你只是一个等待惩罚的无限渺小之人。法则、威胁、畏惧从此进入到我们的生活。温柔的母性之手把天主教抛弃给了父亲不可阻挠的威力。

“我们的生活，”我刚才这样写道。杰那里埃罗，从基督到耶和华的这一回归，兴许只会给少数人，即我们这样的少数人，带来如此戏剧性的后果。当我说：我们这样的少数人，我并不仅仅在说我和我兄弟们的过去。我同样在说你，我敢把手放在火上说，眼下这一刻，你正惊叫着，准备中断阅读，跑到堂·米切雷那里去定下你结婚的日子。只要你愿意，你尽管否认这一显然性好了，我爱情的力量将成功地从

你心中驱走谎言。总有一天，我将带你承认你的真实内心。显而易见，更聪明的办法，还是蒙住你的眼睛，别去看好几百年来镇压的恐怖，然后，向你展现今天已经普遍赢得的宽容。以如此的懦弱，我将永远不会成为同谋，即便是为了解除你令我绝望的抵抗。我需要的是战胜你，而不是骗你上当。你想我会认定你太胆怯，无法承受看到你逼近的危险吗？跟朱塞皮娜在一起吧，假如你只担心你的安息！只要我心中还燃烧着这样一个希望，你读完我的故事后，还会对我宣布你的投降（却是过于晚的，因而是无谓的投降，杰那里埃罗！），我就恳切地期望，你选择我是因为了解个中原由，而不是被骗人的诱惑所吸引。

假如要从头说起的话，你一定得知道，在中世纪，贵族阶级被大众力量所击败时，为我们付出了什么样的眼泪和鲜血的代价。通过在图书馆中寻找我撰写论文所需的资料，我发现了一些文献，它们精确地揭示了，在什么阶段，在什么情景下，我们遭遇了最初的刽子手。你兴许会说，不论是隆基教授，还是我的弟弟基多，全都不太可信，并不比我周围的任何其他人更可信。

尖拱肋和拱扶垛的胜利，就像七个世纪后镰刀和锤子的胜利，签署了我们的受惩。我们曾经拥抱了一项事业，它的胜利者把我们带上了他们的法庭。从10到13世纪，在罗曼时代，没有任何针对我们的诉讼迹象。圣保罗还没有接替上圣约翰。维罗尼卡的手巾止住了摩西的愤怒。刑事法规？它们早先由第一个基督教皇帝狄奥多西制定，但从未在西方的任何一地实行过。火刑，在查士丁尼的新律中，后来又在查理大帝 的法令中重新颁布，却不费正义之神一根火柴。人们讲到，于格·卡佩 去教堂的时候，发现门廊下有两个男人更多地屈从于自己的愿望，而不是上帝，便用他的王袍把他们遮盖起来。他跪在祭坛前，祈祷的时间比平日更长，也许是在恳求上帝原谅他们，他显然给他们留足了时间，得以在警察来到之前从容溜走。

迫害开始于13世纪末，伴随着多明我会修士的传教，以及宗教裁判所的建立。在何等令人沮丧的征兆下，我发现自己诞生了！你想象一下，博洛尼亚是多明我·德·古斯曼最喜欢的城市。这个狂热的西班牙人停留于此，并居留下来，在葡萄园的圣尼古拉教堂召开了修会的前两次会议，并为离我从小长大的街道不远的一处修道院奠定了基石。他是在博洛尼亚染上了重感冒死去的。一开始，他被埋葬在圣尼古拉教堂自己的地下，按照他的遗愿，就在一块普通的石板下，可以被他的拖鞋踩在上面，后来，因前来瞻仰的人太多，原先的教堂变得太小了，当人们在教堂原址上重建起一座新的大教堂，并且这一次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由教皇本人出面题献给他时，他的遗体被装入一口豪华的棺材里，葬在全是大理石的陵墓中。头颅安放在一个雕镂的银制圣骨盒中，丝毫不比你的圣雅努阿留斯的遗骸盒逊色。对他坟墓和他遗骸的崇拜，日复一日地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信徒，从基督教世界的天涯海角，来到这里朝拜。

这僧侣，以他的仁慈和他的贫穷，同时还以他的毫不妥协，给人留下了无法忘怀的回忆。他的弟子们记得，当他在祭坛上度过整整一夜时，他的呻吟声和哭叫声一直穿透围墙，传到他们睡觉的斗室。他们继续着他的业绩，忠诚执行他的命令。他们在全欧洲传播压制和独裁。**Domini canes**：上帝的狗。上界治安领域中最凶狠的警察。尽管出身卑微，我再提醒你一下。他们的父辈在乡村铁匠铺的砧子上打铁，或者在山腰小径中推车。这些人民的儿子，亲爱的杰那里埃罗，首先把我们告上法庭，首先把我们送上火刑堆。摩西五书的弃绝者，人们还以为他们已经淹没在马利亚-抹大拉的熏香中了，没想到又打击我们，就好像福音书从来没有传播过。我们的差别就像是一种异端，我们的爱，一种罪孽。人们为使火刑变得芳香而扔到火堆中的茴香，都粘在了我的皮肤上：茴香。我那么多次在报刊上或者在我电影的首映仪式上被人咒骂的，正是这一罪名。茴香，把我们拖入泥淖的经典谩骂。今天使用它的那些人，是不是知道，这一瓜果的隐喻可以

上溯到那样一个时代，人们选用真正的蔬菜，作为他们喷香的燃料，在我们的脚下点燃刑火？罗曼式母亲在浓烟和火焰中朝我们微笑，但是，哥特式父亲则监护着柴薪的补给。

11 (1)

经过了这几番我特意不向他透露的深思熟虑之后，我很高兴地看到，我弟弟在大街上总是回头瞧所有那些姑娘，并非出于拉丁式的虚张声势，而是出于已然十分明显的对异性的倾慕。从这一时代起，我就把我的命运看成一种秘密旅行，在敌人布下的密密麻麻的陷阱之间潜行；因此，当我看到，基多不像我那样头顶上落下一声声诅咒，而是能在最好的条件下开始成功地追逐幸福，我的内心十分欣喜（而全然不知他作为儿子和弟弟的痛苦）。

对我母亲而言，也是同样，我暗自庆幸，基多终于走上了一条跟我如此不同的道路。我跟女性有什么来往，家里人看得一清二楚。妈妈的反应在前后两个阶段中截然不同。开始时，嫉妒。当然，既没有大吵大闹，也没有眼泪汪汪。她的情感实在过于细腻，看不出什么反对的迹象，她也根本不问我任何问题。但是，比方说，当内丽娜一直送我到家门口时，我只要偷眼瞟一下四层楼上的窗户，就能从玻璃窗的缝隙中，瞥见一张纹丝不动的脸，紧贴在窗框后面。

只要我晚餐后又出家门，妈妈就会等着我归来。时间再晚，她都不会灰心，尽管这跟她在乡村的习惯正好相反，以前，当她洗完最后一把刀叉后，她就早早地上床睡觉了。而现在，我回家后，见她坐在厨房的桌子前，身子笔挺，神情严肃，一针一线地缝补我的内衣。她一把拉过我，比平日更长久地亲吻我。如果我以为，她就以这一亲吻向我表示了她的宽恕，那我就实在太天真了。她脱口而出的一声欢呼，使我明白了她真正的目的。她试图根据留在我脸上的香水味，辨别出是哪一個敌手在这天晚上偷走了她的儿子。然而，只通过这种嗅闻的直觉（我想象，她正在竭力把这气味跟她在窗户后隐约瞥见的瞬间形象联系在一起），也认不出她们来，她只得恶狠狠地把所有讨我喜欢的女人都当做她个人的死敌。玛格丽塔公园引起她一种不可抑制

的反感，她知道我的约会就在那里：一个个女人就在那个公园里炮制着阴谋，而其最终目的就是剥夺她。

然而，通过从我嘴里听到的彼此不同的各个名字，通过折磨着她嗅觉的众多猜测，通过她微妙的母性本能，她很快就发现了我所有那些征服的短暂命运。弗罗拉接替了玖丽娅娜，阿丝特丽德又接替了西尔瓦娜：没完没了的一队长列。而把我生出来，喂我奶吃，给我摇摇篮，在我患百日咳时悉心照料我，当我得肺炎后日夜看护我的，却只有她一个人，只有她一个人在我生命中占有一个固定、神圣的位子，在辉煌宝座上的圣母和女王，对儿子来说，她才真正是不可或缺的，同样不可或缺的还有她为儿子做的汤面，每当她听到儿子的脚步在楼梯中响起来时，她手中的面条就该下到热腾腾的沸水中了。

就这样，她开始把我所有的女同伴当做该烧死的牺牲；她希望没有任何一个博洛尼亚姑娘能逃脱这一献祭，这样想的时候，她的心中远没有感觉什么不快。被我选中并随之抛弃的姑娘人数越多，她自己的王权就越是显得辉煌。假如我的某个姨妈，以她那质朴的弗留利式的大实话告诉她，有人看见我常常跟内丽娜在一起，妈妈就假装皱起眉毛，摆出一副发愁的样子；但是，她会停下手中的缝补浆洗，掩住嘴，偷偷露出一丝满足的微笑：确信（而她也确实没有弄错），那女打字员对我的用处，只是我自行车上的一种补充点缀而已。

当我不再跟乔瓦娜一起出门时，她感到自己最终摆脱了危险。比所有其他人都更危险的敌人，就是那一位！小学女教师，尽管很有学问，特别贪读小说，也自认为不是一个米兰大出版商的女儿对手。她的失宠（这一次，我母亲的感觉实际上错了，她还以为我是主动跟那姑娘决裂的呢）得到了一声解脱般的叹息的致意。更何况，她还自豪地对自己说，B家族的一个姑娘，被她的儿子为她的荣耀而献祭在一个高高的祭坛上，这事情本身就具有一种特别神奇的性质。

不过，只要在她看来，我的婚姻仍是一种叛逆和一种背弃，她就得更艰难地忍受老而无后。她拒绝看到我已经长大，但心中却很清楚，

总有一天我会远远地离开她，总有一天她会失去我，她唯一的希冀就是自己当上祖母，想象自己正在为新生的婴儿裹襁褓，宠爱他。怀中抱上一个娃娃后，她将重新开始往昔的美妙经历，就像我当年完全属于她时那样。

一方面是嫉妒的欲望，要让我远离其他女人，另一方面，则是迫切的需要，要把她的柔情继续浇注在一个新的后代身上，如何调和这两者？天命早就解决了这个矛盾，给了她两个儿子，其中一个摆脱了女人的狡诈，会永远留在她的跟前，而另一个，作为儿子虽不那么珍贵，但作为家族繁衍者却不可或缺，他将提供孙儿孙女。正因如此，我根本就不打算让基多皈依于我的趣味，相反，却刻意不让他受到任何其他诱惑，以免他脱离走向未来婚姻生活的道路，而对妈妈的幸福来说，这家庭生活的未来是那么的必要。

然而，我弟弟在一次短暂的佛罗伦萨之游回来后，对我讲了一段具有足够说服力的经历，他的天真没有看出其中的恶意。当时，在塞尼奥里小广场上，他靠着雄伟的雕塑《大卫》的基座，吃着一个三明治。一个男人从自行车上下来，接着便也靠着雕塑席地坐在他旁边，从他鬓角上依然长满头发和他微微有些臃肿的身影来看，年龄大约有三十岁，他矮壮，肌肉发达，穿一条工装裤，一件高翻领羊毛衫。“你能给我一根香烟吗？”他开门见山地问我弟弟，我弟弟觉得他的腔调很是没礼貌。“我不抽烟。”讨烟的那一个愤怒地瞪了他一眼，骑上自己的车，朝桥那边而去。

11 (2)

下午晚些时候，当基多在一个小广场的一条长椅上休息时，那男人又出现了。他坐到长椅的另一端，从衣兜里掏出一支很粗的雪茄点燃，然后喷出一股很难闻的浓烟（托斯卡尼可咒的烟味），根本就不用风正好把烟刮到邻座跟前，我弟弟开始咳嗽起来，用手堵住了口鼻。基多对这放肆行为十分愤慨，尽管一大早起开始的旅行让他很疲劳，他还是立即起身，去寻找另一处避难所，但这时，他听到了一声粗鲁的叫唤。

“哎，小子！你可真不健谈！为什么不凑近来聊一聊？”

基多的叙述停顿了一下，对我承认说，这些词语唤醒了他心中的怀疑，那是一个“唐突士”（他是这样说的）在跟他套近乎。但是，对方“男子汉”的外表又立即使他清醒过来。“同性恋者都是女里女气的、温文尔雅的、彬彬有礼的，”他天真地告诉我，而那个陌生人，却穿着污油斑斑的蓝色工作裤，抽几口烟后就朝地上吐痰。我弟弟还对自己说，一个不怀好意的“混蛋”一开始会装成好人。这种想法（比刚才那种更有说服力，尽管还不能为一个不那么幼稚的心灵提供一种更好的保证）终于使他平静下来。他在椅子上朝他靠近了半米。两个年轻姑娘经过了广场。那男人眼看着她们走远，用胳膊肘推推我弟弟，对他说，他从他的神情，从他发“c”音的方式中看出来，他不是在对一个“佛罗伦萨的小伙子”说话。他用下巴指着两个散步女郎的方向，并希望一个“机会”已经展现在了年轻而又可爱的旅游者面前。

心地单纯的基多，只会一个劲地摇脑袋。于是另一个又重新用一开始的粗野方式，对他肯定地说，任何一个配得上作为男人的男人，在他来到佛罗伦萨的第一天晚上，都应该搞上一个女人。

“你一定还没有找到女人吧？我敢打赌。”

他拿一种无法解释的充满敌意的目光，打量着他旁边的这一位。

“我还很年轻，”我兄弟说，对自己很是愤怒，因为面对着那个继续用雪茄臭气熏染佛罗伦萨透明天空的人，他看来还在请求原谅。

他寻求一种报复，大胆地嘲笑他，确信他将承认遭到了悲惨的失败。（因为只有在爱情方面遭受挫折的人，他以为，才会这样对待在公共场所遇上的第一个人。）

“但是您，毫无疑问，某个美人儿不是正在家里等着您吗？”

“你以为什么呢？”那个抽托斯卡尼雪茄的人一下子跳将起来，叫嚷道，就像被一条蛇咬了一口。“你以为，我需要一个你这样的小毛孩来教训我吗？再过一个月，我就要结婚了，我知道该怎么做，在你提出那么愚蠢的问题之前，你给我好好记住这一点。我出来恰恰是为了去登记结婚的。”

说完这话，他迈开步子，狂怒地走远了。“小毛孩”像个木偶似的留在原来的座位上，问自己到底犯了什么错，被这混杂着亲切感、粗野劲、高傲气和多动癖的新鲜事惊呆了。

“一个傻瓜，”我对基多说。我根本就不会把真相告诉我弟弟，以他十七岁的青春年华，以他那被运动场的阳光晒得古铜色的漂亮脸蛋，他扰动了那男人的心，使他在手足无措之中，编排出一篇喜剧性的关于结婚计划的炫耀之词。喜剧性，是的，按照此类闹剧所有插曲的样子。永恒的三幕闹剧：你讨我喜欢，我推开你，我恨你因为你讨我喜欢。吸引、排斥和藐视。但是，一出闹剧也会转变为悲剧，假如那个自愿上了你的汽车，心甘情愿地跟着你在依德罗斯卡罗的棚屋之间转悠的人，为了惩罚自己的“弱点”，为了替他的“名誉”复仇，为了找回他给自己创造的形象，用一根从栅栏中抽出的木桩刺穿你的肋骨。

以所有那些被我像揭穿假面具那样揭穿了男人气质的意大利人的名义，一个伸张正义者从人民中间走出来（是佩罗西，或者是另一个，他们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肩负着一个不妨可以称为礼仪性的使命，通过刺杀冒犯者，来重新建立他们的本体感。婚姻的驱

魔之咒，在佛罗伦萨的那个遥远的下午，拯救了我弟弟的盯梢者，却没能提供给杀我的人：他不得不，为了这一理由本身，动手杀人。

在1942年，要是有人向我预告，说有朝一日我的人身安全将有危险，我会耸一耸肩膀了事。为了祝愿基多有一种不同于我的生活，我只需强调我的谨慎和我的软弱就成。我甚至亵渎了诗歌本身，在我的第一个集子上发表了一些极其谨小慎微的诗句。7月14日，我们，亨里科，玛提亚斯，达尼艾尔和我，以美美的一顿火腿肉和朗布卢斯科酒，庆祝了我们四本小册子在圣多明我广场5号的“马里奥·兰迪老书店”同时出版。我的小册子题为《诗歌》：十四首诗，薄薄的四十八页，发行了三百册，外加七十五册用于报刊宣传的非卖册。其中的一本非卖品正好落到了贾恩弗兰科·孔蒂尼的桌子上。这位意大利最伟大的文学批评家满怀好意地给我寄了一个明信片，答应给我写一个简评。

这一成功使我在同伴中间名声大振，却没有从我心中抹却对我那些小小叛逆的羞愧。我没有真诚地赞扬年轻小伙子的美，却求助于各种各样的婉转说法：大卫和耶稣在我的哀歌中跳舞，对死亡的预感被用做了那喀索斯昏厥的遁词。孤独的乡野，纯洁的钟声，对小村庄中的星期日的哀怨连祷。诗句用弗留利方言写成，这一背景又为我脆弱的诗人之冠增添了几分亮彩，尽管跟官方语言抗争的政治意愿在我对方言的选择中并不起多大作用，如你所知，它甚至还比不上我跟我父亲的争执，以及把我艺术家的命运跟我的母语联系在一起的愿望。在每一页下面，我都用小号斜体字，添上了意大利语的译文：由此来把高傲的罗马流放到印刷和文化的地下，把被打败的安巴·阿拉基的盔甲、领章和其他的武装标志，像扔战利品一样，统统扔到妈妈所坐的宝座脚下。

但是，在我年轻的读者中，有谁能猜到，他们崇拜的是一个何等的怯懦者？怎么能够想象，那时候我已经写了一些犯忌的诗句，却小

心翼翼地把它锁在抽屉里，只是要等到二十年之后，才能把它们拿出来与公众见面？

11 (3)

履行并重复生命中最温柔
的行动，直到流血。

一篇关于桑德罗·佩纳 的文章揭示了我怯懦的实质。桑德罗·佩纳，不知改悔的流浪人，胆怯地爱着穿工装裤的小学徒、获准休假的士兵、看门人的儿子、闲逛的小后生：他在一些短诗中为自己涂脂抹粉，诗中回荡着一颗自由的心那喜悦的声音。

我找到了他，我的小天使，
在一个可疑的花坛。

公共汽车的线路真长。

一个粗鲁的面包店小伙计一时间里答应，
然后又拒绝给出他一点点温柔的优雅。

我从燃烧的山岭上下到
火车站新的公共小便池。

这些在书报检查官眼皮底下漏网的诗句证明，只要付出一点点勇气，就可以使他们变成睁眼瞎。既没有暗中偷偷的哆嗦，也没有明火执仗的冒犯：自我协调地生活的纯粹享福，不向任何人掩盖自己。方济各修会式的轻松、光明和温柔。正义者平静的胆量。我的心被一段如泣如诉的诠释撕裂。“如果说，被掩盖的人类痛苦的一份重量，还压着这些空气般轻灵的诗句，那么，它那诗意的高贵却是无可争辩的，它的非道德性并不能证明它的不对。我还需要通过一种基督教的负疚情感，来证明那一位使希腊神明阳光般的纯洁复活的人吗？”

杰那里埃罗，我是多么羞愧难言，竟敢以一个有罪之人的种种悲伤特征，来展现那个人，那个对摩西和圣保罗的宗教压根就一点也不了解的人。即便，当我讨厌了把脑袋藏在口袋中生活，在某一天高举起造反的旗帜时，你也不应该过高地估计我的实际价值。谁会造反，除了奴隶还会有谁？当贵族老爷们证明不了自己的出身时，他们也永

远不会举旗造反，揭竿起义。作为贵族，只有一个人在我们的世纪中闪耀着光芒：他，桑德罗·佩纳，他在翁布里亚山岭之间的佩鲁贾长大，他在罗马的家门向阿猫阿狗阿飞流氓开放，而就在不久前，死神来到他的梦中拜访了他。七十一岁，拖欠了二十四个月房租，三大纸箱卖不掉的诗歌摞在地毯上，五十个空奶瓶搁在厨房的大木箱中，而在他卧室的墙上，挂着装扮成薛吕班的玛丽布兰的画像。

由于我们，亨里科，玛提亚斯，达尼艾尔和我（我为什么总是最先提到亨里科的名字呢？），没能像在玛格丽塔公园的小岛上设想的那样成功地创办杂志，我的文章就发表在青年意大利扈从团的文学月刊《塔米斯》上。一份法西斯刊物，我们希望通过在里头谈论一些与现行制度相对立的作家和画家，渗透到它里面去：波德莱尔、乔尔乔·莫兰迪，他画的酒瓶子让我们很开心，因为那不仅是在博洛尼亚画的，而且他静物画中这些不起眼的玻璃器皿让官方艺术的宏大结构泄气。在《塔米斯》的筛子上，漏过了我的几首得到神秘启迪的诗歌。比如大天使对隐士的这一声激励：“噢，圣者！没犯过错的人不是纯洁的。从洞穴中出来吧！穿越那阴暗的荒漠！承受住邪恶那温柔的美！”总是关于过错和堕落的这种令人生厌的话语。

1942年11月，我弟弟送我到火车站：我作为意大利代表团成员，去魏玛参加欧洲作家代表大会。我为什么屈从了纳粹的邀请？艾利奥·维托里尼，《在西西里的谈话》一书的年轻而又有名的作者，文学界反法西斯主义的旗手，也一路同行。基多不敢对我说什么。当他挥手向一行人致意时，我看到他目光中有一种谴责意味的忧愁神色。这场景久久地萦绕在我的心头，不到两年后，当我弟弟自己也登上一列火车时，当年的回忆肯定闪现在他的脑海中，当然，他不是去跟受戈培尔委托的柏林知识分子聊天，而是到丛林中去跟弗留利的爱国者会合。他让我留在了车站的月台上，在我们跟妈妈一起避难的卡萨尔萨。

从德国归来后，我在《塔米斯》上发表了一篇赞扬作家代表大会的文章，人们实在过于软弱，没有阻止我在那里丢脸。我写道，尽管大会政治宣传的目的十分明显，欧洲青年依然就西方文学的未来，交换了各种不同的意见，等等。墨索里尼最漂亮的墨水，由民族主义的鹅毛笔堆积成了连篇的谎言。这一次，基多——我在对法西斯主义的仇恨中把他养大，我向他援引隆基教授的例子，作为一个毫不妥协的榜样——实在是太光明正大了，无法对我隐瞒他的指责。他把文章扔到我床上，在那些有问题的句子底下画了红线，那一条条红线像一记耳光打在我的脸上，让我不得不正视这些句子：“假如人们猜想目前法国的沉默是决定性的，那么，欧洲的文化霸权应该归于谁呢，难道不是我们吗？……乐观主义促使我们认为，意大利文化超过了其他文化……在一个不久的将来，我们有望成为唯一手中掌握着文化的人，就是说，拥有欧洲精神的人；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也将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自命不凡的废话，我根本就不可能真的相信它。德国军队已经围困了莫斯科，日本人偷袭了珍珠港。?从我再也不敢去游泳池，不敢瞧达尼艾尔淋浴时的裸体之后，我就对自己极为不满，我必须小瞧自己到极点。是的，如果说我把自己降低到自吹自擂的这一地步，那是出于一种隐隐的欲望，为了使我自己在我的弟弟、我的伙伴以及所有那些其蔑视会让我难堪的人心目中丧失价值。只有一个寻求自我惩罚、惩罚自己在私生活中作为懦弱者的青年，才会犯下（但这不是一个抱歉）一个如此无耻的奴颜婢膝的公开行为。

11 (4)

我感到松弛和幸福的那些瞬间：从我的出版商马里奥·兰迪的书店里出来后，我喜欢绕到广场的另一侧，在大教堂中，我走近圣多明我的坟墓，我发现，在那里的祭坛的左右两侧，在陵墓的甬道上，有两个大理石的天使。他们的姿势（单膝跪地，另一膝上支撑着一个枝形大烛台）、服装（一件宽大多褶的衣袍把他们一直裹到脚面）、翅膀全都完美地对称着。不过，相似处也就到此为止。左边的那个天使吐露——原谅这里的陈词滥调——出一种“天堂的甜美”：柔软光滑的长头发，竖琴手一样细长的指头，半闭的眼皮，女子般的雅致，沉思中的举止。他怀着敬意和神秘举着枝形大烛台。这是古典的天使，带有理想的美，假如维斯康蒂能让他从基座上下来，就可以把这位两性人打发到威尼斯的河岸上，当着沐浴旅馆顾客们的面，扮演诱惑者的角色。

我久久地待着，贪婪地瞧着他，可能也感化了修道院中善良的嬷嬷们，她们纷纷来到祭坛后面，借口来看大蜡烛是不是还在燃着。假如她们能读懂我的心，就不会觉得这有什么奇怪了。圣多明我本人或许会赞同我，我，先于保罗六世的著名通谕三十四年，在一个石头的形象上，转移了我从未经历过的激情。谁知道，我们种族的第一个迫害者有没有故意派遣这位信使到我的道路上，教我保护我的“趋向”不受任何有罪的“实践”影响？对倾向，可以，对活动，不行，就像约翰-保罗二世对美洲的大主教们一再肯定的那样。以对一尊雕像的爱，来回报我在博洛尼亚度过的那些岁月的圣洁，这不会搅乱我的良心。

我跪在这个纯洁的天使面前，就这样把自己献给了精神升华的暧昧的甘美，这时候，修女们白色的衣袍来来往往地蹭到我，同时，她们温柔地向我点头致意。幸亏，要想搞乱我心灵中的天堂战略和拯救计划也不难，在祭坛另一侧，有第二个长了翅膀的来访者落入我的视

野。这一位，非但没有激励我进入到超凡入圣的想象的天堂，反而像一帖兴奋剂，为我灌输了他富有战斗精神的、贪婪的活力。

真是奇怪的模特，跟画家们和雕塑家们的整个传统相反，只有米开朗琪罗选择了！他像是在一个大众街区可以看到的某个小学徒，给马儿钉铁掌时，把马蹄夹在两腿之间，或者，像一个小旅店中的伙计，正在地窖的通风窗前卸下酒桶。短短的髻发，结实的胸脯，厚实的脊背，运动员一般的脖颈，饱满的脸颊，目光稳稳地正视着前方：更像是一个粗鲁的小工，而不像一个轻灵的天使，他是不是正等待着什么，准备朝前一跳，把他手中只有形状没有实质的枝形大烛台扔到地上？他让我想到的是你，现在我又一次回想起来：是的，在足球场边上的你，你衣服绷得紧紧的，把出界的球掷回场内，准备好投身于混战之中。肌肉发达，猛打猛冲，没有丝毫阴柔的神态。（这并不意味着，杰那里埃罗，命中注定只配去结婚！）

对我而言，从那一时代起，他就成了我的类别，显然是我的类别，远胜于另一类。一种比面对着性别可疑的年轻人更为强烈的诱惑。而它将很快地迫使我改变生存，把自己亮在光天化日之下，我的直觉这样对我说。对某种体格类型的兴趣，而不是我的勇敢，拯救了我。作为少年郎和青年郎的爱好者，我或许还一辈子保留了想入非非的倾向，想做出神秘莫测的事情，死死地追求某个柔弱的少年，就像维吉尔笔下的牧羊人追求他的阿莱克西斯。

相反，当我仔细瞧了一阵右边的天使后，我走出大教堂时比一匹狼还更饥饿。面对这活跃的矫健者，我怎么能不感到柏拉图之爱的可笑呢？我一直跑向加尔瓦尼广场，跳上11路公共汽车直奔火车站。等待中的机会到最后总是在瓷器的建筑中找到，这建筑的名称，一般都认为是诗人桑德罗·佩纳给的，对它来说要比带有一个罗马皇帝名字的委婉说法更加合适。

这就是我在博洛尼亚某些历险的起源，历险很少，很短暂，很草率；还小心翼翼地瞒着我的同伴，同时也瞒着我母亲和我弟弟。从中

我既没有得到真正的快乐，也没有得到极度的自豪；但至少我坚信了一点，即我不是一个十足的胆小鬼。

12 (1)

复活节的节庆之后，我们就没有再回博洛尼亚。妈妈把我们留在了卡萨尔萨，她想，在那里我们兴许能躲避轰炸。漫长的假期，我们，我的表弟里科（我的姨妈昂丽切塔的儿子）、切萨雷·波尔托多（一个博洛尼亚的移民朋友）、我弟弟和我，好好地利用了它，来勘探乡野，走访居住在各自农庄中的农民，在他们炉灶的角落采撷弗留利的口头文化传统，丰富我们有关他们方言的知识，学得一个与罗马的命运很不同的民族的细腻之处。

7月25日晚上，宪兵队长发现我们正在教堂的墙上写标语：自由万岁。十四岁的里科扔下颜料罐，钻进了庄稼地。波尔托多的脸色刷的就白了，待在那里动弹不了。我手里握着刷子，准备逃跑。基多勇敢地迎着小军官走上去。那军官稍稍地扬了扬眉毛，为自己认出了他而感到惊讶。他只是十分宽厚地揪了一下基多的耳朵。我们只能搞到黑颜色，要是红颜色的话，就能更痛快地庆贺墨索里尼的倒台了。

除了倾翻在地的颜料罐，1943年夏天还留给我另一个深刻形象：夜色中沿着铁路线的一片牧场，黑暗之中飞舞着的无数闪烁不定的萤火虫。从9月1日起，我就来到了比萨，被招去服兵役。停战第二天，德国人冲进了军营，把我们押上一列火车，送往布伦纳。当列车开动时，天色早已经黑了，我们坐的是木结构的旧的三等车厢，卫兵们把包厢门都锁上了。车厢头里站着一个哨兵，看守车门。

列车不时地在荒野上停下来。我的邻座，一个南方人，脖子上挂了一个圆牌，上面有他母亲的照片。他还非要让我看镌刻在另一面的图案，那是一只背上驮着一座方尖碑的卡塔尼亚大象。他是如何成功地拉下了车窗而没有引起卫兵的警觉？“快准备好，”他突然凑到我耳边说。我们的列车暂时停在了一片牧场上，远处有一些形状像阳伞的松树。我的同伴们正在包厢中昏昏的守夜灯光下打瞌睡，像是被带往陌生地的蓝幽幽的幽灵。为了克服睡意，我迫使我自己数着在面前飞

舞的流萤：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任务，因为它们一会儿熄灭，一会儿又亮起来，极不规则，就像天空中的星星。有一只在我看来比其他的要更大。我试图盯住它，把眼睛都看得发疼。

“快，”那西西里人低声冲我说，其实我根本就没有求他带我一起逃跑。我见他把圆牌送到嘴唇上，将一个吻留在了母亲的形象上，伸手画了一个十字，就灵敏地跨过了窗门，身子落在了铁道旁满是积水的沟里。我也学着他的样子飞快地跳下，在他身后的沟里摔了个大马趴。列车已经开始启动。我们赶紧把脑袋扎进水里，生怕被站在车门铁镢子上的哨兵发现。

当我再次抬起脑袋时，我的第一个感觉不是冷，裹在湿透了的衣服中的身体并不觉得冷，也不是逃出虎口的幸福，而是眼前流萤那明灭悠忽的芭蕾的美妙。它们飞舞在透明的夜空中，彼此交换着神秘的符号，就在我的鼻子尖上。一阵阵海风拂过，青草叶在暗红色的背景中柔柔地倒下，又柔柔地挺立。我的伙伴脱下了上衣和裤子，拧干后又穿在身上。而我却依然沉醉在覆盖着牧场的那一场一闪一闪的舞蹈中。

“你没受伤吧？”他问我，蹲到了我身边，系着他的皮鞋带。“我们快走，因为，要是再有一列火车过来的话……”我们一直跑到树林边缘。高大的松树在我们头顶上摇晃着它们茂密的枝叶。

他对我说，我要是再穿着湿衣服就会着凉的。“先脱光了。”他的话简短有力，不太悦耳，跟他的关注形成鲜明对比。“把这个也脱了。”我差点儿问他为什么那么关心我，但是另一个问题，很愚蠢的问题，却从我嘴里冒了出来。

“你说，卡塔尼亚的大象，你戴着它有什么用？”

我停止了拧我的短裤，手指头指着他的圆牌。

“这是一个愿，”他凶巴巴地说。

好像这几个字要费他很大力气，他又叹了一口气补充道：

“我叫塔代奥。”

“好漂亮的名字，”我说。

一丝短暂的微光照亮了他昏暗的脸。然后，还没等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就来到我跟前，迅速地在我嘴上亲了一下，随即就掉转身子，迈开他那西西里人的短腿，大踏步朝树林奔去，消失在那里。

我没来得及穿衣服，光着身子就坐在了一棵松树下。我还记得当时我好几次拿手去摸我的嘴唇，然后再看我的手指头，想在上面读出这一举动的意义，我实在不明白怎么界定这个吻的意思。“塔代奥，”我低声重复道，心中一片惘然，“塔代奥。”我试图回想他的面貌：窄窄的脑门，浓浓的眉毛，又尖又长的翘下巴。“唔！”我对自己说，“确实，我从来没有去过比佛罗伦萨更靠南的地方，我根本不知道南方人的习惯。图里杜会咬阿尔费奥老兄的耳朵，来告诉他，他们将亮出刀子干一仗。”

纬度的差别是不是也影响到了萤火虫的热情呢？在弗留利，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的流萤群飞狂舞，也没见过它们发出那么亮的光。我本来会无休无止地沉醉在这一魅力中，忘记时间的流逝。一列火车，在二百米外朝北驶去，发出哀怨的汽笛声。像是塔代奥救我出来时的口哨声，它唤醒了我的危险意识。没有任何灯光照亮车厢，士兵们正在里面睡觉呢。当初，如若没有萤火虫赶走了我的睡意，塔代奥恐怕就会独自一人逃跑。这是我对后来再也没有见过的那个西西里人的最后一个猜想。

假如，按照他偷偷摸摸的、并未彻底完成的行为，我今天猜测的没有错的话，那么，我倒是更希望，在他母亲将为他选择的妻子，与使他回想起他所许之愿的大教堂前的大象之间，他不会忧愁而又负疚地自忖，在他跟年轻陌生人一起逃跑的那个晚上，他最好还是把圆牌从脖子上摘下，扔到草丛中。

我几乎走了一百公里路，才敢坐上另一条线路上的另一列去往佛罗伦萨的火车。卡萨尔萨像欢迎英雄那样欢迎我的归来。只有基多对我说，那一声腔调跟他的用词同样晦涩：“我祝贺你成功逃亡。”我得

知，在我不在期间，他曾好几次冒着生命危险，去德国人在卡萨尔萨的军营中偷武器。他的一个朋友勒纳托，甚至还为此失去了一条胳膊和一只眼睛。

两个哨兵的死，被游击队杀死的，引来了第一次大搜捕。男人们全都逃到了田野里。里科和我爬上了教堂的钟楼。我们在我们的这一高高的栖架上度过了整整两天两夜。我带上了一个皮制公文包，里面装着我的全部手稿和一部文学史的最后一卷。美国飞机袭击了火车站，扫射了军列。塔里亚门托河上的桥遭到了轰炸：钟楼摇晃了好几分钟。里科从枪眼洞里看着德国兵在广场上来来往往。我更喜欢感受危险的陶醉，或者兴冲冲地体味我在伟大的历史震撼中的孤独。我仅有的两个担心是：一，我们是不是有足够的面包，可以一直坚持到德国人撤退，然后安全下撤？二，我所崇敬的皮兰德娄和斯韦沃，只是在五十岁之后才有了声望。而邓南遮，这个江湖骗子，二十岁时就名声不凡。我希望自己能有声望，可是我，我还活得到五十岁吗？

在这四十八小时的围困期间，我兴许错过了一个很大的机会。在离地面八十英尺高的地方，就像法布里斯在布拉奈斯修道院的钟楼上，我并没有体会到与世隔绝的天堂般的满足。

12 (2)

基多留在家里，跟女人们在一起。穿黑色制服的意大利兵赶来抓住了他。他仅仅来得及跟妈妈交代了几句话。他跳上法西斯分子的卡车那一刻，我们的外祖母跪在他们的头领面前，求他饶过这个年仅十八岁的男孩。他们用手枪顶在她弯拱的背上，把她赶回家中。暴徒们坚持把屋里屋外搜了一个遍，还不知羞耻地对躲在屋里哭的妈妈讲着一些甜言蜜语。直到她最后从抽屉中拿出我父亲的一张照片给他们看，他们才走人了事，照片是在肯尼亚拍的，他身为奥斯塔公爵的军团中的一个军官。基多在被带走之前，给女人们发出了一个新的信号。在他房间的地板底下，她们发现了一些手榴弹，一些枪支和弹药，都是从军营仓库中偷来的。我根本不知道他还藏着这些东西。妈妈和我的姨妈们用了一天时间，把这些武器运出家里，扔到了一个粪水坑里。

三天之后，基多回到家里。他们严刑拷问了他。外祖母倒在床上一病不起。她挨了三个星期就死了。玖丽娅·扎科，科鲁西的寡妇，在她七十八岁时辞别人世。我为她做了一个临终面模。妈妈用绷带绑住她的脸，怕她的颌骨脱落。

美国人继续轰炸着卡萨尔萨的桥梁和铁路枢纽。坐火车去乌迪内已经变得非常危险：大人们也不再送孩子去学校了。我开设了一种私人课堂，给我的表弟表妹们，还有他们的朋友上课。正在一个邻村避难的乔瓦娜·B.来教拉丁语和希腊语。一个年轻的斯洛文尼亚女小提琴手，逃难在弗留利，也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我们的学生学着自己写诗歌，然后分小组在田野里唱这些诗歌，而薇玛·卡尔兹，则用小提琴为他们伴奏。编撰一本用弗留利方言写的历书，占据了课堂上的好大部分时间。印出来的有最好的一些诗歌，还有当地历史上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为避免我们在假期中分散难聚，我建立了“同盟会”，这是我们的学校实践的友情延续。每个星期日我们都要聚会，或是在我

家，或者在我的某个学生或前学生的农庄。每个人都要当众朗读自己新写的诗句或散文，薇玛演奏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西班牙慢三步舞曲，大伙儿静静地听得发呆，都成了她的乡村崇拜者。然后我们讨论诗歌和语言，坚信大众化的伟大传统能在我们的方言创作中重新发扬光大。只有对那些堵起耳朵，不想听到火车站周围炸弹爆炸声的人来说，这个文学小团体的人才显得幼稚得头脑发热。

在我们临时改成课堂的饭厅里，摆着一些胖墩墩的家具，带有鲜花图案，漆成黑颜色，那是我父亲让他以前那个部队中的随军木匠做的。在学校中教课，还有同盟会的聚会，在我心中激荡起的幸福感是那么完美，只有一件事能稍稍扰乱它，那就是每个月从内罗毕寄来的一张明信片。

信的内容越来越贫乏，签名的字体越来越大。最初的那些明信片展现了维多利亚女王端坐在宝座上的形象，是她加冕的那一天画的。随后寄来的形象有乔治五世国王、贝尔福爵士、基钦纳，还有伯恩-琼斯画的吉卜林肖像。后来，可能是被英军俘虏的那些官兵手中的名人头像存货告罄，也可能是被俘者想以一种跟他的处境更吻合的象征话语给我们以深刻印象，他把他的“我一切都好”一会儿寄托给一条在罗道尔夫湖的泥塘中打滚的鳄鱼，一会儿又寄托给肯尼亚的另一种猛兽。譬如这只褪尽了羽毛的秃鹫，衰落的父爱的雄辩形象。

“这就是我奴役中的同伴，这就是我每日的口粮！”他似乎在这样宣告。当一个黑人巫师化为一张蹩脚的图片，印得花花绿绿的，来到我们家时，我们从他那围着他的塔姆塔姆鼓团团乱转的身体上，从那条用鸵鸟羽毛编织而成、围着他乌木般油亮的腰身的缠腰布上，毫不犹豫地认定，这军官突然对土著产生了一种好奇心。不是他，当然不是，投身到了刚刚在由帕韦泽领导的都灵艾诺蒂出版社出的那些紫色封面的书中，而靠着弗雷泽、马林诺夫斯基、弗罗伯纽斯，我很快就从这些书中汲取了促使我对第三世界，尤其是对非洲的兴趣的营养。我父亲可是满脑子的白种人优越感，他还特别夸耀过自己有一个不太

确切的贵族头衔，尤因如此，他给我们寄来塔姆塔姆鼓和鸵鸟羽毛，只能出于一种迷狂。

每个月月初接到他新的信息时，妈妈总要浑身颤抖。战后，她的丈夫会以什么样的状态回到她身边？他的签名占据的面积，证明了他原先的威风依然凛凛，但是，选择一只黑猩猩作为使节，表明了达隆答家的这个军人后代的苦闷和自我蔑视到了何等程度。

比其他形象更让我震惊的，是被掀翻在一只老虎爪子底下的一个探险者。他的身体，我们只能看见脸和肩膀。其余部分都消失在了猛兽的肚子里，老虎已经吞下了从胸前撕下来的一条胳膊，正准备用利齿去咬另一条胳膊。那个年轻的冒险家，既没有昏过去，也没有被眼前的事吓倒，尽管他彻底意识到了他的命数已尽，他躺在那里，不像是一个面对死神已经呆僵的人，而是带着一种自愿献身给刽子手的牺牲者那温顺的高雅。老虎扯破了他的衣衫：可以看到，这青年人古铜色的赤裸肌肤充满了青春活力。

像往常一样，妈妈匆匆瞥了一眼草草涂在背后的那几个永恒不变的字后，就把明信片扔进了字纸篓。这一次，我受到一种突如其来的欲望的驱使，决定把这张明信片从垃圾中救出来。但是，我没有简单地求她把它留下，而是等妈妈走出房间后，像小偷一样把它抢到手，带回我自己的卧室，不让任何人看见。用一枚图钉钉在床头的墙上后，它就成了我的护身符：睡觉前，我向老虎作一番祈祷，让它把我抓在它的爪子中，把我的肉体变成它的美餐。睡眠前的迷糊中，我想象自己身处一座热带森林中，在一只猛兽前飞奔逃命。并不是为了躲避它的利爪，更多地是为了通过逃跑来推迟我的投降，从而更加刺激起屈服时的快乐。我像那个探险者一样，最终跌倒在地，彻底放弃。噢！让这浑身有着漂亮斑纹的魔怪用獠牙把我叼住，咬碎在血盆大口里，吞进喉咙深处！

直到我离开卡萨尔萨的那一天，我始终都把这张明信片留在我的卧室中。我设想，我的父亲，这个发信者，在我每晚性幻觉之前的幻

想世界中并不扮演任何角色，这样想兴许是一个标志，说明我心中存在着一种重大的邪念。难道不是他，远在千里之外的非洲，遥遥地支配着我夜间的胡思乱想？难道不是他，在我的血液中，灌注了饕餮的贪婪和有罪的屈从这混合而不可区分的两者？最后，在彼此混淆的暴力与幸福的一个唯一形象中，贪欲及其惩罚，在他的征兆下，到底施与了我什么呢？

13 (1)

薇玛·卡尔兹教会了我喜爱音乐，还有如何去喜欢它。她让我听收音机里贝多芬的许多交响曲。迄至那时为止，我在乐队的演奏中只欣赏人类情感的描绘或自然景色的浮现。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维瓦尔蒂的《四季》更美的了：用小提琴的拨奏，成功地隐射了冬天里一场淅淅沥沥的雨！用强有力的齐奏来转达春天里一场暴风雨的电闪与雷鸣！薇玛对我的热情莞尔一笑，随后，她用她那柔美而平静的嗓音，带一点点动人的外国口音，告诉了我欣赏这位威尼斯人才华的音乐上的理由，比如说，她教会了我认识到，模仿性和弦的效果是次要的，我必须特别地去关注调性的选择：E大调，圆润而又嘹亮，给了春天，G小调，焦虑而又忧郁，给了夏天；F大调，那么粗犷的味道，适合秋天狩猎的场景；F小调，如愿以偿地荒芜，是为冬季。或者关注使用乐器的方式：我有没有注意到，在《春季》这一乐章中，对大提琴和低音提琴的取消，是如何使得一个四月的清晨变得如此清澈透明？或者，在《秋季》的柔板中，对弱音器的使用，是如何狡诈，令人联想到，参加葡萄丰收节的人在开怀畅饮之后，已经昏昏欲睡了？

毋庸置疑，这些微妙之处完全没有进到我的心中。我属于那样一种人，当他们在贝多芬的《第六交响曲》中辨认出了那些熟悉的段落时，便会带着一种入门者的神态，频频点头，一会儿是小溪的潺潺细语，一会儿是杜鹃和鹌鹑的鸣啭，一会儿是农民们的舞蹈，一会儿又是暴风雨的震荡。把形象放到音符底下，这在刚刚入门的爱好者身上是一种最普通的误会。我特别为这一差错感到脸红，尤其是因为，罗贝托·隆基已经教过我们如何正确地看待绘画。能体现一幅绘画价值的，不是它的题材，而是线条与色彩的构建。同一道理，我的这位女朋友强调说，伟大的音乐只因音的聚合而存在。为什么要在仅仅只体现节奏与和谐的音乐里，一味地寻找心灵状态呢？为什么要让快板相当于一种快乐的爆发，缓慢的乐章相当于忧郁的愁雾呢？人们难道会

自动地把某一种颜色跟某一种感情固定地联系到一起，红颜色与一种愤怒的冲动，蓝颜色与一种静心的欲望，绿颜色与一种对乡村的怀恋？

薇玛给我援引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作为脱离任何意义的音质结构的范例。但是，当我求她告诉我，当初，她为什么没有选一件像钢琴这样的乐器，因为在我看来，钢琴更有利于抽象的探索，而是选择了小提琴这样一件乐器，依我看，不管人们愿不愿意，小提琴都会直接拨动人们的心弦，而且倾向于表现一种狂躁的忧愁，听了我的问题，她好一阵子里一直一声不吭，随后，越发起劲地继续着她的解释。音乐，无论人们是用乐队，还是用钢琴或小提琴来演奏，也无论人们把它们改编为夜曲、随想曲、摇篮曲、船歌，都不表达别的，而仅仅表达它本身，姑娘向我这样重复道，带着一种隐隐的固执，这固执当然不一定是由我腼腆的异议——异议之后紧接着乖乖点头——招来的。她皱起眉头，盯着地面，仿佛在聚集全身的力量，准备拿出最后的论据，坚持到底。任何人换到我的位子上都会明白，她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斗争中抗争着。她最喜爱的那些曲目，明显戳穿了她话中的谎言。她为我演奏了《爱之梦》的小提琴改编曲：太具有甜蜜幻想的浪漫曲，她接着对我说：“糟糕的李斯特”；而我，竟表示完全赞同她的意见，而根本就没意识到，她只是出于自豪感，只是为了掩饰自己的感情，才坚持这一观点。

奇特的回忆，那些漫长的夏日之夜。在给我们的学生放假之后，我带我的女朋友，来到我在卡萨尔萨附近一个小村庄维苏塔租的阁楼。我在阳台上放上两把秸秆编的椅子。在我们面前，渐渐昏暗的平原铺展开来，一直延伸到塔里亚门托河边上显出影影绰绰轮廓的小树丛。微风中，玉米田波浪一般起伏不停，一条长长的运河辉映着落日的最后一线光芒，在两排细长的杨柳树篱之间，突显出一条银白色的带子。另一边，西面，夕阳的光芒给海上飘来的乱云绣上了一圈紫色的边廓。相邻农庄中的孩子骑着自行车从坑坑洼洼的道路上回家，一

筒子牛奶挂在车把子上。我们听到院子中水泵的吱咕吱咕声，母鸡被人掏了蛋，哗哗啦啦地拍打着翅膀，咯咯咯地叫着以示抗议，然后，一切复归于寂静。她从匣子中取出小提琴，为我演奏了她保留曲目中最温柔、最妩媚的段子，在每两段之间，都给我解释那些写在乐谱中的音符的价值。空脚的二分音符，圆圈的全音符，勾脚的八分音符，十六分音符，倍升号，三连音，琶音……我匆匆躲进了虚构，生怕不得不回复那一道热辣辣的目光，仗着天黑，她正直勾勾地盯着我看，与此同时，她的弓在琴弦上上下下翻飞。

为了不至于太被动，我连忙肯定地对薇玛说，文学也一样，应该被看成是一种对纯粹之美的努力追求，而这种美是独立于道德内容之外的。我带着一种跟她颇有些相似的恶意，对她说，在我看来，没有一部小说比纪德的《背德者》构思得更妙，写得更好了。我刚刚读到这部小说，它真正的主题被巧妙地伪装了，并不是对所有读者都那么明显的，兴许对我也是如此。米歇尔的故事对我产生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吸引力，我只把它归于文笔的奇妙，但是，我在我所有的藏书里单选了这一本借给这姑娘读，而不是另外的一本，这一事实就几乎说明，我以我的举动，在无意识地等待着，希望我们两人一天比一天更难堪的那个处境能有一条出路。无论如何，不管她愿不愿意，这一信息最终到达了目的地。薇玛明白了，我在借用那个年轻法国人在北非的经历，为自己摆脱一个无法大声转告给她的秘密。

她脸上堆着苦笑地把书还给了我，向我保证说，很长时间以来，她就猜到了我的意图。现在，她补充说，既然我剥夺了她最后的一丝幻想，我就不应该认为我还能指望她什么。相反，她感谢我的率直，这使我在她眼里越发弥足珍贵。所有的话全都低声地、迅速地说开了，丝毫不让我有时间表示赞同或反对。说话时，薇玛带着母爱般的柔情，抚摩着她的小提琴。当她说完后，她又抓起琴把，对着田野上正冉冉升起的月亮，演奏了一曲贝多芬的《告别》奏鸣曲，缓缓的乐章慢慢地流泻在夜空中。

没有任何别的女朋友表现得如此细腻，如此慷慨，如此情谊浓厚。在我的半告白之后，她还迫使自己付出艰巨的努力，来参加同盟会的活动，当我把学生们带到一个农庄的院子里，或者一个村庄的广场上，面对着惊讶地围观的农人们，在那里背诵诗歌时，她一直随同着我们。我们创作一种叫维罗塔的诗歌，四行短短的诗可以伴着舞蹈来吟唱，跳舞时双拳叉在胯上，轮换着一只脚从另一只脚上跳过去，我至少发明了这一步法，好显示一下这些学生们的灵巧与优雅。这些快到青春期的少年，动作中充满了本能的和谐，而随着青春期的来到，这种和谐也将消失。我的口袋中总会捎来一些小礼物，以奖赏舞跳得最好的人：糖精做的糖果、弹弓、各种颜色的橡皮。只要他们嘴边还没有长出毛来，我就可以说，这些关注就是彻底公平的，看着他们在地面上舞蹈和扭动，有时候还有农民的孩子在学样子，我最多会问一下自己，这里头的哪一个，有朝一日会以某种超越了教育法上的好奇心，跟我的命运连接在一起。

13 (2)

很快地，他们中的一个以自身的才能吸引了我，即便在最激烈的跳跃中，他也能保持身体笔挺，脑袋不乱晃。他轮廓分明的嘴唇上，开始覆盖了一层金黄色的绒毛。他的姓，我从来没有在这一带听到过，仅它本身就足以把我迷惑住。单单一个音节，又冲又细腻，清亮的音像一株嫩苗儿那样迸射出来：斯温。但是，我克制着自己，猜虑着跟一个十三岁少年的情谊会有什么后果，我加倍小心地对待他，甚至不公正到了几乎冷待他的地步。结果，他的另一个同伴总是获得比赛优胜者的奖品。斯温从他长长的眼睫毛中朝我投来一道失望的目光，然后轻轻摇晃了一下他金色的鬃发。他把书包的背带往肩上一搭，不等我发出解散的口令，就吹起口哨扭身走远了。等我最得意的学生走了之后，我便情不自禁地无精打采起来，就在这时候，薇玛为重新活跃小小班级的气氛，就抓起她的小提琴，带领大家跳起了狂热的圆圈舞。

她在我身边假装很高兴的样子，尽管这对她实际上是一种折磨，对比一下吧，我留给她的是一种漫不经心的礼貌，而对我的学生们却赏赐了无穷无尽的费心。但是，不要以为她是出于某种晦涩的受苦愿望（著名的女性受虐狂现象，你问到的第一位心理学家会急急忙忙地、支支吾吾地这样告诉你），在经历着脱胎换骨的锤炼。在演奏贝多芬的《告别》奏鸣曲那一晚之后，她就不再踏上我在维苏塔的小阁楼一步。我们在田野中央分手：她返回她的小村庄，我则走向我的书本。已经不能再求她演奏一次《爱之梦》了。她愿意分享我在学校的工作：但是，像一只夜蛾那样飞来我的灯下旋转并牺牲，这不可能，她不屈尊扮演这一角色。

我认可了薇玛中止我们之间的约会，尽管我很遗憾，她不再为我一个人表演那些个温柔的柔板，那音乐中的叹息已然跟我们心灵中的茫然与激情混成了一体（虽然我们对艺术非个性的观点有些分歧）。

为什么她不彻底拒绝见我呢？玛瑟琳以为自己足够强大，可以防止我跟莫克蒂尔来往吗？

当她告诉我她的理由时，我才如梦方醒。

“你已经二十三岁了，却还没有未婚妻。你可要注意那些流言飞语，它们都已传开了。让我们做得使别人相信我就是你的未婚妻。让我成为你的挡箭牌吧。”

就算我还能对一个女人感兴趣，除了薇玛，还有哪一个可以赢得我的爱呢？当她向我提出这样的建议时，我不得不扭过头去，不让她看到我的眼泪。那是宁静的薄暮时刻，教堂的晚钟响彻清纯的碧空。我们沿着一条夹在两行洋槐树之间的小路漫步而去。从来没有谎言受到这样动人的牺牲精神的启迪。我真想抓住这个姑娘的手，在上面盖满我的吻。薇玛（她常常戏弄我的多愁善感）断然剪除了彼此的柔情。她钻到两棵树之间，跳进甜菜地，冲我喊道，她抄一条近路走了，我们第二天再见。

她的奉献强烈地震撼了我的心，从她嘴里得到的骇人听闻的消息，过了好一会儿才钻进我的脑子：尽管我时时处处小心谨慎，我的单身状态依然使我显得暧昧。人们在问，是不是应该用另一个名词来指称我的行为。弗留利，噢，我的天堂！诽谤与迫害之风第一次刮到了我的脸上。

几个月之后，战争终于结束，薇玛离开了我们，返回她的祖国。火车站上，她把脸凑给我亲吻，也凑给前来欢送她的十来个孩子。她的脑袋显得更圆了，一种更为成熟的意愿烙刻在她的脸上，现在，她不像在卡萨尔萨逗留的日子里那样，让头发披散在肩上，而是按照斯洛文尼亚的习惯，把它们梳成辫子，盘绕在头脑顶上。她细小而又脆弱的上身被框定在车厢的门窗中。直到这一时刻，我才注意到，她的音乐训练已把她的肩膀毁得是如何地不对称。她撞上了我的目光，便急忙抽身躲回她的包厢中。

从此，每当我听到小提琴的曲子，我就不可能不把这乐器发出的乐声跟我们在乡野中的漂泊联系在一起，尤其跟那个春天的夜晚，我被告知我不再得到庇护，我已经受到别人怀疑的那个春夜。

人们说，小提琴长期以来始终遭人蔑视。直到中世纪末期，人们总认为它太喧闹、太尖利，只配在小酒馆中伴人起舞，是吟游诗人和街头艺人的饭碗。要是没有茨冈女人，没有犹太人，它兴许就永远也没有出头之日。因为很容易校音和携带，流亡异乡的民族接纳了它。外乡客和流浪者的乐器，它以委婉曲折而又悲哀动人的长乐句，鸣唱着逃亡者和流放者的永恒怨苦。

究竟出于什么样的偶遇，犹太人的这一忠诚同伴引我迈入了音乐的世界？究竟出于什么样的本能，我竟然对音乐一直无动于衷，直至后来听到它那常常破损而非快乐的召唤？钢琴的源泉更为广泛，但它似乎体现了舒适与安稳，管风琴的鸣响似乎从天而降，使教堂震颤，但钢琴也好，管风琴也好，一开始都没有诱惑我。我曾美滋滋地听着妈妈哼着古老的弗留利小调，但我从来没有想？，另外一种人类之声，一种不属于她的声音，有朝一日会令我感动。歌剧在我看来是一种粗野的、漫画般的东西。小提琴则相反，一下子就征服了我，我这人，我的命运肯定要凭借那么多的关系，把我跟以色列的子孙的命运联结到一起。

被它的歌唱诱惑，不就是侧耳聆听大屠杀的古老喧闹，听到被咒种族的幸免于难者趁着黑夜出逃，背上只负着从浩劫中抢出的唯一财产吗？小提琴兴许就是他们的资源和慰藉，而在我自己的苦难历程中，它就是我跟薇玛一起度过的那些幸福时刻的强心剂似的回忆。

14 (1)

很久以来，基多就决定进山去找游击队。1944年5月的一个早上，他出发了。我本来还打算说服他留下来，跟我一起隐藏在维苏塔的阁楼中。谁若是注意到，他是以怎样的方式，在他的长裤兜里磨蹭着逃过了搜查的那把手枪，并用另一只手挠着他披散在脑门上的黑发络，就像一个初领圣体的少年那髻曲的鬓发，谁就会对自己说，对独裁的憎恨，对祖国的热爱，以及其他高尚的情感，甚至还有对他这十八岁的学生来说十分自然的夸张推理，都在为他更个性化的动机装点门面。像男人那样行事，抹去由这幼稚的小发髻引起的小孩子样的迫切愿望，无疑占了很大成分；但它还远远比不上那样一种希望，希望以血的代价，获得一种自他诞生以来就始终求之不得的认可：在妈妈心中占据一个地位，即便不能跟我的地位同等，至少也要比她把他流放在那里的不起眼的边缘更重要。我甚至不排除这样的怀疑，即他已经想到了去死，把死当做帮他赢得那一份合法宠爱的唯一方法。噢！当然，是以混杂和隐晦的措辞，而不是以我使用的突然的形式。基多一次都没有尝试过说服我跟他一起走：这不太像是一种忽略，假如你想想，对奥贝尔丹和皮萨卡内的敌手来说，任何一个新战士都不会是多余的；相反，这是一种十分自然的忘却，只要你一想到，嫉妒的小弟弟总需要有一块与兄长对抗的园地，这一次，兄长被他成功地远远甩在了后头，无法跟他争夺战斗的荣耀和牺牲的光环。

我是唯一一个还能看穿真相的人，知道我弟弟是在虚张声势，但我也是最后一个能利用这种认识劝他放弃计划的人。他必须为自己的出发添加的神秘色彩，更加速了我们的分离。他赶到火车站，大声地问卖票的人，声音故意大到让在场的职工和旅客全能听见，他要买一张去博洛尼亚的票。买了票之后，他决定偷偷地登上去斯皮林堡的列车，他把我拉到车站的一幢小房子后面。一片空地，满地都是脏纸和碎瓦砾，用做了我们的告别场所。还有时间留住他吗？突然，他用他

那清亮的男高音，唱起了堂卡洛斯和波萨在圣久斯托修道院中高歌的二重唱。

上帝，你想在我们的灵魂中
注入爱情与希望，
敬请你在我们的心中
点燃生为自由人的欲望。

我犹豫了一会儿：上帝也好，歌剧的音乐也好，剧本的蹩脚诗句也好，在我看来，都不是跟一个亲爱者告别的最好办法。但是，有什么办法不回答他热辣辣的召唤？尤其是因为，侯爵的角色很适合我男中音的嗓子。

我们发誓要生在一起
死在一起.....
我惊讶我在喃喃而吟。随后，齐唱时，我不再压抑我的嗓音：
无论在地上还是在天上
你的仁慈都将使我们聚集一堂。

整段二重唱就此唱完，充满了兄弟情谊的山盟海誓，跟压迫者斗争到底的决心，对我们平庸命运的蔑视，诸如此类的话语：我们表达了我们不带丝毫作弊能做到的所有一切，但它们隐藏了另一些东西，对这两个即兴歌唱家的个人未来而言更为重要的东西。

我们的音乐展示戛然而止。去斯皮林堡的慢车，基多一直用眼角监视着的那一列，在铁轨上颠簸着启动了。他跑向车站，绕过小房子，在高高的人行通道旁跑上了道砟，然后跳上了最后一节车厢，没有任何人注意到他。威尔第为两兄弟之间可能出现的最微妙的问题，提供了修辞学上一种优雅的解决法。

在基多离开卡萨尔萨之后，修辞学还在继续追他。它难道没有放松一刻它的遗命吗？假如我准备就他九个月的游击生活，叙说一些可怕的真相，那也该我倒霉。他参加了奥索波的旅，用的名字是艾尔梅斯，你一定记得，那是他的朋友帕里尼用过的名字，可惜这个朋友在

俄罗斯的大荒原中失踪了。一个君主主义者，波拉，统帅着这个旅。旅！多大的一个称呼，用来指十四五个人，他们为了欺骗敌人，打出了十倍于实际人数的旗号，但他们不得不频频转移，在卡尔尼山岭中疲惫不堪地行军。

妈妈在9月份找到了他。道德至上，身体强壮，游击队员有严格的组织，给德国人以沉重打击。我还保留着一封他10月份来的信，署名是“阿玛丽亚”，在信中，他用密码般的言语，叙述了他表面女性化的生活：预见不久就将下雪，为了使她能体体面面地参加冬季体育活动，我们应该给她寄去全套的装备，手套、带刺钉的靴子、羊毛内衣、还不算风雪帽和太阳镜。

德国陆军元帅凯塞林，统帅着德国步兵、法西斯民团和俄罗斯逃兵，在11月发动了进攻。我弟弟和他的一个朋友，基诺，对一个哥萨克小分队作了整整一夜的抵抗。奥索波旅，政治上很温和（绝大多数成员加入了行动党，基多也注册在内），在乌迪内以北约二十公里处打响了战斗。由共产党人组成的加里巴尔蒂旅，当时驻扎在附近地区。这两支部队被人数多得多、装备也更精良的敌人缠住，于是签订了一份联合协议，然后就合并为加里巴尔蒂-奥索波师，服从于统一的领导。

14 (2)

铁托派来的一帮人，从边境的另一侧过来，也在上弗留利地区游荡，来散布贝尔格莱德的宣传，企图获取这一边疆省份的领土。元帅向加里巴尔蒂-奥索波师建议，让他们编入斯洛文尼亚军队中。师长萨索，一个共产党人，有些犹豫不决。副师长波拉则竭力反对这一提议。当德国人在年底又发起攻势时，铁托的士兵毫不迟疑地赶来支援意大利爱国者，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战死或者被俘。在战斗师内部，共产党人对他们的同伴不断地施加压力，让他们从上衣的翻领上摘下三色徽章。压力！这么说其实只是一种委婉的外交辞令，要是你想想，有一天，一个特派员竟把手枪都顶在了基多的脑门上。他也好，他的朋友们也好，谁都不听从这一要挟。他们高傲地回答，他们是在为意大利的旗帜而战，而不是在为红星而战。波拉的君主主义信仰（他忠诚而又勇敢，从不把这当成什么奥秘）为别人指责他背叛提供了一个借口，其他那些人也拒绝向我们的敌人铁托出卖一块国家领土。

鹅毛大雪飘落在波尔祖斯高原。波拉和他的参谋部设在被一个看林人遗弃的圆木棚屋中。波拉身材高大，瘦削，花白的头发剪成平顶，一皱起眉头来，两个眼睛之间便出现一条深深的竖纹，他不停地抽着一个镶银边的短烟斗。他的一切神经质，全都转移到了这个动作中，这种不带冒犯性的癖好使他平静下来，调整心态，以他始终沉稳的嗓音，下达命令，分配任务，研究形势，解决争端。他的话语不多，只是在深思熟虑之后才说几句。他严于律己先于严于律人，可以相信手下人的绝对忠诚。爱他并服从他，都只是出于一种冲动。如果他不问青红皂白就行使他的权威，那就好了：那样的话，基多现在兴许还活在人间。我弟弟无意识地寻找一个“好”长官，想以他代替父亲的形象，结果在这位统帅身上找到了目标，为表示对他的忠诚，放弃了自卫的本能。

那天晚上，装烟斗之前，波拉问了一下，哨兵是不是守在岗位上。他脸上的肌肉突然抽搐起来，很奇怪。当他坐在一张铺满了地图和计划的折叠小桌子后面，开始抽起烟来时，他的脸孔恢复了平常的镇静。在棚屋中忙碌的人，没有一个会猜到，他已经预感到了一种不同于他们习以为常的风险的危险。十几个游击队员在大锅前围成一圈，大锅吊在炉灶上，底下熊熊地燃着一堆火，松枝噼里啪啦地烧着。在这个下雪的黑夜，根本不用担心炊烟会被外面的人发现。然而，我弟弟坚持认为，首先必须得到指挥官的准许，才能点火。他的同志们早已等得迫不及待了，准备拿他们在横谷的溪流中捕到的鳟鱼，熬它一锅香喷喷的鱼汤，听了他的话，不免取笑他的胆怯。他赌气地退到一旁，忙着用一块破布擦他的枪，与此同时，其他人在七手八脚地忙着，准备把那些长着彩虹般艳丽鳞片的鱼从水桶里捞出来，活活地扔进沸水中。就在这当儿，他们听到树底下传来一阵口角声，那嗓音分明很陌生，基多第一个跳起脚，将枪口对准了门口。

波拉从地图中抬起脑袋。他嘴里还叼着烟斗，就示意我弟弟过去看看。这时候，大门砰的一下开了。冲进来五六个人，队员们立即认出来，来者是加里巴尔蒂旅的志愿兵，他们还恶狠狠地大声说，这不是欢迎朋友来访的方式。看起来像是头领的那个人递给波拉师长一封信，是他的上级萨索师长写的。其他人不满足于拿冲锋枪对着前面的人，一面把手指头压在扳机上，一面上下左右地打量着棚屋的角角落落。他们把挡在屋子两端的两扇窗户上的木板摘下来，打开窗扇，俯身观察着外边，让人捉摸不透，他们到底是在测量屋后山岭的高度，还是在向可能留在外面树林中的同伙发信号。无拘无束得令人发指，灵活敏捷得无可指责：被他们取下了窗板的窗户，在黑糊糊的树林中投下了一个个四四方方的亮块，在白雪的映衬下格外白亮，尽管，实际上，煤油灯和脂油蜡烛连手电筒那么亮的光芒都不能发出。

但是，除了狂怒不已的基多，还有那一天冷静得实在要命的波拉师长，围在炉火前的小伙子们并没有表现出别的什么担忧，他们只担

心一点，唯恐新来的那些人跟他们分鱼汤喝，瞧他们气势汹汹的样子，到时候怕是只会给他们留下一堆鱼刺。

师长读完了信，写了一张条子，递给基多，又低声地嘱咐了几句。我弟弟选了他的两个朋友，基诺（那个哥萨克）和切萨雷（因为他是博洛尼亚人），把信叠好装进衣袋，放在烧酒壶和带保险槽的尖刀之间，跟他们一起出门，钻入了黑夜中。

没有人能说清楚，后来，在四面圆木墙之中发生了什么事情。毫无疑问，锅里的水没有时间沸腾了，鳟鱼也来不及离开水桶，因为，三个信使还没有朝山脊走出一公里路，就听到棚屋方向传来一阵噼噼啪啪的枪声，几声嚎叫刚刚传出，又立即没了声响。基多和基诺正想返回去，切萨雷却还在犹豫，正在这时，他们看到一个血淋淋的伤员，朝他们喊，让他们赶紧逃命：其他人都已经死了，波拉第一个被杀。基多飞奔回来，身后跟着基诺，心中尚存一丝渺茫的希望，想及时赶到，支援他的上级。切萨雷则留在原地没动，随时期待着新的动静传来。杀人者现在成了那地方的主人，满足于守株待兔，把那两个返回的朋友抓住，将他们的双手绑起来。他们认定没必要埋葬那些牺牲者，便把他们堆在棚屋里，然后放一把火烧了。然后，突击队带着两个俘虏迅速离开，转移了营地。

假如基多和基诺同意加入铁托的队伍，发誓放弃他们原来投身的事业，他们本来有可能保住性命。整整三天中，他们被逼着做出选择，要不，投奔真正的“爱国者”，要不，就去见识留给“叛徒”的下场。我弟弟用他带着铁链的双手，在胸前抚摩着他的前师长的烟斗，那是一个看守出于怜悯心，在他的要求下，从死者的嘴里拿下来后，塞在他上衣里侧衣袋中的。他的政治忠诚眼看就要衰退，或者他的自卫本能马上要唤醒他的妥协，但一接触到这个物件，这个曾是他无限崇敬的上司的心爱之物的烟斗，他就一下子想起了光荣的温泉关勇士。难道他不比莱奥尼达斯更有骨气吗？

他们在高原上转悠，一个谷仓又一个谷仓地寻找着能抵御风雪、寒冷、黑暗和恐惧的庇护所。在这孤零零的山上，只有乌鸦飞过，才打破一阵子孤独，偶尔，还有远处传来的马达声，那是一队德国兵在谷地中穿行。

第四天，那些人决定审判这两个桀骜不驯者。一对搁凳上放一块木板，算是法庭的审判桌了。这两个朋友五花大绑着，被押到所谓的军事法庭前。他们必须报出自己的姓名和公民身份，当初在波拉身上免除了的这一套把戏，现在却要使人相信——如果以后调查起来的话——这场诉讼的谎言，说明这一审判具备了“跟敌人斗智”的应有的良好形式。跟起诉书同样极不公正的判决书，五分钟之后就宣读了。宣判官丝毫不带外国口音，连一丝轻微的痕迹都没有，但对基多来说，这并不能减缓这样一份判词的欺诈：确确实实，是一帮意大利人把他们的两个兄弟送上了绞刑架。庭长说话时带一点波代诺内人的口音，一个起诉人说的是弗留利圣达尼艾尔地方的方言，另一人的衣领上别着特雷维索足球俱乐部的徽章。

14 (3)

一部分人分散到附近的农庄，去寻找铁锹和铲子，准备挖坑。基多趁着混乱，从看守的眼皮底下偷偷溜走。他成功地潜入到密林中，摆脱了身上的绳索。没等多久，士兵们就顺着他的踪迹快速赶来，但是，因为林深树密，他们无法确定目标，便朝一棵棵树干胡乱开了一通枪。如果不是有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肩膀，伤了他的肩胛骨，可怜的逃亡者可能就逃脱了险境。他还有力气奔跑，一直跑到猎场看守人的屋门前，筋疲力尽的他一头倒在一个女人的脚边，昏了过去，那是一个怀孕八个月的年轻而又强壮的农妇。

丽贝拉·皮亚尼——我是从她那里得知这些最后的细节的——扶起了我弟弟，一直搀着他躺到她自己的床上，为他的伤口做热敷，给他喝了一杯热咖啡，里面掺了她丈夫自己酿的六十度的烧酒，让他恢复精力。然后，她站在家门口，在用核桃皮染过的松木门柱之间，稳稳当当地等着两个气喘吁吁地从丛林中跑来的追捕者。她的肚子挺在这粗犷的大门中央，显得那么威严，使他们顿时慌了神，在她面前结巴起来，说他们正在寻找一个受伤的同伴，想送他去医院。她表示这样很好，提出一个条件，他们可以用她自己的自行车，让一个年轻人把基多送到城里，留下另一个在她家里当人质，直到他的同伴回来。这一切，她以一种那么镇静的口吻，一种那么自然的坚定说出来，仿佛无限的权威就在这个手无寸铁的女人手中，而不是在两个游击队员的铁掌中，他们像听从命令一样听从她的教诲，乖巧得如绵羊一般。基多已经缓过了劲来，认出了那个正在给自行车打气的小伙子，就是当初答应了他的要求把师长的烟斗留给了他的那一位，便歪歪扭扭地坐到了自行车的架子上。那农妇，站在她家的门槛上，始终目送着年轻人向谷地方向走去，在浓密的松树林中间，只有这么一条小道。

命运总爱捉弄人，他们还是落到了另一支出来寻找逃亡者的小分队手中。宗派主义的仇恨和报复心理，终于压倒了微弱的怜悯心。基多被迫从自行车上下来，迈开双脚自己走路，焦躁而又恐慌的他，又被带回到原先逃走的农庄院子里。人们把他推下挖好了的土坑中，就在基诺的尸体旁，尸体上已经铺盖了刚落下的雪花。我愿意这样想象，他仰面躺着，直瞪瞪地盯着刽子手的眼珠，当子弹从冒着烟的枪口飞出，打在他脑门中央时，他甚至都没有闭上眼睛。

由于切萨雷好几个月后才在卡萨尔萨露面，我们很长时间里一直没有基多的消息。解放也好，停战也好，都没有把我弟弟归还给我们。渐渐地，妈妈终于明白到，基多在饭桌上的位子已经永远地空了出来，他那个套餐巾的小环也不再有用。在他卧室中窄小的铁床上，还铺着蜂巢纹花边的压脚被，她很少进来坐一坐，面对着加里·库珀和约翰·韦恩已经发黄的图片。如果说，基多在临终之际，曾期望用他牺牲的恐怖和他命运的悲惨，来争夺一下在母亲心中一直被我占据的位子，他却被剥夺了这最后的一丝希望，因为他根本无法让我们了解他如何牺牲的，就让时间和习惯的泡沫磨灭了这一事件的惊心动魄。

包裹在一面三色国旗中的灵柩，载在一节敞篷车厢的平台上，进了卡萨尔萨火车站。蒙着绉纱的鼓敲响了一曲葬礼进行曲，妈妈走在社会名流的第一排。人们把棺材抬进了我们家中，当着她的面打开，她认出了她的儿子，按照当地习俗，把尸体缝在一块分娩之日派过用场的床单中。在我们家乡，人们要在死者的床垫子上割一道缝，好让灵魂更自由地一跃飞向天空。妈妈让人在裹尸布上剪开一个角，作为对那个没死在床上的人的补偿。在墓地里，妈妈靠在我的胸脯上，紧紧依在我的怀中，当我的姨妈们向坟墓中扔下鲜花时，她哭得热泪滂沱。但是，这一声声嚎哭，依然是献给我的，她利用这一机会，重新向我确认了她的爱，尽管这种爱已经被我的阅读、被我孤独的工作、被我跟薇玛一起的散步、被我在家庭之外的活动减弱了一些。从此，

母与子，只有我们自己才能彼此理解，彼此疼爱，彼此帮助，就像马利亚和基督，他们这不可摧毁的一对，他们之间的互相崇拜在福音书中广为流传。妈妈当然忘不了她的二儿子，但她把他这个凡人打发到死人中去了。基多不得慰藉的幽灵，依然在地下游荡着。他伸着他那血淋淋的面孔，惊愕于他的英雄主义竟然无用，发现最终还是我有办法，通过躲藏在维苏塔村的那个阁楼上，就保住了他通过一次壮烈的牺牲都没能成功获得的东西。

我能想象，你很希望知道我对我弟弟的死做何反应。在我的回忆中，失去我的童年伙伴和最好朋友给我带来了莫大的苦痛和打击，除此之外，我还感受到一种悔疚，当初我实在不应该让他一个人出发。我的良心在指责我的懦弱和自私。尽管没人想到要责备我的行为，事实毕竟摆在那里，弗留利青年的柔弱之花介入到了抵抗运动中，在冬？最严寒、最可怖的几个里，冒了巨大的风险：对他们中的最优秀者来说，这些风险导致了关押、折磨、牺牲。另外，就基多的命运而言，我也感到我有直接责任，毕竟，他的反法西斯主义思想，不是从别人那里，而是从我身上汲取的。是谁教育了他，为一个在墨索里尼的殖民军队中当军官的父亲感到脸红？谁在他的头脑中灌输了这样的想法，为了替他的朋友，自愿去俄罗斯前线参战的艾尔梅斯·帕里尼赎罪，哪怕付出天大的代价都不过分？

14 (4)

过于轻信弟子，他现在有权利要求得到我的一个弥补。加倍地疼爱妈妈，照他喜欢的样子写出我的书，更积极地参与到政治生活中，一句话，让我努力以一种尽职的方式留意于对他的记忆，但是，这些必要的虔诚行为还远远不够。还有某种更珍贵的债务要偿还，迟早有一天，我还必须为他的亡灵还债。

这就是，在我的观念中，我所谓的不抵抗死亡的起源，我强调的不是我的自杀倾向（我太热爱生命了，不会落入这一被失败者用做骗人玩意的俗套），而是我对死亡的不抵抗态度。我前进，我向前走，被贪欲推动着，去享受一切。但是，在我背后，有一个始终保持沉默的熟悉幽灵。用不着向我指出他就在那里，这个苍白的幻魂的目光始终就没有离开过我。我知道，假如我转过身去，我就将跟随着他，跟他一起走下他正等着我去的阴暗王国。这一情感始终伴随着我一生的历程。我周围的人可能会觉得，我的许多行为无法解释，我们一些朋友会认为，我的许多习惯和趣味十分荒诞，但是，假如他们觉察到，活在世上这一简单事实，竟能被这样的一个人当做一种罪孽，因为他喜爱的一个弟弟先于他进了坟墓，那么，他们就不会再那样看我了。

对我来说，羞耻感和有罪感还有别的原因：在火车站，然后在墓地，演说者们把基多的死，说成为意大利爱国者反对法西斯和纳粹压迫的起义的一段插曲。随后，人们每一次纪念波尔祖斯高原的牺牲者时，都要猛烈抨击希特勒的暴行，甚至在切萨雷带来了确切的消息，证实了官方说法的谎言后，依然如此。但是，在1945年，就像我马上就要告诉你的那样，根本不可能公开揭露共产党人在抵抗运动中的两面行为：现在，在弗留利大地震荡着的、让雇工和季节工的无产阶级大军跟大财主们作对的政治斗争中，共产党人毕竟站在最前沿，肩负着人民的希望。想通过揭露在铁托的命令下所犯的可耻行为，从而削弱

共产党人的威望，其结果只能导致支持农民党的基督教民主派的胜利。我意识到战斗的赌博性质后，就离开了行动党，我当初之所以参加这个党，是出于对基多的忠诚和怀恋。我汇合进了那样的一种力量中，它是唯一能胜利地掀起农村的无政府主义造反、以反对富人专制的力量。然而，有多少次，我不得不强忍着心中的怒火，听到在公共广场上，或者在竞选集会上，那些杀害了我兄弟的人依旧恬不知耻地宣扬着他的价值。是不是应该让他们玷污了自己双手的罪行，公开地转变为他们的光荣？生前跟他们作过斗争之后，死后的尸体是不是还要被他们用做旗帜？

葬礼那天晚上，卡萨尔萨的各家各户，我学生们的家长，方圆十公里的人们，都派出了他们家中的幼子，按我们这一带的吊唁习俗，带上一篮鸡蛋和一袋面粉作为礼物，来看望我的母亲。埃及人在棺材中放上食物和饮料，以方便死者在坟墓中的游历。这一风俗，很可能在地中海绕了一大圈，一直传到了亚德里亚海岸边：从很古的时候起，它就在弗留利地方流行，但是，这里的玉米种植者都很精打细算，不像尼罗河两岸的人们那样富有诗意，他们改变了这一习惯，使它变得索然无味，到现在，殡葬时赠送的食品根本就不会浪费一点一滴。

我很惊讶地看见，斯温也出现了，就是那个农民的儿子，我在做诗歌和舞蹈练习时格外关注过的那位。他的姓在我们这地方独一无二，唯一的单音节就像阳光那样一下子透射而出，我会把他忘记了吗？他依然那么漂亮，那么果敢，像年轻的牧人一样，满脑袋的鬃发，十分潇洒，他坚持要把他家的礼物亲自送到我手上，这使他着实盯了我好一阵子。寂静而又高傲的目光，我在那里头读出了对不公正的谴责，竞赛的奖品每一次从他手中溜走时，我都对他犯下了不公正的罪；除了谴责，还有一种热烈、绝对的眷恋，只要我愿意，他是多么想向我提供这样的证明啊。我不禁战栗了一下，一边低下了眼睛，

一边把他这张金灿灿的脸上——春天干燥的凉风为他的脸染上了一种镀金般的光彩——的每一根线条，都带到了我的记忆中。

只有上帝知道我的心有多么沉重，我忿忿地驱逐了任何的放荡念头。其证明就是，在我挎着斯温的那篮鸡蛋走上楼梯时，一种深深的厌恶，丝毫不是装出来的，突然攫住了我的心，我回想起了马塞尔·普鲁斯特，一个我已不太喜欢的法国小说家，他描写过一个亵渎神圣的场景，一个老阿姑仔人物，夏吕斯男爵，就在他妻子的葬礼上，询问了一个唱诗班小男孩的名字和地址。

15 (1)

八月份，我父亲从肯尼亚回来了。我们全都提心吊胆地等待他的归来，我们都相信，他在经历了四年的俘虏生活后，回到我们身边时肯定没什么好心情，法西斯主义倒了台，墨索里尼不光彩地完了蛋，他自己的军事抱负也破灭了，他的未来也成了泡影。但是，也许是他的健康受了损害，也许是他经受了过多的挫折和侮辱，也许是他这个旧军官的最后一丝骄傲理由，他小儿子的体育才能——是他把自己对武器和狩猎的兴趣传给了这小子——也因基多的死而化为乌有，反正，这军官根本就没有像我们事先如此担心的那样再出去抛头露面，而是整天乖乖地坐在厨房的一角，要上一杯红葡萄酒喝着。

我们以为，他一旦振作起精神来，就会以他的哀诉和他的责难让我们遭罪。但我们显然低估了他辛酸的深度，他沮丧的强烈。在家里的最高一层楼上，有一个无法住人的斜顶的小间，平时用做堆放废家具的储藏间。他决定躲进那个灰尘蓬蓬的陋室，在那里度过夜晚，以及白天的绝大部分时间。他衣服也不脱，就倒在一张从旧军营里搬来的行军床上，只是到吃饭时才下楼。他再也不谈论他肩章上还缺的第四条饰带，也没有一次想到继续行使他做丈夫的权力，甚至还彻底放弃了掌管家政大权的愿望。他把自己化为了自身的影子，我们听见他趿拉着旧拖鞋，走在楼上的过道上，嘴里嘟囔着没头没脑的词儿。出于军人的本能，他把自己安置在一个高高在上的位子上，以便监视我们的来往行动；出于嘲讽，他选择了满是破椅烂凳、无用杂物的废品库，这是他残破生涯和他残废希望的象征。

每天晚上，我在他的门口放上一大瓶皮诺葡萄酒，他一个人就在那些高悬于房梁上的战利品中间把它喝完。每天两升十四度的红葡萄酒。餐桌上，他用他死里逃生的齧齿，一声不吭地嚼着煮牛肉，几丝肉丝沾在他的小胡子上。你还记得那个时代，他把我摁倒在厨房的桌子上，往我的眼睛里滴眼药水吗？当年把我摁得无法动弹的力量，如

今使他的牙翘起在嘴唇上，镶着金牙的牙豁子露了出来，在他的颌骨前闪闪发光。现在，除了那张劫后余生的嘴，他就再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向我显摆了。他充血的眼睛，骨碌碌地不停乱转，兴许是酒精产生的效果，兴许老是想着同一件事想得多了。慢慢地，这种寂静而又眼泪汪汪的暴政，在我们看来，反倒比以前的夸口和咆哮更难忍受。但是，一开始，这位一家之主过早的衰老，给我们带来的不是牛皮大话和可疑的暴力，而反倒是一种奇妙的恩惠。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沉浸于对弗留利战后生活的庆贺。考虑到种种新的创伤和悲哀，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放松和幸福的阶段，尤其对我来说，它是我生命中最温馨的季节。

尽管有好几个月时间的绝对贞洁，这一点恐怕还是免不了会让你吃惊，你这人，我紧迫地求你给我至少一点点看得见、摸得着的爱的表示，这是你答应过我的。我在卡萨尔萨周围村庄的公共学校给孩子们上课。星期六晚上，伙伴们来找我：伙伴们，是的，我找不到更好的词来指称那些人，把我跟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只有一条模糊的、无忧无虑的、快乐的连线，我们一起骑自行车远足，参加大众舞会，夜晚还有饮酒聚会。有一个伙伴叫努托，跟姑娘们在一起时最大胆，头发像非洲人那样短而鬈曲，皮肤黑得像煤炭，在汗水和美发油的作用下闪闪发亮。他在自行车把手上插上一枝英国山楂，嘴上还咬着一截，一边走一边摇晃。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脖子上围一条丝围巾，或者在蓝色牛仔褲的屁股上贴一颗纸星星，是从美国杂志上剪下来的警察佩戴的星星。他若是去参加什么舞会，那些被指派看管自行车的年轻小伙子，都会争先恐后地照料他的那一辆，把它调放到可靠的地方，而他则直奔舞池，以他耀武扬威的入场，吸引所有人的目光。另外有一个，叫曼利奥，栗色头发，波浪型的，随身总带着一个手风琴，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每一次节庆活动中必不可少的大活宝。第三个，艾尔米罗，向他当农夫的叔叔借来一挂拖车，由一匹花斑白马拉着，带着他的女伴们坐马车赶来，一边唱着歌，一边大呼小叫。他

的身体很弱，手上总捏着一块手绢，时时准备对付一阵阵的咳嗽，他仔细地梳出一条头路，把一头漂亮的金发一分为二，还让一绺头发耷拉在脑门上，就在那双尖利如钢的眼睛上面。

跟异性的关系仅仅限于一些和善的调情，没有后果的那类，而且只是做给塔里亚门托河左岸的小伙子们看的，告诉他们，波代诺内那边的小伙子们就用不着费心这些征服了。姑娘们很快站在一旁，等争吵过去后，以千倍的兴奋，扑向美酒和音乐。酒瓶子一个个堆放在棚架下的木头桌子上，曼利奥满头大汗，筋疲力尽，用他的乐器拉出最后一曲狂热的狐步舞。他的对手，来自法艾迪斯或者科德罗伊坡的乐手，更是精疲力竭，手指头僵得痉挛不已，连连求饶，承认吃瘪。随后，我们四个人，全都消失在夜色中，彼此送对方回家。绿廊藤架下的一个小小手势，就表示了对静静坐在长椅上的小姐们的从容告别。

于是，节庆中最丰富、最幸福的时刻开始了，尽管我今天已经无法向你细说我们的喜悦。寂静中，我们骑行在尘土飞扬的路上，伸长耳朵聆听猫头鹰的叫唤，闻着带有瓜果香味的熏风，把被我们车灯的光迷住眼的刺猬从车辙中捡起来，裹在一件衬衣中，捕猎一只在家禽棚周围溜达的狐狸，毫无疑问，对我们来说，再没有比这更有趣的事情了，它足以令我们心花怒放，感到无比幸福。艾尔米罗早已把马车打发给了一个年轻的表弟，让他赶回去了事。我们三个骑车的轮流带他。努托趁此机会露骨地抚摩他，在他的脖子上留下一个个吻，还在他的嘴上重重地响亮地亲了一下。我们全都开心地大笑起来。我们同伴的动作，丝毫不带有任何暧昧的小算计，只是证明这个黑家伙实在过于活跃，无法抵御好奇心，要尝一尝金发少年的白皮肤和苍白嘴唇的滋味。同样，一个皓月当空的夜晚，当我们渴望赤身裸体地在塔里亚门托河里沐浴时，我的朋友们也丝毫不觉得有什么难堪，而只有彼此显示各自肉体的快乐。午夜十二点的钟声敲响时，我们还在桥中央停下来，一起往河里撒尿，比一比谁的阳具更长。我恶作剧似地玩着

这游戏，在我们决定要显示的某种状态中，我每每总是大获全胜，而我们中的唐璜，那位暴躁的努托，则输得一败涂地。

这就是直到1950年的意大利。在依然狭窄、两旁依然种着梧桐树的公路上，遇到的自行车要远远多于汽车；在牧场上，没有被杀虫剂灭绝的萤火虫，为漆黑的夜晚带来了它们亮闪闪的芭蕾；山羊奶酪在潮湿而怪味的地窖中酝酿成熟，而不会像在冰箱的奶酪专柜中变硬。年轻的公畜沉湎于它们并未意识到的彼此吸引中，而这一吸引也并未使它们在集体中孤立。我可以成为“我自己”，而不变得“异样”；甚至不感到需要发作，需要在一种直率的冲动下，粗暴地对待比抚摩还更温柔地包围住我们的弥散的感觉。我知道，我只要伸出手来，就可以为我的幸福多增添一份重量：但这动作因我们彼此间缺乏抑制而变得无用。我对未来毫无畏惧，我对现在毫无苛求。这是我生命中的唯一时刻。我们彼此搂着腰走在街道上。看到两个小伙子被一种表示亲热的身体符号联结在一起，善良的人们在家门口并无恶意地摇起了头。

肺结核同样也是这个已消逝了的意大利的一个组成部分。艾尔米罗出发去了一个疗养院，到了那里后，因为病情太重，就死了，成了牺牲品，当时的人过于相信自然疗法，相信乡村的新鲜空气，相信煎洋槐糖汤喝，相信母亲们、姨妈们、姐妹们、表姐妹们的热心照料能治愈一切病，以至于真的耽误了他的治疗。

每个黄昏都能给卡萨尔萨带来一种家庭生活的一幕幕宁静而又熟悉的场景，根据时辰的节奏，还有季节的变化，田里的活儿该歇歇了，晚饭该去准备了。农夫们坐在装满干草的车上回村，由两头棕色的牛拉着走。孩子们把母牛赶到由一个摇把汲水的小水池中去喝水。一个小姑娘先给自己的发辫系好结带，然后把牛奶给果品店送去。她让我想起来我童年时的女伴奥蕾丽娅，她今天已经嫁到了乌迪内，成了殷实的小市民。教堂对面的广场渐渐热闹起来，各家门前飘逸出玉米粥的香味，门窗上也透出了灯光，这时候，堂·保罗，趿拉着金色的

桤木鞋，高高地撩起教袍，从本堂神甫住宅中出来，走到教堂，在祭坛两边点上蜡烛，准备做晚课。

15 (2)

我们常常聚集在曼利奥父母的家中，在康佩西农庄中，这是当地最大的和最富的农庄。我想象，往昔父系社会的秩序恐怕也不会是别的样子。院子里，晒干的芦苇秆紧靠着披檐的壁柱，边上放着冬天用的木柴和薪禾。一个门厅，女人们在那里把她们的草帽挂在竹子做的衣帽钩上，门厅通向一排房间，都用白灰刷得雪白。最小的孩子们，两个一排地睡在玉米须须的睡垫上，睡着之前数着房梁上溅上的石灰点子。脏衣服泡在一个个大盆中，盆大得像酒桶一样。接着，就来到了一个宽敞的厨房，它用来做餐厅。从炉膛中漏出一丝微光，在鼓突的锅底上映衬出紫色的反光。老爷爷坐在长桌的一头，一边叼着烟斗，一边已经打起了瞌睡。女人们忙忙碌碌地撤走残羹剩菜，没忘了把还能吃的东西挑到一个篮筐里，再装上一些水果和一瓶子牛奶，准备留给孤儿院的嬷嬷，这是一个上古以来的习惯，每天都要给孤儿一点施舍。

厩栏中，守夜还在继续。女人们带去她们的针线活，团团坐成一个圆圈，她们头顶上的灯底下贴了一张油纸，是用来吸蚊子的，与此同时，畜生们有的站在圈栏中反刍，有的往干草上蹭痒痒。与其听那些留在厨房里的男人咒骂共产主义的发展和青年人的无教养，我们更乐意跟女人们待在一起，跟她们讨论意大利的问题。她们体现出一种开放和好奇的精神，尽管在丈夫和兄弟面前，她们的嘴里连半句话都没有，好不容易在这里得到了唯一的交流机会，她们便用来以别人的知识充实自己的头脑。

在厩栏中，她们自由自在地闲聊。一天晚上，努托不无苦涩地抱怨他作为农业工人的生活条件，说自己饱受大财主的欺压和盘剥。康佩西家的母亲和姨妈，远没有被针对她们的这一攻击所激怒，反倒对这年轻人的出路表现出一种宽容，从这小子的言行中，她们不无道理

地看出了一种对其生命活力的亲切证明，而不是一个明确的指责行为。

曼利奥的一个叔叔厌倦了待在厨房里，但又认为跟这帮到母牛棚里来凑热闹的女人一起坐在一条板凳上，实在与他的身份不太相配，便在院子里等着我们，瞒着女人们偷偷地把他的烧酒瓶子递给我们。

但愿热血能在我们的脉管中狂躁地流动，可是，不，受我们的守夜的传染，我们的血仿佛就像哺乳动物温和的奶水，某些事件给了我们机会证明这一点。十月份的一天晚上，尽管外头下着瓢泼大雨，一种异常的热烈气氛依然笼罩着从艾纳尔到圣乔万尼的各个地方。区里的秘书跟特地从波代诺内赶来的农工联合会一位领导正在讨论。艾尔米罗让我跟他待在一起，他在桌子上赶写了一份宣言，他那些年轻的表兄弟从柜子里找出一面红旗，在一片欢呼声中展开挥舞。小啤酒瓶从一只手传到另一只手。受到热烈氛围的刺激，或者想到确定要在第二天举行出征，时不时地，会有某个老游击队员激动起来，不仅哼起了抵抗运动中的一首歌。集会在齐声合唱副歌中结束。同一时刻，同样的场景在各处重复着，在罗沙，曼利奥参加了，在利古尼亚那，努托参加了。

直到午夜，在值班室窗户的挡板后面还透露出灯光；两三个迟来者在门槛上嚷嚷着酒气冲天的醉话；一阵焚风刮来，带来最后几滴雨水，把大门上挂着的画有镰刀和锤子的党旗刮得哗啦啦地响。

第二天，天刚拂晓，长长的大车队和自行车队就从各个村庄出发，一起汇向格卢阿罗镇。教堂前的大广场上，人来得那么多，队伍挤得那么密集，几乎可以说，这是一次圣母朝圣会，只不过不同的是，人们的衣服扣眼上都佩戴着红色的标志，还有，示威者并没有穿他们过节时才穿的漂亮衣服，而是穿得五花八门，什么样的都有。园丁的工装裤，农夫的罩衫，牧羊人的短褂，游击队员的旧军装，警察的伪装色贝雷帽，美军的橄榄帽，从德国兵那里弄来的军帽。努托格外地引人注目，梅红色的围巾系成大翻领。天空被昨夜的一场雨洗得

湛蓝无染，卡尔尼山脉在透明的天边凸现出它的层峦叠嶂。公共汽车的司机们刚刚让从乌迪内、波代诺内或者更远的城市来的乘客在邮局门前下车，就一边在柱廊下匆匆喝着咖啡，一边互相打听，这些喧闹的人群聚集在这里想要干什么。随后，由于既没有警察露面，也没有宪兵出来，他们便耸了耸肩膀，又回到他们的车上去了。

在一长列紫杉树的尽头，矗立着皮尼亚蒂别墅，它周围是一个很大的花园，前面是一个砾石地的院子。人群中有一部分人朝那里走去，想迫使别墅的主人解释一下最近关于招募失业者的那个法令。皮尼亚蒂躲在一个窗户后，端着一杆枪等着我们。面对声势浩大的人群，他同意接待一个代表团。艾尔米罗和三个同伴一起进去了，被带到一个阴暗、潮湿却又庄严的房间里，地上铺着大理石方砖，四壁都是沉重的橡木架子，从地面一直立到天花板。一卷卷烫金封面的书，像一个个哨兵那样在那里站岗。在一张上了蜡闪闪发光的卡弗尔式书桌后，坐着皮尼亚蒂老爹，一个僵硬而又脆弱的老头。他背后站着他的儿子，穿着一双马靴，手里还握着枪。艾尔米罗被这背景和这番迎接吓得有些发懵，不禁低下了眼睛。小皮尼亚蒂以嘲弄的口吻问他，是不是在地上找什么东西，或者，造反者们是不是同样也有什么奢望要撒在他家的砖地上。这时，艾尔米罗被这番讥讽话激怒，开始了一番紧张的争论，尽管争论有可能转向不利的结果，但它持续了很长时间，到后来，终于有一个劳动工会的领导赶来了：他告诉这房子的主人说，假如他们再坚持拒绝大伙儿的要求，那么他将无法保证人们对他们家别墅的尊重，甚至也无法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皮尼亚蒂老爹毫不让步地离开了这个房间，但小皮尼亚蒂代替他坐在了书桌后，签署了一份同意招募一百五十名工人的协议。

在圣乔万尼，在罗沙，在利古尼亚那，在卡萨尔萨，在格卢阿罗附近的所有村庄，喧闹声一直持续到深夜很晚。比平常更慷慨的痛饮延长了胜利的欢快。说实话，甚至在形势显得最为严峻时，人们的好心情也没有过片刻的松弛。当艾尔米罗在一杆枪的威胁下谈判时，欢

笑声、玩笑话、唱歌声一直回响在村镇的街道上。这是阶级斗争的插曲，还是更为激烈的一场战役？人们跑到皮尼亚蒂家的别墅去，向那一老一少挑战去了，而不是满足于围绕着酒瓶子跟河对岸的那些小伙子们较劲，众人都带着这样美滋滋的心情回家，同时又怀着一点点遗憾，这样的日子毕竟不像星期六的舞会那样还会再来。

不久，又有传言说，人们要去攻打斯皮塔贝尔戈伯爵的城堡，听到这消息，弗留利的全体青年都想去参加。斯皮塔贝尔戈家族源自奥地利，后来把姓氏意大利化了，并按照1930年时的哥特式风格重建了他们家的城堡：在巴尼亚罗拉的村口，矗立起了闻名遐迩的一座建筑，它那小小的窗户被做成枪眼的形式，八边形的堡塔上装点着雉堞。在伯爵的心中，它应该以它好战的威严外表，令人联想起某种中世纪的要塞。它让我想起了路纳伯爵的硬纸板住宅，那是在乌迪内小歌剧院上演的一次外省版的《游吟诗人》中的布景建筑，同样的矫揉造作，同样的喜剧化，我曾对它报以嘘声。

努托处在栅栏前的第一排，用一根铁棍开始砸起锁来，他的伙伴们则朝城堡扔起了石头，小石头越过了围墙，落到房子前。一个男人的脑袋从枪眼上露了出来。他大喊着，问我们到底想要干什么。听到我们的回答（“说话，谈判”）后，他狂怒地关上了窗板，然后，我们看到他打开了尖形拱肋的门，站到了台阶上，手里握着一柄双筒枪。“让我们听一听你们要对我们说什么吧，”他嚷道，“站出一个人来，跟我说话。”这一次，我想到的不再是歌剧中的一幕，而是西部电影中的一场戏，被牛仔们围攻在牧场上的强盗负隅顽抗。那男人头发乱蓬蓬的，没有穿上衣，两腿紧紧地裹着皮绑腿，看来就是城堡的总管，他的主人们已经躲藏在后面，准备从花园中逃跑，他们只是派他出来察看一下情形。

15 (3)

“只许过来一个人，”他再次喊道，“不然我开枪了。”

一个老女仆出现在他的背后，一边拐着腿，一边打开了栅栏。曼利奥趁着努托想扔铁棍的当儿，一步跳上前，代替了他的位子，跟着那男人进了城堡，进去后，那男人又一把关上了门。

半个钟头后，曼利奥又重新露面了，伸出双手表示空空的什么都没有，并丧气地摇着脑袋。“无能为力，他们拒绝了。”人们决定撞开大门，占领城堡。努托冲在最前面。他的一只脚刚刚踏上草坪，三扇窗户中立刻同时伸出来三支枪筒。努托不管同伴们的劝阻，继续一马当先地冲去。只听一声巨响，一颗子弹从他头顶上飞过。攻击者顿时乱了方阵，纷纷奔向墙后去寻找隐蔽处。他们开始考虑应该采取什么策略，这时候，镇中央传来一声叫喊，如同一声炸雷，撒在了大部分示威者正忙着攻打城堡的开阔的草地上。“警察来了！”三四辆载着警察的卡车，跟在一辆装甲车后面，正朝这里驶来。车队刚开到开阔地的口上就停住了，人马从卡车上跳下来，手指头都扣在斯腾卡宾枪的扳机上，带钉子的鞋底掀起一团团尘土。

每个人都捏紧了拳头，有的握着棍子，有的握着铁锹或镐头。努托从他身旁人的手中夺回铁棍。警察队长站在缓缓前进的装甲车上，命令我们立即散开。车子离我们只有几米远了，它还在开着。我们向左右闪开。它撕开了人群，它开过去后，人群又汇合成一体，挡住了后面警察的道路。警察们挥舞警棍，威胁着我们。我们则高举起拳头、铁叉和锄头，以示回答。但是——怎么说呢？——没有任何通常被我们叫做厌恶的东西隔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彼此对立。在他们那一身制服底下，人们认出了他们农民的本原。我们不能憎恨这些口音很熟的健壮的小伙子，他们跟我们一样都出生在贫穷家庭，甚至比我们还更不幸，只不过他们脱离了过于贫瘠的土地，投身到那个肮脏的职业中去。

彼此暴躁地动手，可以有别的原因，而不见得非是仇恨。短短几秒钟就足以造成一场混战。我们展开了肉搏，在地上乱滚，每个人都紧紧抱住一个敌手，而这敌手也只能寄希望于他强健的肌肉。叫喊声、咒骂声响成一片。我们互相鼓励，开起了玩笑，尖声地唱起了老歌。流血了：新鲜而又少量的血，从轻微的抓伤处流出，这更刺激了我们搏斗的决心。年纪最大的那些人是最早逃跑的。警察一边跟在他们身后追，一边挥舞着大头棍，有些人没能逃脱；有一个人受了重伤，当天只有这么一个，躺在地上动不了。年轻人不愿意后退半步，一直坚持到军队赶来支援警察的那一刻。士兵们抓住我们的伙伴，把他们押上汽车。顿时，树倒猢猻散。那些看来已经有十五六岁的小孩子逃跑起来，还跟两三年前一样敏捷利索，而一个穿着短裤的葡萄园老板，甚至还看到他们一边逃跑，一边偷葡萄吃。

暮色降临到了空荡荡的开阔地上，卡车已经带走了二十来个倒霉的俘虏。与此同时，玫瑰经的钟声蓦然鸣响，敲得那么清脆嘹亮，尤其因为村庄中寂静一片，居民们全都闯上了家门。两遍钟声之间，人们能听到远方传来邻镇的钟声。在利古尼亚那，在圣弗罗雷阿诺，在波尔戈-布拉伊达，平原上，各地高高的钟楼都发出了祈祷的召唤。再更远些，在科德罗伊坡，在圣维托，钟声也敲响了，在我们的耳中更为微弱，我们仿佛听到了往昔一代代人的叹息声从岁月深处逸出。一个个世纪的叮当声飘荡在田野上，如傍晚的雾霭一般忧伤，一般无形。我跟曼利奥、艾尔米罗以及努托一齐躲在一个干草仓中。我们是从清新而又阴暗的街道出去的。几个女人贴着墙壁走着，匆匆忙忙赶往教堂，比她们先到教堂的女人们，已经跪在祭坛前开始做晚祷了。

为我党的宣传工作服务的责任心，迫使我强调了警察胜利和宗教礼拜的同时性：这是政治权势和教会权威之间明显的勾结。只有一个在一所抽象的学校中培养起来的官僚，才会有勇气支持这样的一种观点。农人们凭着自古有之的细心，清楚地知道，对土地上的那些年轻人，那些外表那么平静，守习惯，懂规矩，与季节的交替和谐相处的

人，必须给他们一种阶段性的发作，让热血暴烈地沸腾一番：跳舞跳得筋疲力尽，喝酒喝得烂醉如泥，从舞会中出来时打架斗殴，假如这些还不够，那么就该奔赴战场，借口去参加英勇的战斗。巴尼亚罗拉的示威者兴许认为，他们是在为国际共产主义的进展而斗争，因为他们在扣眼上佩戴了一颗红星；同样，他们的敌手——他们同样也是土地的奴隶，而不是基督教民主党的奴隶，尽管现在，他们的头盔和制服代替了工作罩衫和短褂——也以为他们是在保卫共和国的制度。实际上，陶里亚蒂也好，德·加斯佩里也好，都不领导着冲突。在两大阵营中，人们不知不觉地服从着两千多年来一直流行的规则。它已经成了自然的一部分：到了一定年纪，最勇敢的男子汉们就要时不时地动一下武，流一些血，同样，按照这一规矩，女人们则要去教堂，双手合十向圣母祷告，以她的名义大唱赞歌。一方面，是寻衅、斗殴、痛打、受伤；另一方面，是喃喃的祈祷，齐声唱颂歌：这一切，在起义打击地方贵族的这历史性的一天中，显示出了与大地的古老智慧的和谐。

我将说：“为了事物的永恒秩序”，而决不是说，我厌恶使用那样的一种套话，它总是用于证明穷人对富人的不抵抗，证明富人对穷人的统治。然而，我可能会使用如下的词语：我难道不是已经积极地投入了，人们难道可以指责我在混战中袖手旁观吗，我这个出于对个人主义、对财主残酷压迫的仇恨而很快去领了党证的人？尽管我借口说，星星在苍穹中占据一个固定不变的位置，宇宙服从着永亘的规律，从而犯了这样那样的过错，我依然坚定地相信，人们根本就不会明白战后的政治大辩论，假如人们不把它们跟其他的乡村宗教仪式联系在一起考虑，什么洗礼的庆祝，婚礼的庆祝啦，什么去弗留利的圣达尼埃尔教堂圣殿的朝圣啦，牲畜大集市啦，还有圣约翰之夜啦，狂欢节游行啦。那时的意大利，想象一下她的形象，那是古老的东方人崇拜的多乳房的老奶奶，我们今天在那不勒斯的博物馆中看到的以弗所的黑色阿耳忒弥斯。拥抱她所有的孩子在一个集体中，没有边界，

没有歧视，闭上眼睛不去注意他们行为的差错；从词义上带有宗教的意味；温柔，热情，乡土，感性，已经有些戒备，但还不足以抑制年轻人的反抗。反正，年轻人并不把攻打城堡的必然精力看成为来自马克思或者葛兰西。

在康佩西家的厩栏中，人们评论着巴尼亚罗拉的失败。女人们称赞着警察的节制。努托大叫着反驳，举出X的例子，他被打破了脑袋。“一点点污泥，”家中最年老的老婆婆说，“只不过是一点点污泥。就像你的老爹给了你一巴掌，让你流了几滴鼻血。公安力量就应该是公安力量。”她这样总结道，说着扶了扶眼镜，数着手中的毛衣织了几针。这句神秘的话语似乎遭到了普遍的不满，因为，接下来，厩栏里变得鸦雀无声，只有畜生低沉的咀嚼声，以及粪堆上乱飞的苍蝇的嗡嗡声。曼利奥的母亲和姨妈们刚才抬起了头，听着老奶奶的话，现在又低下了脑袋，埋头于手中的针线活。努托在他的板凳上折腾了一阵子，然后，为了表示他良好的意愿，把一个线团夹在了膝盖中间，捻起了羊毛，仿佛在这些女人的奴颜婢膝中，认出了跟他的反抗本性截然对立的对应物。

维苏塔的小教堂，14世纪时期罗曼风格的建筑，矗立在一片水草茂盛的牧场中央。认真地凝望耳堂的内墙后，我发现有壁画的痕迹。一个画家朋友教我用新鲜的洋葱擦去石灰表层，让原先的形象显现出来。经过整整一个下午的工作，我们终于得到了一个圣徒的头像，附近的第六雷盖那修道院使我们相信，画像的作者，正是为修道院的教堂做装饰的那位乔托的无名弟子。

在那个时代，我画了很多素描，也画了很多油画。风景画，女人肖像，儿童肖像，自画像。我两次画我自己嘴里叼着一朵花。彩色油料也好，水彩胶也好，都不能令我愉悦。我必须承认这一怪事，尽管我根本就不是什么绘画材料方面的权威，反正在我看来，在所有艺术中，绘画是跟自然的关系最紧密的一种。因此，我喜欢自然的颜色超过商业产品，我开始尝试，把颜料管里的色团一会儿跟草莓汁混起来，以获得一种更柔软的红色，一会儿又跟某种嫩草液拌在一起，以形成理想的绿色调。在我的画家朋友启发下，我开始收集各种植物，他叫朱塞佩·芝盖纳，我在他位于弗留利的切尔维尼亚诺的家里得到不少植物。（后来我回忆起这个时代和这段友谊，便邀请芝盖纳在我的电影中扮演角色：在米兰拍摄的那部电影中，绘出神秘之画的就是他的手。）

六月的一天下午，大约两三点钟，正是酷热难当之际，田野上空空荡荡，人也好，牲畜也好，全都躲到了阴凉地里睡午觉去了，我跳下自行车来到一家农户门前，想讨一杯水喝。我已经筋疲力尽，因为刚刚骑了不知多少公里路，为我的颜料草寻找新样本。院子中央，有一个年轻的男孩，坐在水井旁的一块石头上，几乎赤身裸体，正晒着太阳。他手里拿着一根橡皮管子，管子的另一头用铁丝固定在水龙头上。我只看到他的背，黑油油的，闪闪发亮：肌肤受到了阳光的支配，在深色的皮肤底下，肌肉的游戏清晰可见。

他头戴一顶宽檐的大草帽。身边的地上，扔着一大束新采来的虞美人。那时光，他似乎正沉浸于深深的冥想中，定定地瞧着两腿之间的什么东西。我蹑手蹑脚地走近他。房屋在关得严严实实的窗板后沉睡。狗躺在窝里，只是微微抬了抬嘴，随之又昏昏睡去，都懒得吠叫一声。没有一丝风能驱一驱暑热。满院子晒着一条条白床单，像一块块电影幕布那样僵僵地晾在铁丝上。

我以为是帽子的东西，实际上是没有了帽顶的一圈帽檐，让一团跟麦秆一样颜色的金发露在外头。小伙子听到了我的脚步，一下子跳了起来，猛地转过身子。我们交换了一记惊讶中透出愉快的喊声。原来是斯温，自从基多的葬礼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因为他去了乌迪内继续读中学。他变得强壮了，漂亮了，但仍还是那个斯温，那么健美，那么匀称，容光焕发，他还没长胡子，胸脯和肚子也没长毛，依然跟小孩子那样，但他穿的短裤是那么窄小，腹股沟上已经有一团浓密的黑毛露了出来。他拦截了我的目光，脸红了，穿上牛仔褲，刷地一下拉上拉链，同样敏捷地扣上了皮带，最后，不顾胸脯依然潮湿，穿上了格子衬衣，还扣上了纽扣，那衬衣，还有裤子和皮带，都是美军的剩余物资。

然后，他发现自己头上还戴着那顶怪帽子，充血的脸一下子变得更红了。他嘴里嘟囔着，说如果“妈妈”午睡醒来发现她珍贵的遮阳帽不见了，他父亲就要骂他了，说着，便匆匆返回屋子里，根本顾不上捡走他的凉鞋。

就这样，我刚刚看见了这种威尼斯女帽最稀罕的样品之一，早先，在韦罗内塞和提香的时代，女人们在阳台上看景时就戴这种帽子，这样，面孔得到了帽檐的保护，而头发却露在外面，她们可以无忧无虑地让秀发被阳光晒成绘画中那种不朽的半透明的金黄色。往日里在都城的贵族中流行的一种习惯，竟在外省最落后的农村地区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如果说，看到一个20世纪的农家女还在追求当年总督府或长官家的一个淑女那样的矫揉造作时，我不免大吃一惊的

话，那么，这种风雅的证明落实到十六岁男孩的身上，就让我有些想入非非了。斯温是不是要把对往昔风尚的模仿再推广一步，要用海绵浸透木瓜汁和女贞树汁，在晒太阳的时辰中一滴一滴地润湿头发呢？

16 (2)

我在水泵底下凉快了一个够，这时，他又出现了，满头金黄色的鬃发披散在古铜色的脸膛上。我比我本来想象的要更难堪，便随手捡起那束虞美人来掩饰一下。这时，我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我认为还怪不错的。我从我的教学经验中获知，你要是能跟一个孩子玩，你就算征服了这个孩子。

“看看我们要来做什么，”我一边对他说，一边把一条正晾晒着的床单从铁丝上取下来，“不要担心你父亲和母亲会说什么，在他们醒来之前，我们会把一切复归原位。来吧，活跃一点。”

他惊慌失措地看着我把洁白的床单铺在地上，就在满是尘土的院子里。我毫不惋惜地把他拉下了水，要知道，这一违反家规的行为，会使一个老实正派的儿子，在父母的眼皮底下，变成一桩小小罪行的同谋犯。

虞美人花束在被单上方我的掌心中被揉碎，变成了一种汁液，十秒钟后又干涸了。我让斯温到水泵那里把手指头弄湿，然后蘸上花汁搨到被单上，描画出他所喜欢的形象来。他当即就玩了起来，画出了一些魔幻的星星，那些枝枝杈杈的角就像触手似的。他的手指头经过之处，白布就染上了一种淡淡的红色，几乎是玫瑰色，但鲜亮得很，因为床单刚刚洗过。在图画的边缘，斯温的食指留下了一条鲜红的滚边，真正、唯一的红色，珍贵的朱红。这个结果令他兴奋。他想在床单的另一部分重新开始涂鸦，便自己揉搓起了鲜花，用弄湿了的手指，试图画一峰骆驼。除了高高的驼峰，你实在很难分辨出那是一只猫，还是一头绵羊。这一回，斯温有些沮丧，请我也来试一试。当我认真作画时，他伸出胳膊搂住了我的脖子。看到布上渐渐地呈现出某个非洲村落的样子，有帐篷，还有动物，他高兴得要命，突然就在我的脸颊上亲了一口。他在我的作品上又补了一两处细节，我们就这样继续画下去，轮流把手指头弄湿，抹出多种不同的色调来，全都介乎

于红色和玫瑰色之间，但又有无数细微的差别，而这要取决于我们是浓浓地涂上罂粟粉，还是把它稀释了，还要看食指摁在布上的压力大小。

斯温面对着大功告成的作品，拍起手来。他兴高采烈地嚷道：

“我们成画家啰！”

我以为他还要来亲我，但他的脸上却掠过了一丝阴影。

“可是，”他的情绪顿时变得很忧郁，“这，这可不是绘画！”

“怎么不是，是的，斯温，这就是绘画，而你，你就是一个画家！”

我心里猜，这种对自身才华的极端怀疑，应该直接来自于学校，因为在中学里，带有学院派偏见的老师会教导学生们说，绘画要从画架和画笔开始，想到这里，我便对他举了一个过去的大画家的例子，他就用植物来制造自己的颜料。（画家就是蓬托莫，但我没有说出他的名字，我坚信，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课堂里，老师都不会提到圣费利奇塔小教堂：为了再看一眼《基督下十字架》，我甚至准备，你想象一下，将我的脚再一次踏入那个肮脏的佛罗伦萨城！）我补充说，自从他死后，就没有人能明白他制造他的玫瑰色和绿色的秘密。

“这一秘密，你不愿意帮我来发现它吗？我们只需采撷各种各样的无数花朵就行了。”

“噢，太愿意了！”他欢呼起来，“假如您带我去的话，我们立即就干！”

“你忘了，”我提醒他，“我们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呢。”

我从地上拿起床单，但他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我们在那上面共同完成的作品，他还想再做修改呢。随后，我尽量装出最坚决、最冷峻的神色，带着床单走向水泵，尽管得到他的亲吻后，我的心一直在胸膛中怦怦地乱跳。我听不见他的叫喊，把喝水时摘下的皮管子重新接在水龙头上，将水流对准我们的图画，不一会儿，床单上的画就消失了。我始终平心静气，外表甚至无动于衷的样子，把重又变得跟

刚从洗衣池中出来时一样白的床单晾到铁丝上，用两个夹子夹紧，并拿眼角的余光偷偷观察着斯温的失望和忧伤。我做到了两点，第一点，通过这一显然使他感兴趣的活动，让他依附于我，第二点，第一次明白无误地向他揭示了，总是乖乖听家长话的不合适。这是一个极好的教训，他将在他记忆的一个阴暗角落中牢记，他获得了一种强烈的快感，不仅没有征求他父亲的同意，而且还冒险做了一次会遭到父亲责备的举动。

接下来的日子，以及剩余的那些夏日里，我们投身于一连串新的体验，把孤零零的谷仓的墙，或者离村庄足够远的教堂的外墙，当做我们壁画的画板。我们俩竞争着寻找珍惜的植物，或者发明新的混合颜料。每天在一棵老苹果树前约会，那棵老树位于卡萨尔萨和斯温家农庄的中途，树干疙疙瘩瘩的，里头都空了。如果我有什么事迟到了，他就在树洞中给我留一张字条：“明天在此等”，或者“为什么不是狮子和羊羔？”在众多的寓言故事中，斯温最喜欢给我讲一个中世纪的?耳曼故事，哈默尔恩的笛手。一队耗子被悠扬的笛声吸引，走出了城市，这跟我们的情景很相似。但是，被市民们的背叛所激怒的乐手，把孩子们也带在了他的身后，这一队孩子是如何迷失在森林深处的呢？

16 (3)

有一天，我给他带去了一个弹弓，作为他上次遭受的不公平的赔罪礼物。他看透了我的用心，因为，第二天，我在树洞中发现一张条子，用美术字写在一页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上：“您那时候为什么那么狠心？”我刚刚读完几个字，正被他的这番真诚激动得热泪盈眶，他就偷偷地从后面扑到我的背上，两手捂住了我的眼睛。他原来就躲在附近，要给我来一个惊奇。从此后，我们俩就轮番地藏藏在离苹果树不远的地方，偷偷地观察迟到者的失望，然后扑向对方的脖子。斯温总是想办法把我扑倒在地，他也一起倒地；相拥着在草地上躺一小会儿；然后在我脸颊上亲一下，这已经成了习惯符号，表示我可以起来了。

我们一路穿越田野，把各种各样的叶子和花朵装进我们的挎包。出于对我小偷小摸策略的真诚，我鼓励斯温跳过私人花园的栅栏，趁着主人家正在午睡的当儿，到花圃中去偷栽培的鲜花中最漂亮的样本。这种行为有双重好处，既能补充我们野生植物的给养，又能训练他偷偷犯忌、违法乱纪的胆量。水仙花的洁白，风信子的紫红，银莲花黄色，大丽花的橘黄，玫瑰花的肉红，石竹花的鲜红，五彩缤纷的花儿令他陶醉，令他出神。而更为世俗的我，则把刺柏的黑浆果或者开心果带树脂的嫩枝在手中捻碎。

几年后将成为一个优秀画家的那个人（只因为他为人太谦卑，拒绝去罗马发展，才没能最终享誉全国），现在不是带着他的调色板和画笔在画坊中学习，也没有到商店里去买颜料，而是在大自然提供给他巨大而又神奇的色板中，亲自挑选他的颜色。他对香味无动于衷，几乎意识不到玫瑰还在芬芳散香。春天开花的山梅花，在道路两侧散发出扑鼻的清香，而他却只是一心问着自己，这种白颜色是不是跟蝴蝶花的深紫，还有仙客来的闪色相配。

他成了我的老师。比较我那些世故做作的发明（例如：把酒醋跟适量的石灰混在一起，得到一种鲜艳的红颜色，又比如，使用尚热的蜡烛油做溶剂），他更喜欢直接从他的鲜花中汲取颜色。面对一堵空墙，他根本不需要铅笔或者钢笔来描出初样。他直截了当地蘸取他最漂亮的色块，抹到他想装饰的表面上，手指头小心翼翼地行走在这绚丽多彩的颜色中，用不着描出线条，打出轮廓，狮子与羊羔，老鼠和孩子就活灵活现地出现在了壁画上。

我欣喜于斯温的飞速进步，但是，更让我感到幸福的是，当他发现一个侧身像画得很蹩脚，或者一处背景处理坏了，突然丧失了信心的时候，他会把脑袋靠在我的胸脯上，要我给他一次爱抚，当然，出于谨慎，也考虑到他的年纪，这种爱抚仅仅局限于抚摩一下他的后脖颈。我经历了生命中的第一次爱情，户外田野中的教学和贞洁的感觉混合在一起。唯独有一回，我把斯温紧紧搂在怀中，并亲吻了他的脸颊，那一次，他用他简单而又动人的手法，在一个小教堂废墟的柱子上，画出了一个十分漂亮的天使脑袋。

很长时间以来，我就想把他带到我在维苏塔的小阁楼，好让他更进一步了解我的文学创作。他很惊奇地看到，我的书桌不是放在朝向田野的老虎窗前，而是靠着一堵死墙。我对他说，跟画家的职业相比，作家的职业是不讨人喜欢的：作家必须集中心思，与世隔绝（窗户和“全景”对写作而言是格格不入的），跟他亲近的人分离，而大型壁画的创作，在过去需要团队的工作，而且常常要当着一大帮欣赏者的面工作，画家们一边工作，一边开着各种各样的玩笑，在脚手架上彼此开心地交流着，而大瓶的葡萄酒、大圆面包、圆柱型干奶酪，总是放在他们伸手可及的地方。

他根本不拿耳朵听我的诉苦，只是好奇地打量着我散放在书桌上的各种用具，其中有的他还不认识：大小不等的蘸水笔笔杆，那个时代还挺新颖的圆珠笔，一块两用的三色橡皮，一把改错用的刮字刀，一把裁纸刀，两卷粘胶条，其中一卷还是透明的，一个订书机。而在

在我看来，这些文具中只有一件当时稍微有些滑稽，却是在多年之后才派上用场的，那已经是在罗马的事了：装在一把柄上的刮脸刀片，它的用途很特殊，我把文学界的同事们寄给我的那些样书的题献页裁下来，然后，再把它以一本一百里拉的价格卖给旧货商。

与跟手工劳动每一阶段相伴的那些仪式相比，那个坐在打字机或铺开的纸张前面的人的动作，在我眼中几乎总是贫乏单调的。我不仅仅是为了取悦斯温，为了鼓励他绘画的志向才展开这一番比较的。这是我内心深处的想法。捣鼓材料，像手工艺人那样去克服一种具体的困难，这是埋头在文学中苦干的人所无法体会到的乐趣。我年轻的来访者根本就不听我的推理。我白费口舌地向他解释说，呆坐在椅子上，往纸上填满种种抽象的、等同的、单调的符号，这样的活动给了我一种深深地不满足和厌烦的情绪，他根本听不进我的话，他在一行行落在纸上的潦草的文字中，发现了一种神奇的美，尤其在听完我朗读我的一首诗歌后，竟几乎有些恼怒，惊异于我玩弄文字时怎么会不更高兴一些。

“我那淤泥与象牙的肉体，”他如痴如醉地重复道。他背诵起了（可是他懂吗？）我写的一首像是连祷文一样的歌颂少年之爱的诗：

急速的火焰

那秀发.....残酷的

冷落，那目光.....

“喏，”他又说，从我的书桌上拿起一杆笔，塞到我的手，“我想让您这几天里给我写一首诗，只写给我一个人的！这样的话，您坐在您的椅子上就不会感到那么不幸了，因为，我就在您的思绪之中。”

我做诗人的“志向”，尽管还不太确切，却毫无疑问地在这一时刻诞生了。听到这么亲切地转达出的责备，我几乎快乐和惊奇得要哭出来。它用何等巧妙的表达告诉了我，他意识到了被人爱着！这又是何等巧妙的一个邀请，请我继续追求他！这杆自来水笔，黑色的胶木做成，笔套上有一颗白色的六角星，标着“勃朗峰”牌，德国产品，从此

它成了我最喜爱的物件。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它，即便在我最初几次乘飞机旅行的时候，它的墨水漏了出来弄脏了我的衣袋。我之所以最终选择了作家的职业，画家的头带之所以只有一次绑在我的脑门上（在我拍摄于那不勒斯电影中我扮演了乔托这一角色时），那都是因为斯温的那些话，还有这杆“勃朗峰”牌钢笔。我是不是应该遗憾他没有真的拢紧我的头发？作为职业画家，我恐怕应该继续寻找在陡坡那一边的鲜花。我的作品，倘若用易腐烂的材料绘制成，就会随着它们有机生命的意愿而变化，成为难以预料的各种腐蚀的牺牲，最后可能会彻底毁于腐烂。然而，比起我的书的命运来，它要更令人羡慕一千倍，书的内容一旦藏于图书库虽然会毫发无损，但五十年之后只能提供给那些大学中博学的人士做做研究而已。不过，我兴许不该忠实于我青年时代的最温柔、最动人的回忆。

今天，是你，杰那里埃罗，使我坚信了我的工作的价值。是的，当我厌倦了我的同行们虚伪的奉承时，当我证明了，我的成功除了为我招来我的敌手们的恼恨和嫉妒，或者我担任评委的某个文学奖的候选人的吹捧，没有其他任何用处时，当没有朋友以一句真诚的话表达出稍稍不同的看法时，当我问自己，我的书比起我每个月要扔到旧货商大车上的那些书来，是不是更能吸引人们的注意时，我只要想一想站在你父母家的平台上的你就足够了，你就在那里，在栽种着罗勒的花盆和吊在棚架上的蒜辫之间。假如，我书中的字词对于你也不像晒在你昏昏欲睡的父亲胳膊上的太阳光那样活生生，不像你母亲用大瓶从厨房龙头下接水浇灌的薄荷那样活生生，你就不会继续读我的书了。严酷而又健康的竞争，就像要跟在饭菜上嗡嗡乱飞的苍蝇斗争似的，看不见的知了在树上唧唧嘶叫，鸟儿们也在碧蓝的天空中啁啾鸣唱！